

炎黄春秋

1995年 11月 (总第21期)

潇洒莫如毛泽东



“激进派教师”作客中南海



瞿秋白怎样被置于死地



退守台湾
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九五三年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

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

目 录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絮青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锲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总经理:徐 孔

副理事长: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徐 孔

□英杰谱□

我随毛泽东转战陕北
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

□春秋笔□

济南车站血案

徐水:梦幻的天堂

我驾机秘密转移

张学良夫妇去台经过

李宗仁“逼宫”始末

□耻辱柱□

刘传新:为四人帮

殉葬的公安局长

□人海浪□

京城神秘炒房人

作曲家付林谈歌星素质

□古镜台□

清代廉吏于成龙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电话:6016633-227

印刷:北京印刷二厂

邮编:100802

目 录

炎黄春秋 1993/12(总第 21 期)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专辑

- 潇洒莫如毛泽东/王凡 刘东平 4
“激进派教师”作客中南海/王先睿 9
毛泽东在“远方”指挥琼州渡海作战/杨肇林 15
毛泽东与续范亭将军/穆欣 17

春秋笔

- 退居台湾：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叶永烈 21
杨虎城和蒋介石/杨闻宇 29
国民党也有个双枪老太婆/刘备鑫 31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与沉浮/孙孟英 34
大顺“王朝”最后的 42 天/王宏志 38

法纪苑

- 浓浓的人血不是水/张建平 41

求实篇

- 瞿秋白是怎样被置于死地的/立之 45
史料辨析：郑三发子与蒋介石/王晓华 50
三峡工程的一场唇枪舌剑/陈绶台等 54

目 录

炎黄春秋 1993/12(总第 21 期)

赤子心

域外华人世界的香火 / 段向群 59

时代风

杨成武将军和女儿易生 / 叶运均 62

我们的父亲：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 萧凯 65

人海浪

总政“右派”当了麻疯病医生 / 吴戈 68

上海股市大悲剧 / 孙孟英 74

同根结

“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王洛宾 / 刘烈娃 79

古今谈

特区人的衣食住行 / 张正隆 84

吴祖光答国贸商场书 / 吴祖光 88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 静文 92

文荟阁

注评陈独秀诗《挽大姊》 / 靳树鹏 94

李宝光诗词十三首 95

李鸿章是美食家 / 石林 瞿书惠 93

蒋经国的墨竹画 / 瞿书惠 石林 64

四大名旦的竞争与友谊 / 刘宏伟 53

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专辑

在毛泽东身边充当国际问题秘书 12 年之久的林克，耳闻目睹了主席许多动人的事迹，聆听了他远有卓见的谈话……

□王 凡 刘东平

潇洒莫如毛泽东

——林克谈毛泽东印象



“猪仔议员”轶闻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

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选中。1954年10月，林克住进了一个四合院。“庭院古老，一个人住在里面空荡荡的”，林克在回溯初入中南海的感觉时说道。当时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负责人田家英，就住在他隔壁的另一个四合院内。走出小院，毛泽东住所丰泽园的尖尖屋脊，尽在视野之内。后来因工作需要，林克又搬进丰泽园。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林克。“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林克由此而知毛泽东对秘书要求高，不免对自己能否胜任生出一丝疑虑。

林克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池水清清，树影婆娑，却无法拂去林克心中的忐忑。刚刚在池中舒展罢的毛泽东，情绪颇佳，微笑着让林克坐到身边的藤椅上，工作人员已为他们斟好了茶。

“什么地方人哟？好大年纪？”毛泽东乡音难改。

“籍贯江苏。29岁。”未脱拘谨的林克，出语捷简而规范。

“口音不大像么。”

“是的，我小时候在保定读书。‘七七事变’后，举家迁往北京，后来上了燕京大学，读国际经济专业。”

20年代初，毛泽东在南北游历中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此时林克提到保定，立即引起毛泽东的谈兴。“保定很有名喽。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阀头子曹锟修的私人花园。”

触及到历史，毛泽东谈锋更健。“曹锟用5000银元一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哪。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说到此，毛泽东淡淡一笑。后来相处日久，林克发现，毛泽东每每论及古来的帝王将相，近代的军阀政客，间或淡淡一笑。

“你做我的老师，教教英语，好么？”毛泽东话锋一转，眉宇间透着诚恳。一番寒暄，一段生动风趣的旧闻，使林克回复了平静自然。毛泽东接着说：“过去，我做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言罢，抱了抱拳，大笑起来。

林克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语一项。他从有关人员那儿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学习从哪入手，尚无头绪。于是他建议说：“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

始？”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版《人民中国》。

从那天起，林克开始了给毛泽东当英语先生的12年生涯。

“先生”与“学生”

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最长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也不间断。

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后来被称作是毛泽东《飞机上的工作照》，郭沫若还为之赋诗一首。实际上是毛泽东在飞机上学习英语的照片。

“对此我记得十分清楚”，林克讲道：“那是1957年春，毛主席南下视察工作。从照片上看，桌面上有两只对放的茶杯，两份对摆的文件，显然应有两个人，那是我正与主席学英语。两份‘文件’是《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英译本。当时侯波同志来跟我打招呼，说是要为主席摄影，我便闪到了一边。拍照的那一天，是3月19日晨，从徐州飞往南京，我的日记上有记载。”

也是在那一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起草了共同宣言，整个过程非常紧张繁忙。可毛泽东的学习却始终未尝中辍，“每每在天色未明时，便邀我到他的寝室去领读。”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林克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著。

林克还谈及毛泽东学英语的一些往事，听之觉得有趣，思之可感其独特的性格。毛泽东乡音浓重，用湖南方言来读英语“N”“L”拼音不分，因而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随着林克领读，反复习练。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然而，一脱离开英语学习，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仿佛颠了个个儿。毛泽东要求他的秘书创造性地工作，从

硬性规定一、二、三，不划任何框框。他让林克看材料选材料，不仅要求能够分析，能够综合，能够一般地反映情况，还总是不断地提出问题，商量问题，讨论问题，要求把看过的材料，提到理论的高度，从战略上着眼，说出自己的看法。

要适应这些要求，必须非常努力地学习。于是，他又收到毛泽东如下短笺。

“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8月4日。”

《做什么》今译《怎么办？》，是列宁写于1907年的一部著作。文中特别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毛泽东 10月2日。”

林克印象极深的，是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读书活动。5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大跃进等灾难性的挫折，显然与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过于乐观，急于过渡的主观倾向直接相关。但不容否认的是，一些地方和基层领导由于对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乏策，以浮夸和作假迷乱了毛泽东的视听，也是他在大政方针的决断上出现偏颇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尽管庐山会议以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悲剧结束，也许这一结局非其初衷，但从那以后，毛泽东就一再强调学习形式逻辑、学习马列著作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959年仲秋，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干部读两本书，一本苏联《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半年内读完。12月9日下午5点，毛泽东便带头实施由他制定的读书计划。读书活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应邀参加的有邓力群、田家英、胡绳和陈伯达。

“读书活动的整个过程，我都参加了，总共学习了近30次，1960年2月9日在广州结束。主要是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每次读10余页，并联系我国经济建设实际，边读边讨论”，林克回忆说。

每逢这类小规模的小规模的座谈，毛泽东总是特别幽默健谈，纵横捭阖，甚至屡从文学作品中拎出生动的事例和语言，寓庄于谐。在谈到我国的土地所有权转换及农民的恋土心理时，他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庭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在谈及家长制的中衰时，毛泽东又一次举了《红楼梦》的例子：“贾璉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不因人热”

由于林克最初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洞察力、深邃战略目光和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味不到的感受。

1958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强烈。

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我们国内的一些国际问题专家也持类似的看法。记得一家有影响的国际问题刊物甚至断言，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

但毛泽东却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林克又说：“1959年6月3日早晨，毛主席刚刚起床，就跟我讲起‘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梁鸿是东汉人，少孤家贫，经常独坐，不与人同食。别人先做饭，做毕招呼他说：灶和锅还是热的，快煮饭吧！可他却说：我不用别人的热锅。灭灶火，自己重新燃薪做饭。毛主席说：过去我跟孩子们谈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印象。我领会毛主席是借这个故事，鼓励自己的子女要有志气，不仰仗他人，不人云亦云，要有独立性格，靠自己艰苦创业。”

与慧能“通神”

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

“毛主席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亦称惠能），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因我对佛学没有什么研究，主席对我讲解的就特别详细。”

毛泽东最先说到的，是慧能的身世。他生于唐太宗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三岁丧父，家境贫寒，稍长以卖柴养母。皈依佛门后，一直没有显山露水。后来，禅宗五世祖弘忍寻觅新传人，要众僧做法偈，以观个人修行。其上座弟子神秀做法偈一首，得众僧推崇，可弘忍并不满意。而时为舂米下等僧的慧能，反神秀意做一法偈，却深得弘忍赏识。

这时，毛泽东一字不差地背出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讲解说：后一首是慧能所做，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淨的，也不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于是，弘忍到慧能舂米的小屋，用禅杖在舂碓上敲了三下，慧能心领神会，于半夜三更到弘忍大房，弘忍将传世银袈裟交给慧能，他遂成六世禅宗。

“在这以后，主席又讲了慧能的学说，及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他告诉我，慧能受袈裟后南下，在岭南曹溪落脚。他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亦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佛骂祖’。后世将他的建树称为‘佛学革命’。”

林克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他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加以梳理整理，翻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的经历；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情，为大众所接受等特征，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颇多相通之处。

“1956年7月16日，主席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主席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主席反对将马列理论视为不能再攀的顶峰，几次讲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主席很喜欢读列宁的书，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而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却持不同的看法。1958年夏，毛主席说：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工业。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

花。看来有些问题要重新解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数典品词，谈笑自若

在林克的寓所，我们有幸看到大量毛泽东手迹的复制件，其中他即兴赋诗填词，及他在默诵古人诗词时信手写下的文字，占了相当部分。有些古诗词，就抄在他当时正在阅读的报刊边角空白处。显然这些文字并未经过他深思熟虑，而是忽然有感，随即下笔的产物。

在一部书的边角处，毛泽东用雄浑苍劲的字写道：“古徐州形胜，销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寄耳。应（且）开怀，一饮尽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这是元朝人萨都刺的《木兰花慢·徐州怀古》。

林克说：“那是1957年春季，毛主席4天之间到了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除了徐州外，主席每到一地，都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讲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匆忙而紧张。但到达‘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主席突然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看。”

“3月19日上午，我们从徐州登机赴南京，可古城风物人情，似乎仍在主席的意念中盘桓。他问我读没读过萨都刺的徐州怀古，我回答没读过，他随即在我正看的一本书扉页和正文边角上写下整篇词。并告诉我萨都刺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八百岁的彭祖家乡。’”

“接着主席便向我解说起词文，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玉帐连空’，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此时主席思如泉涌，又在我书上写道‘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他放下笔说：‘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

“随后，主席话锋一转，讲起词的下半阙。‘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愔所建。张愔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尤工诗文。张死后归

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十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入长’。

“讲解完毕，主席对我说：萨都刺则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林克又从事迹中拣出一份，是毛泽东书写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宋人辛弃疾的这首词，是豪放激越的隽永之作：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首词是在3月20日的下午，我随毛主席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主席触景生情写下的。写完后，主席又讲了很多。开始还是围绕词的内容，说辛词里‘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言语。主席讲到《三国演义》中曹操煮酒论英雄一节，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接着，主席的话就从文学作品中跳出，指出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毛泽东一再借历史强调不讲政策，丧失人心，必然失败；而只有会用人，能团结人，才可成一番事业。无不与时局和应对时局的策略相关。也就是在那吟词谈典的历史瞬间，毛泽东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是基本的、长期的方针等观点。扣住时代脉搏，驾驭政策风云，却不误赏景、论词、温史，并从中获取借鉴，得到启迪，更激起超越的情怀。人间潇洒，其谁能比毛泽东？

“心事浩茫连广宇”

“许多来采访我的人，大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毛泽东身边约一句（12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就兴趣而言，毛泽东最喜欢的是什么？”

“我想恰恰是由于时间长，从接近‘而立’到‘不惑’之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不是零星的、某一层面的，而是一个恢弘的世界，一个疏密纷繁的精神体系，他的小我深深地融铸了民族的大我之中，成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意志、情感、文化的象征，所以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为此，我专门写一篇长文《毛泽东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

“至于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或说兴趣最大的是什么，我一直没有仔细地考虑过，因为他兴趣太广泛了，

很难说对某一项情有独钟，所以过去对人讲，只能讲主席比较喜欢什么，对某某兴趣比较高。最近，由于准备写一部比较详细的回忆，重新翻阅了大量的日记、笔记，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思考，我感到可以这样说了，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主席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主席1955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李四光、周培源来座谈。

“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他说宇宙是无限的，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从宏观来说是无限的，从微观来说它也是无限的。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

“于光远问主席：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看作是认识的工具？毛主席回答：有道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镏头是人手的延长，望远镜是人眼的延长。李四光问：哲学书上通常是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而在人类社会，认识的主体往往是集体。这个问题，究竟怎样看才好？毛主席说：阶级就是一个认识主体，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这就说明了整个阶级是个认识的主体。”

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此一领域到彼一领域，毛泽东自由跨越，相互映证，以丰富自己的理论，以资鉴伟大的事业，并感染着与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李漱清，是曾对毛主席青少年时代有过影响的“激进派教师”，毛主席多次提到他怀念他，建国后，为重温昔日情谊、叙叙家常，“借此了解乡间情况”，毛主席邀他进京作客。江青抚着老人的手说：“我认您是族上的老伯伯！”李漱清在京的两个月，毛主席见了他12次，引来了不少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师长、朋友，大家促膝畅谈，其乐无穷……本文作者是李漱清的外孙子，所知甚详，且纠正了不少书刊中失实的“荒唐话”……

“激进派教师”

作客中南海

□王先睿

毛泽东与李漱清（左2）、邹普勋（左1）、张干（右2）、罗元燧（右1）



最近几年，在相继刊行的讲毛泽东人际交往和语言艺术的一批书稿里，如《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湘魂——毛泽东的家世》（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和他的亲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反复记述了1952年9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邀请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张于4人在中南海作客时的一些情节，多与事实不符。是日，本是李漱清进京后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却被作者们虚构出初次会面的对话，进而编造了李漱清拘促不安，甚至说了“见了皇帝老子我心里就慌”的荒唐话。这全然是对李漱清风貌谈吐的歪曲描写。

李漱清何许人也？他与毛泽东到底交往有多深？他此次应毛泽东邀请来京，一住两月余，12次与毛泽东会见，他们又谈了些什么？

我作为李漱清的外孙，有责任根据家藏的李漱清日记和家书，以及我当时在北京的耳闻目睹，参阅作家周立波1957年拜会李漱清后发表的访谈录，把李漱清1952年秋作客中南海的若干情况整理出来，公之于世。

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的李漱清

李漱清，生于1874年，卒于1957年，是韶山韶右山庄人。他胸襟开阔，忧国忧民，有骨鲠之气，是一位雅善诗文的绩学之士。他早年宣扬“新学”，曾执鞭于湘乡驻省中学，并把韶山莲花寺、湘乡十四都常乐庵等庙宇办成学堂，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教师”。

五四运动前后，李漱清接受工农大众民主革命思想，后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应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电召到广州和沈雁冰一起，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寓所，协助毛泽东主编《政治周报》。

1927年马日事变，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革命者到处人头落地，其中包括李漱清的妻侄蒋梯空，被敌人枭首如意亭。此时李漱清早过大衍之数，回到家乡，愤然自号“韶山不出子”，眼望着毛泽东和他自己的儿孙们踏上漫漫征途。

毛泽东总也惦念着李漱清。

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县，毛泽东谈到少年时代所受的影响时曾说：“还有一件事对我有影响，就是本地的一所小学来了一个‘激进派’教师。说他是‘激进派’，是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去除神佛。他劝人把庙宇改成学堂。大家对他议论纷纷。我钦佩他，赞成他的主张。”（见《西行漫记》1979年三联书店版）这里指的便是李漱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还曾与来延安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周励武谈到李漱清并请周回湖南

后转达对李的问候。周励武将军是湘乡人，家距韶山只有20华里，毕业于长沙岳云中学，曾加入中国共产党，能文能武，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中任湘乡县农会委员长，是毛泽东的“旧相识”。尔后，周被国民党抓获，押解南京后自首，受到蒋介石的重用，1945年底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三人执行小组”，多次赴延安，有时与毛泽东彻夜长谈。1946年春，周励武受毛泽东委托，专程到韶山陈家桥看望李漱清，转达毛泽东的问候：“深望清大公好生保重身体，我愿意他健康长寿——好看世界。”过后，自号“韶山不出子”的李漱清回顾这一往事时曾说：从此“我才彻底从疾痛惨怛中解脱出来”，由“年年月月沉醉诗酒”，转向了朝朝暮暮期待天晴。

精心安排，李漱清应邀晋京

1952年7月，毛泽东给堂兄毛宇居写信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这里提到的邹普勋，是毛泽东读南岸私塾时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儿子，乳名亨二，时年59岁，以石匠为业，文字通畅，为人憨厚。少年时与毛泽东同学，又是住上下屋场的邻居。

李漱清和邹普勋得悉后喜出望外，由李漱清致函毛泽东，殷切表示晋京求见的愿望。毛泽东收到来信，约见李漱清的三子李介侯，商量接人的事。当时任外贸部高级工程师的李介侯，建议由我去接，毛主席却怕耽误我在校的功课，由他再次给堂兄毛宇居写信作出安排。信中说：

“宇居兄：来信收到，李漱清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顺致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一日”

函中所提“介绍信一件”，是主席写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的。内容是：“今邀请李漱清先生和邹普勋君来京作调查研究，因李先生年事已高，希派人护送。”

主席考虑得如此周密，安排得如此精心，李漱清等一行怎能不一路顺风！

且看他们的行程记录：

9月14日动身，在韶山招待所巧遇省交际处招待科长朱文典陪苏联友人来主席故居参观，有轿车返省城，邹普勋先随车前往；李漱清有事于湘潭稍事逗留，

16日搭早班船到长沙，科长朱文典出面慰问，礼意殷勤；17日下午8时有列车发汉口，省公安厅派优秀青年丁绍宁护送；18日拂晓到汉口，住万国旅社，与先期到此等车晋京的前湖南第一师范历史教员罗元鲲、校长张干不期而会，得知都是奉主席函召赴京参加国庆观礼的，非常高兴，更增添了同行的乐趣；19日中南交际处处长张建之陪大家渡江游览武昌，登黄鹤楼；20日上午8时乘车北上，21日下午抵京，国务院交际处招待科长高易之接站，下榻前门外远东饭店。李介侯电话报告中央秘书室转达主席。

一进中南海，饭后叙家常

9月25日清晨，毛泽东和李漱清通了电话，李漱清兴奋不已。“我马上派人去接你和邹普勋二位来吃饭”的声音还在脑际萦绕，毛主席的生活秘书王鹤滨已经来接。轿车开到中南海丰泽园，主席出门笑语相迎，握手惊呼：“李漱老好健啊！”在邹普勋热情招呼后，互相搀扶进入客厅。主客双方感叹20余年的阔别。

李漱清、邹普勋把从家乡带的腊肉、酱油敬赠主席，主席欣然接受，看看时间不早，招呼秘书田家英找介侯来，一同进餐。回话说介侯因事外出，大家才一一入席：尊李漱清为上座，田秘书作陪。

饭后，江青穿着一件天蓝色呢短大衣，从深院款款而出，与李、邹二位老人见面。寒暄时，李漱清说：“翻起老谱来，我和江青同志原本是一家人呢！”江青笑答：“李老真细心，知道我也姓李，常有人叫我‘江先生’哩！我认您是我族上的老伯伯，感到不胜荣幸，平素主席来客，我轻易不出面，您可是我们全家的客人啊！”江青的一句应酬话使李漱清感到宾至如归，呼唤出他和主席一家人50年间的深厚友谊。李漱清由于过去和开慧之间情同父女，进而生发出眼前对江青的一片关心。他听主席说江青前在国外动过一次不小的手术，十分念虑地叮咛她：“还望你好生保重身体，没有健康，一切无所附丽，你可是有福气的啊！”江青笑着告诉李漱清：“我们一家人生活倒挺愉快，平日主席工作实在太累，我总是叫他跟我唱几段京剧，所以我爱管主席叫‘老板’哩！有时我还拉着他到西厢有声有色地玩一阵游戏呢！”说到这里，江青略略停顿又自问自答道：“您知道玩什么吗？用主席给我们出的谜语来揭个底吧：‘洗不用水，吃不用嘴，砍不用刀，碰不起包。’”顿时，李漱清会心地大笑起来。叙谈良久，江青起身，抚着老人的左手，以慰语相嘱，又叫他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然后退出。主席邀李漱清、邹普勋二人到海边散步。穿过一座小巧玲珑的庭院，逶迤来到南海，可能主席忽然想到李老年迈，便说：“风大，不在这里坐了。”转至一片坪上，这里奇花烂漫，佳木葱茏，几个人坐在椅上，饮茶，晒太阳，谈论湘粤旧事，以及别后人世沧桑。

许久，才回到菊香书屋客厅，继续坐话家常。

李漱清记起今早来时，还曾接受一件相托之事，就是从长沙护送他来京的省公安厅丁绍宁交给他一个本子，要他转请主席签名。李于是谈到：“这次北上有老年文人同伴，且多亏青年同志丁绍宁一路招扶，毫无困难……”说着，从内兜掏出本子递给主席。主席拿进书房，用紫毫一笔书就“毛泽东”三个字。

这里一并谈到，后来在京两个月，李漱清受孙辈托请主席签过五个名，且都是一次一次办的。邹普勋请主席题过一回字。邹在西河沿坊间买了一本讲“猴子变人”的书，要送给家乡一位青年，在国庆节期间办的一桌宴席上递请主席命笔——“这个角色姓唐，‘唐故左街僧’那个‘唐’……”——主席当即从毛式上装的左胸口袋里抽出那支派克钢笔，在扉页上写了两行字（纯蓝）：“邹普勋购赠唐煦存/嘱毛泽东书”。

时近晌午，李漱清二人告辞，说下次再谈。

二进中南海，席间话读书

9月26日上午，李漱清、邹普勋、罗元鲲、张干四人游览紫禁城。余兴未尽，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共进午餐。

11时，到了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下阶迎接，引入客厅，说李漱清和邹普勋是“一聋一聩”，招之并坐。

因为昨天主席刚同李、邹二人见面畅谈，李漱清心想让主席同一师二位教员叙旧，主席却先来把李漱清介绍给罗元鲲和张干。毛泽东说：“翰溟（罗元鲲字）、次仑（张干字）二位先生和李漱老这些天已经处得很熟了吧，他是我的老师。”说完就和两位先生寒暄起来。李漱清暗想：“我从未教过主席的书，他却这样说，我更要努力自爱才成。”不妨提到，我外祖父谈当时的想法时还告诉我，长沙、湘潭许多人都误认他是主席少年时代的老师。当今许多著作中沿用此说，显然是不确的。

刚刚入座，应邀作陪的王季范、李介侯相继莅临。王季范，湘乡龙潭人，时年69岁，任政务院参事，住王府井红霞公寓；他是主席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教务长，与罗、张多年共事；又是李漱清的女婿王浑俊本家的九阿公，彼此过从甚密。亲友们在主席家里聚会，气氛格外欢快、轻松、活跃。李漱清年已八十，耳朵聋了，人家讲话，他听不见，他总是有好多话讲，主席笑他：“李漱老只有播音机，没有收音机。”

李漱清座旁的一张圆桌上叠放着好些本“二十四史”，有一本《晋书》翻开摆在上面，大家谈话间，李漱清信手取来浏览。主席转过身来对他说：“中国书不多，主要一部‘二十四史’，战争年代没有读过，现在准备通读一遍。”接着问他：“李漱老，你对‘二十四史’怎么样啊？”李漱清沉思片刻，把《晋书》翻到一处递给主席。主席一面耳聆其语，一面目视其文：“对

吾饮者，唯有明月，入吾室者，唯有清风……”看过，一迭连声叹息说：“李漱老，今日个是哪一天啊？！我毛泽东陪你痛饮，一浇平生块垒。”

论及第一师范50年间迁流转递、人才辈出，说到主席在一师读书时的各种特色。主席娓娓而谈、不时发出笑声：“我在一师读书，偏废自然学科，只看重社会学，那时只能这样，现在还得补课才行。那时，还在定王台（笔者注：省图书馆所在地，位于长沙浏正街）读了几句书。书不能不读，又不能读到腿肚子里去，否则害死人。我读书跟牛吃草一样，吞下去慢慢反刍，反刍还怕是一辈子的事。现在提出来改造宇宙观，特别是读书人，其实就是叫读书人做些反刍工夫，去年文艺界、知识界搞过一场反刍。”主席接着说：“一师的先生值得怀念的很多，徐老是活到老学到老。书要讲有用，还是后来读的。田秘书的书也是延安读出来的，他小时候在成都当钱庄店员，少年失修，如今成了我们的理论家，我的选集由他在编。”接着，主席一面平举左掌朝高处一托又往下一翻，一面诙谐地说道：“我对田秘书的‘书’啊是又捧又拍：才有八斗富，字无百日功。”顿时，主席大笑，众口喧腾。

午刻，过厅里八仙桌上摆下了丰盛的酒菜。在田家英秘书的招呼下，主席尊坐，罗元鲲、张干以李漱清年长请坐首席，李漱清则以与主席同乡为由坐次席，王季范、李介侯陪坐。

席间，宾主敬酒敬菜，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饭后先在客厅饮茶，尔后主席起身邀各位出游。逶迤来到卅字曲廊，见石桥横卧，碧波荡漾，巍巍亭阁座落在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色之中。南海边闲坐，中海畔散步，直到下午4时，又到含和堂电影厅观剧。剧终，主席送大家出来，握手而别。

国庆欢度，主人事事从客愿

国庆节将至，决定邀李漱清等人参加国庆观礼后，在主席和有关部门安排下，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9月27日晚，由于李漱清当日游颐和园受了风寒，卫生部长傅连璋和内科专家力不畏女士，来寓所诊治。

9月28日，因与来华演出的捷克斯洛伐克歌舞团同住一层，政务院交际处派车，请李漱清等人由前门远东饭店迁寓西河沿永安饭店，以免喧哗干扰。

9月29日上午，到沂园理发、洗澡。

9月30日中午，国庆筹委会送来观礼柬帖、观礼证及观礼须知；下午，主席秘书叶子龙特地送来棉制服和呢大衣，以备翌日观礼之用。这是主席预先叮嘱秘书带师傅来量好尺寸订制的。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周年大庆。是日晴空朗朗、彩云栉栉，城楼左右6个观礼台上，站满

了来自全国各族各界各民族的代表，还有37个国家的外宾。李漱清等位列东2台。

10时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登上天安门城楼，周围簇拥着一批开国元勋。英姿飒爽的陆海空三军接受检阅后，是学生和各界队伍的游行，十里长街变成了旗的海洋、人的海洋，蔚为壮观。晚上又来天安门广场看放焰火，此刻，俯视人潮花海，仰望星簇光束，天上人间交相辉映，斗艳争奇。李漱清恭逢盛典，想到自家儿孙妻侄4人前仆后继为革命牺牲，感到无比欣慰。

国庆期间连夜看文艺演出，都是主席安排的。2日到军委礼堂观赏杂技和京剧；3日又逢中秋节，李漱清单独应邀在丰泽园与主席共进晚餐，同去政务院大礼堂看越剧。李与主席并坐，田家英秘书坐在身旁解说。李漱老刚进礼堂时女服务员招扶他脱掉大衣，他怕冻不肯脱，而室内温度很高，久坐燥热难堪，主席笑他“自作自受”。剧完返丰泽园赏月，临别主席送李上车时，从床上取来自用的羊毛毯盖在他的身上。

其间，作家萧三、茅盾和徐特立老人曾先后来寓所看望李漱清，萧三、茅盾还将自己的诗选或文集赠送李漱老。

国庆后，政务院交际处安排李漱清等人游览北京名胜。22日李漱清突发奇想，投邮短柬一封给主席：“余年八十，欲试航空，是否可行，拟请主席批示。”结果是主从客愿，24日下午，李漱清等人在秘书罗光禄安排下，在西部机场乘坐飞机，鸟瞰京畿风光和长城内外大好山河。

互问子女事，句句溢亲情

李漱清在京近两个月，同毛泽东会见12次。谈话范围极为广泛，互问子女情况当然是话题之一了。

9月26日叙谈中，李漱清坐在主席那张铜架木板床上抽烟，忽然想起1926年冬在广州同岸英、岸青两小兄弟天天见，不禁询问主席孩子们的情况。主席没有正面回答询问，而是起身把一个女儿招呼出来。只见她身段修长，举止大方，面含笑靥地依在主席身旁，那亲女之情全在语言无法表达的神态之中。经介绍，知道她叫姣姣，16岁，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平日住校，这天是星期五，身体不舒服，上完课就回家了。她会讲一口流利的俄罗斯语，原来是建国初特地请二姨妈接回北京的。应客人要求，她用俄语朗诵了一首普希金的诗。大家报以掌声。放她回院后，几位客人还在议论，李漱清说她的眉眼脸颊酷似当年爱穿绸长袍的乃翁毛泽东。毛泽东笑而不语，微微吮着嘴唇。

10月12日星期天，李漱清按主席安排，到中南海与他在总后勤部工作的一家人聚会。李漱清兴奋之余，又不免想到自己为革命牺牲的的儿孙——儿子耿侯、贡侯，孙子德深。主席深情地说：“耿侯在1928年率队

到井冈山,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朱毛团的党代表,这个团是由水口山工人组成的,战斗力强。朱毛我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提到,他是外交部耿飏的舅舅,耿飏是醴陵人,当年在水口山做工人运动,熟悉耿侯他们。”为李老牺牲的子孙,毛泽东曾经回过两封信,一封给介侯,一封给李漱老,证明耿侯这段历史,对李漱老表示慰问。湘潭县县长曾亲临抚恤,送上“烈属荣府”“烈士光荣”“烈属光荣”三块匾。

再次谈到毛泽东子女对,主席这才正面回答说,岸青从事列宁著作翻译,两个女儿一个读北师大女附中,一个读育英学校。不知为什么,偏偏未提及1950年11月25日牺牲在朝鲜前线的爱子毛岸英。主席倒是原原本本讲述了毛远新来到身边的原委。

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1938年由中央派往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主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1940年和朱丹华结婚,1941年生下远新。第二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下狱,1943年9月遭杀害。丹华年纪轻轻,寡母孤儿熬了三年,后改嫁方志纯,建国初决意把远新交给主席。主席不肯接受,说:“你的儿子交给我做什么。”丹华诉说了自己的难处,言词恳切,但主席态度坚决,始终不予接受。朱丹华拗不过毛泽东,只好把远新带到韶山,托毛泽民的结发妻子王淑兰转送主席。王淑兰,湘乡团田人,时年54岁,乡亲们管她叫润莲四姨婆,是个热心肠,便一口答应下来,马上领着远新奔北京进中南海。主席谅不到这样做,数落了四姨婆几句,说她“是个滥好人,爱探闲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谈到李漱清的女婿王浑俊,毛泽东的兴致又高了起来。他回忆说:“记得浑俊戴副近视镜,人好瘦啊,知道他中国书也读得好,他做的古体诗我还哼起,尽是味在这里。”

这王浑俊名承光,1905年生,系西晋太原王浑之后,早年与毛泽东有交往。1951年湖南一代儒将程潜作客中南海,毛主席祝贺他70岁生日。程潜津津乐道地谈起1941年60岁生日时一件韵事:宴会上宾僚以赋诗相贺,才思奔放的王浑俊即席写成一首七言歌行,气势雄壮,格调高昂,曾传诵一时,交口称誉。应毛泽东要求,程潜今春把诗集过录送阅,主席反复吟咏过这首古风,所以才有了上面说的几句话。

亲友相托,主席处理自有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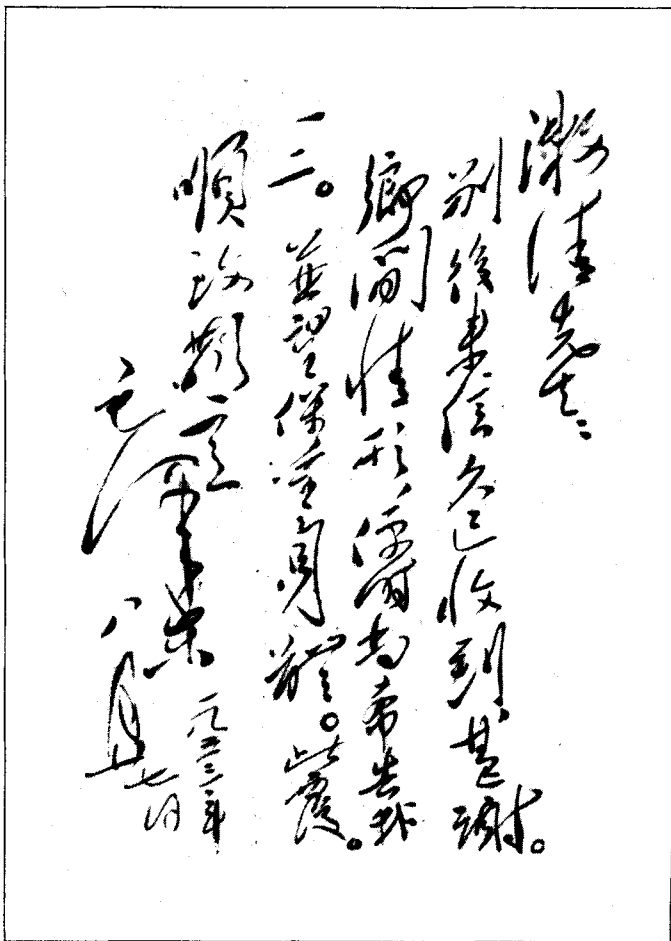
10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主席又派鹤滨接李漱清到中南海共进午餐,继续

了解乡间情形,并询问湖南文化界老人如李贡人、王端明、何炳麟、赵东樵诸家解放后的境况,还讨论了诗文史和哲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当天受罗元鲲之托,李漱清交给主席一封信,附文稿两篇,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另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呈请主席对两稿予以斧正,并考虑发表。信中还烦请主席为1932年去世的湖南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袁吉六(即袁仲谦)题写墓文。3天后,主席的复函即寄到西河沿永安饭店。

对于罗元鲲所提请求,题写袁先生墓文一事,毛泽东爽快地答复了,随函寄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字,并说“遵嘱书就,烦为转致”;而两件书稿,则悉数奉还:对罗元鲲所书自传,主席褒之为“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对罗元鲲所写《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一文,主席说“得之传闻,诸多不实”,明确表示“请勿公表”。

前面提到,这天在中南海作客,主席询问湖南文化界老人时,首先谈及李贡人。李湘乡人,时年78岁,前清拔贡生,湖南诗坛耆宿,主席读一师时的国文教员。



李漱清与他在北京的亲属合影，中立
两人为李介侯夫妇，其中为本文作者。



解放后，李贡人曾写信请主席荐为湖南省文史馆（当时称文物保护委员会）馆员，主席将“囑件”转“程颂云主席酌处”。主席后来说过：“我不愿意为亲友形迹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贡人是毛泽东特为翰旋示以殊荣的寥寥数人之一。

李漱清由李贡人想到自己能否当文史馆员的事，主席说：“连毛宇居都是，那李漱老更应该是。”李漱清顺势提出：“那就请主席推荐一下”。毛泽东却说：“推荐我就不推荐了”。毛泽东1954年3月31日给彭石麟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说：“李漱清先生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的问题（指任文史馆馆员）是他自己托人解决的。”

摄影留念，苹果对虾送别

11月8日是周末，毛泽东得闲，下午邀李漱清、邹普勋、罗元蝇、张干四位到中南海，落坐在毛主席的办公住所春藕斋的客厅，看得出主席刚刚洗了个热水澡，分外精神，又跟往常不同，穿了一双皮鞋，潇洒出迎。

叙谈间，在田家英秘书招呼下，主席起身穿上一件轻便的大衣，伸手说：“来，我们一起照张像吧！”于是，陪同大家来到厅外石桥边。当时还是薄寒时节，只有耄耋之年的李漱清穿上冬大衣，其余三位都着棉制服。拍照时，主席居中，按例故乡人居左，第一师范教员居右。这两位究竟谁挨着主席站，态度上让与未让，差别只在些微之间。主席发了话：“瀚溟先生耳朵背，谈话挨我坐，照像就不能说话啦，次仑先生挨着我来吧！”合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位“秀才”拍摄出来的。饮茶畅谈约有半个时辰，田家英秘书就笑呵呵地拿来照片，给四位客人每人一张。李漱清惊呼：“一阵工夫就洗出来了，真是不亦快哉！”大家仔细端详照片，荣誉感，离别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这位性格极其复杂的巨

大人物发生强烈的共感，兴致勃勃地谈起来：“我平素照像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里有一对秀才夫妇，往往偷着给我拍照。记得1949年4月底南京解放，当时我住在香山双溪，拿着报纸坐在亭子里看这条消息，那位女秀才灵感来了，抢走这个镜头，我一生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过，弄得夜里睡不着觉，以至于冒出一首歪诗（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笔者注），章太炎说，虎踞龙盘是古人讲的假话，我说，南京如今是个好地方，我不听洋八股的屁话，几下就把他们赶到海里去了。”大家看他眉飞色舞，打出手势，又听他笑着继续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人家主动提出来要和我照像。前年吧！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汤藻真专门找我照像来了，嗝，偏偏照坏了，他又要求再照一次。第三种情况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合个影，这种情况罕见。”大家听了感到莫大的荣幸。

11月15日李漱清动身返湘。毛泽东为他饯行。临别送给他一箱金日成赠主席的朝鲜苹果，一箱青岛运来的对虾。主席说：“苹果是借花献佛，我没有什么东西打发，就打发一点花公子。”主席把虾称之为“花公子”，是因为在湖南话里“花”“虾”谐音。李漱清也有风趣地笑答：“这些花公子不一般呢，是爬在龙背上的哩！”主席爽朗地笑起来。分手时，李漱清深情地对毛泽东说：“人一辈子有些事就一次，生一次，死一次，中国妇女嫁一次——‘隆表节孝’挂了两千年——我在北京和主席会面也就这一次啦！告诉主席听，我这一辈子是两句话归总，一是这一辈子做了我所应做的事情，如今老了，时代也不同了，再是这一辈子值当，总算看到了主席的世界。”主席紧紧地攥住老人的手，叮嘱他保重身体，目送轿车远远驶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洛松）



□ 杨肇林

1950年3月4日晚，毛泽东从苏联回北京。第一次出国访问，一去就三个月，同斯大林搞了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3月5日，解放海南岛作战开始。毛泽东行装甫卸，顾不得休息，密切注视战斗的进展。

5日下午7时半，四野的118师252团一个加强营799名指战员，分乘14艘帆船，由雷州半岛灯楼角起航，开始偷渡。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建议，敌人在儋县海头港至白马井的百里海岸线上，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宜在此地登陆。渡海先锋营预计第二天早上，在海南岛西部的白马井一带海岸登陆。

早在1949年12月11日，毛泽东到达苏联莫斯科的第二天听取了国内报告后，即电报指示四野：“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

指示中说：

……三野叶飞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門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全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并要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全门覆辙。

此时，薛岳已经取代陈济棠，在海口成立了海南防卫总司令部。猬集5个军10万人马和海军第三舰队50多艘舰艇以及一支空军部队，

构筑了海、陆、空立体防御体系，吹嘘是攻不破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四野曾提出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毛泽东指示：“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猝莽撞造成过失。”

1月10日，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就琼岛作战等问题给四野前委发出电报：

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格外关心先头部队偷渡是否顺利。

渡海先锋营经过一夜航行，没有按预计时间到达登陆地点，直到

毛泽东在远方

指挥琼州 渡海作战

6日午后，才在排浦港海岸登陆。

琼崖纵队一总队的同志早已等待接应。部队奔向海边，攻打敌人两个据点，开辟登陆场，阻击敌人的拦截。先锋营登陆后，两支部队会合一起，夹击敌军。

40军渡海先锋营胜利登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毛泽东笑了。

3月10日，128师383团一个加强营一千人，分乘21艘帆船，在海南岛东岸文昌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成功。

3月26日晚，118师又一个加强团三千人，分乘81艘帆船在澄迈的玉包港也顺利登陆。

3月31日晚，127师加强团3700人分乘88艘帆船，船队进入

琼州海峡遇到三艘敌人军舰，我军装有37战防炮的护航船队，勇敢地逼近敌舰，轻重武器一起开火，打得敌舰冒烟起火，我登陆部队在第二天拂晓，胜利登陆。

4月16日晚7时，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韩先楚率领6个团18000多人，分乘三百多艘帆船抢渡琼州海峡。与此同时，43军副军长龙书金率领两个团6000多人，分乘81艘帆船起航抢渡。

我军护航队多次与敌舰格斗。逼近开火。战士们还抱起炸药包，随时准备像在陆上作战一样舍身炸毁敌舰。面对我军机帆船，密集的近距离炮火，敌军现代化军舰不得不转向规避。

我军没有军舰，也没有飞机的掩护，用木船打退钢铁的现代化军舰，用载重仅几吨的帆船，把近10万大军运过海峡，胜利登陆，创造二十世纪海战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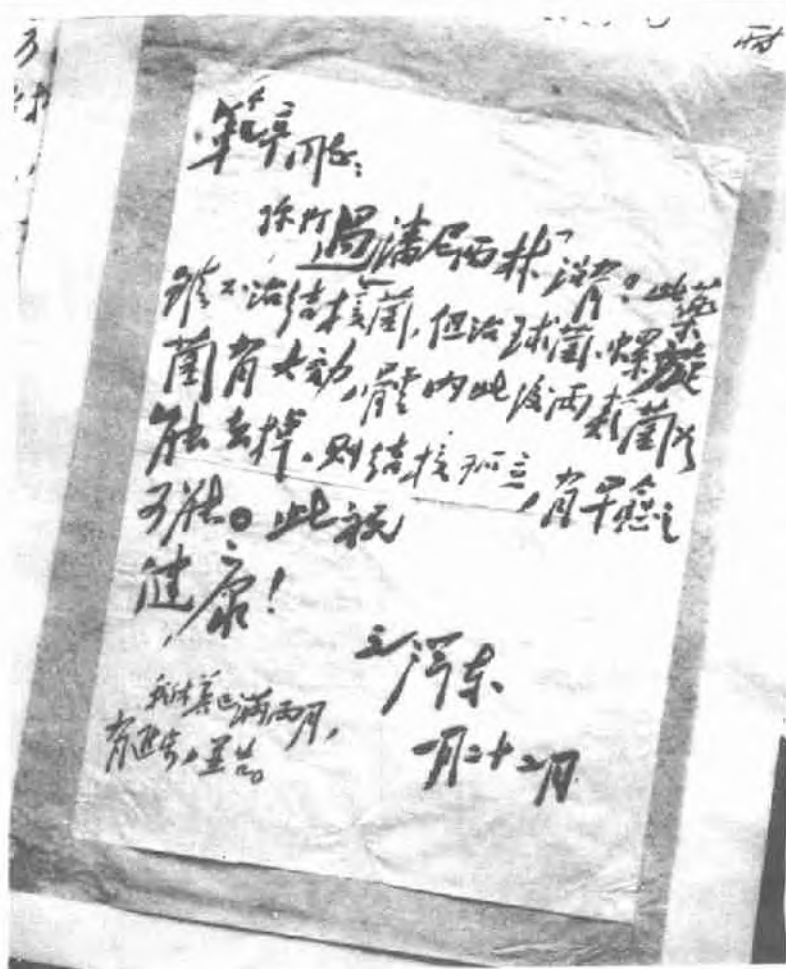
5月19日，毛泽东在邓华关于帆船打敌舰的作战报告里，看到43军三艘小船45名战士勇敢地同敌人钢铁军舰作战取得胜利，似乎看见了战士们横渡琼州海峡的无畏的身影，他慨叹了，这是陆军海战队，这应当就是我们的人民海军！

毛泽东提起笔来，十分赞赏地写道：

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例，应予学习和表扬。

(责任编辑刘家驹)

毛泽东与续范亭将军



□ 穆欣

同盟会元老、为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未遂）的续范亭，同毛泽东有过一段非常亲密的交往……

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和续范亭，刚刚过了50周岁，续范亭在毛泽东那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这天毛泽东请在延安治病的续范亭和几位同志小宴。见面后，毛泽东亲切询问他的病情，给他讲了一些有效的疗养方法。饭后，毛泽东又请大家坐在丁香树旁谈心。谈话中续范亭询问毛泽东年岁究竟几何？毛泽东说：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又问何日？毛泽东说：“农历11月19日。得知公历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诞辰，去年正是50整寿。自感“三十年奔走无成，见到如此领袖，使我心悦诚服，中国革命，从此不会再走冤枉路了。”他又得知，去年毛泽东50整寿的时候，由于他的谦逊，没让延安各界举行什么庆祝活动。许多人都不知道。续范

亭十分感动，当场赋诗祝贺他的健康：“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生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续范亭是著名的爱国将领，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军阀的征战。早年因遭阎锡山通缉而逃离山西。“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参谋长、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军总参议的时候，深感民族危机日重而内战不断，目击蒋介石屈辱卖国，一心剿共，痛愤“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疆疆事仇敌，瓦全安足贵？”他留下绝命诗：“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之后，竟于1935年冬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决心一死震醒国人。遇救后他于

1936年冬在西安亲身经历了西安事变，他在诗文中说：“西安事变找到了共产党，使我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总方向，由此转了弯。”抗战初期他出任第二战区统一战线组织“山西战地动员委员会总会主任委员”，“晋西事变”后出任晋绥边区行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员，长期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并肩杀敌，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邃的了解，对党和领袖毛泽东有深厚的感情。

续范亭同毛泽东第一次会见在1939年春天。这年3、4月间，续范亭参加了阎锡山为布置投降反共而召开的臭名昭著的“秋林会议”。续范亭在会议上对阎锡山的投降卖国谬论，针锋相对地顶撞，阎锡山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私下向其亲信们说：“续范亭是背上棺材抗战的，抗战一完，自己也就进棺材了。我们可不能背上棺材抗战！”会后续范亭返回晋西北途中，特地转道延安，要求面见毛泽东，向他报告秋林会议的经过和阎锡山的动向。

延安归来，面对日寇和顽固派的夹击，续范亭意气风发，奋勇拼搏。在艰难紧张的冬季里，在粉碎阎锡山发动的“晋西事变”的连续战斗中，续范亭夜以继日，辛劳过度，致使肺结核病复发。病情特重，急需放下工作，及早治疗，安心静养。但是，谁都说服不了他。病榻上批阅文件，拖着病体参与指挥反扫荡作战。直到毛泽东打电报来，劝他速往延安医治，他自己已感觉到对

大家已是一种拖累的时候，方才同意前去延安治病。

1941年3月下旬，行署派人护送续范亭前往延安。他的病情还在恶化：发烧、咳嗽、气喘、咯血，有时昏迷不醒。如何送到那里，颇费周章。去延安千里迢迢，天寒地冻。山路崎岖，骑马自然不行，一般担架也不方便。结果绑了一个躺椅，由护送的战士轮流抬着走。经过半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于4月初旬到达延安。当抬着他的担架到达杨家岭时，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已在山坡上等待、迎接他。

在杨家岭稍事休息，续范亭住进延安城东15里柳树店的国际和平医院。经过检查，他的左肺已大部病溃，又有严重的肠胃病的支气管炎，需要较长时间的医疗休养。在这里，经常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毛泽东也专程来看望他。续范亭刚到延安时，毛泽东听说他过去用过一种进口药治胃病有效，就把续的秘书温宗祺找来，让他写出这种药品的英文原名，亲自发电报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设法购买。1941年7月2日，药买来了，毛泽东马上派人送去，并在信中写道：“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喜欢。”1946年初，国际友人赠送毛泽东新药品“盘尼西林”毛泽东也马上分送一部分给续范亭。续范亭在柳树店疗养时，毛泽东还将冀中人民送来的雁绒转赠给他缝被御寒。毛泽东经常写信给他，

续范亭在延安柳树店国际和平医院居处窑洞前



每次都问到他的病情。如象1942年12月23日的信中写道：“两声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痊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按：即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诸人谈谈，可愈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在延期间，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也都常来看望。他与延安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来往尤为密切，经常互相探望，互相赠诗，互相勉励。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关怀和照顾，给予他极大的安慰和鼓舞。深切地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作诗道：“延安如故里，诊疗施百般；衣食愧饱暖，同志复时看。”

有一次，毛泽东专程到柳树店看望续范亭。国际和平医院与中国医科大学都在柳树店，续范亭住在它的后山一排窑洞里。毛泽东一进医大校门，给同学们看见，立即被邀请到学校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续范亭这时病还沉重，当他得知毛泽东在礼堂讲话，也急忙扶病从山上走下来聆听。只见礼堂里人挤得满满的，却异常平静。毛泽东见他进来，立即中止讲话，走下讲台，紧紧地同他握手，亲切地询问他的病情。随后笑着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把他的病治好，算你们立了一大功。”礼堂里响起一片亲切的笑声。毛泽东招呼续范亭入座后，才又重新走上讲台，继续讲话。毛泽东讲完了，就和续范亭一起走到后山的窑洞里，跟他亲切交谈很久，才返回杨家岭去。

经过精心治疗，续范亭病情好转，1941年10月间搬到延安交际处休养。11月21日参议会闭幕式上，续范亭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著名的《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他刚听完这篇感人肺腑的演说，进入沉思的时候，大会主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请他登台讲话。续范亭异常激动地说：我为中国革命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光明前途。将来中国是光明的，幸福的，民主自由独立富强的。因为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劳苦群众和先进人士的保障，中国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转过年来，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应续范亭的要求，毛泽东派人给他送来整风文件。他认真阅读，联系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写了许多学习心得和诗作。他所写的《学习二十二文件有感》两首，描绘自己如饥似渴的强烈学习愿望。

有人把这两首诗送给毛泽东，他看了很高兴，不久就到交际处来同续范亭谈心。续范亭兴奋地说，这二十

二文件好极了，通过整风运动，党的作风一年之后定会大变。毛泽东笑着回答说，我可没有你那么乐观，党的作风转变没有那么容易，有很多困难。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在政治上建党，有纲领；在组织上建党，有党章；可在思想上建党呢？长期以来没有建好，多次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可见思想上建党之难。处于幼年时期的我党，就象一群小孩子赶一辆牛车，目标是清楚的，但路线怎样走却都不知道。取得点胜利就头脑发热，拼命地抽鞭子，结果翻了车。翻了车怎么办？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推到一边，说还是我来赶。可又不认真吸取教训，端正思想路线，结果还是拼命抽鞭子，还是翻车。这个比喻是说思想路线的重要性。我们的思想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我们当前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整风若能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变化，我就很满意了。

续范亭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造诣很深的诗人和文章能手。他在延安六年医病期间，先后发表和广播的文章就达20来篇，他写下的诗作200多首。

1942年3月，续范亭写《赠毛主席》诗一首：“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续范亭自注：“结语，是杜工部赞诸葛亮的一句旧诗，借为一用，并为之释意。万古，是空前，云霄，是甚高。一羽毛，是羽上的一毛，品清质虚而体极小，惟其清虚而不自大，所以空间而又甚高。另有《羽毛漫谈》一篇，以解释全诗之意，‘惟天下之至灵，乃能驰骋天下之至坚’，能小能大，能屈能伸，变化无穷，颠扑不破，意在斯乎。”

续范亭把这首诗和《羽毛漫谈》寄给毛泽东。5月14日，毛泽东复信给他，表示赞赏这首诗，还说将“不自高”三字当做他的“座右铭”。但说《漫谈》对他过誉了，谦逊地说：“你3月间的漫谈，到今天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高过事实。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因此，这篇《漫谈》一直没有发表。

1944年夏天，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来延安访问。他们途经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的时候，阎锡山大放厥词，同记者团谈话时大肆诬蔑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有关报道，提出请当年山西新军的领导人续范亭和薄一波、韩钧著文驳斥，向公众说明真相。贺龙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续范亭，他欣然接受（他向毛泽东隐瞒了自己较重的病情），在病床上口述，由秘书笔录写成著名的长文：《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8月19日，他把文章改定后送给毛泽

东。毛泽东看过后，就批给陆定一送新华社播发全国。8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续范亭。信中说：

“你的檄文式的文章（寄阎信）看到，即可发表，并广播出去，廉顽立懦，振奋人心。听王彬同志说才知你已入医院，写此等文章当然会加重你的病。但听说休养方法已改为静卧，是很好的。……希望你用此方法完全治好。”

“近日国际国内对我们同情的日多，过去被封锁、打击、辱骂的孤立状态可能起一大变化。这个消息或者也可以帮助你治病。希望坚持卧治政策。”

续范亭这篇呕心沥血的杰作，当时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写完这篇文章，他因神经受到刺激，身心劳累过度，病情急骤恶化，整整卧床两个月。医生劝告他为了健康，要暂时停止写文章。续范亭说：“我气愤，我不能不写！”病稍稍好的时候，他又接连写了几篇文章。

1945年10月底，续范亭面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怒不可遏，他以辛辣的笔触，写下了又一篇“檄文式的文章”：《忠告国民党当局及其画策者》。文章写就，他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送交《解放日报》于11月6日发表；11月2日，又复信给续范亭：“示悉。力疾为文，词严义正，已付报社发表。侵入我河北解放区的孙连仲3个军（7个师）6万人，被我刘邓军包围于邯郸地区，战10天，高树勋率新八军两个师起义，反对内战，站到我們方面。卅军（鲁崇义）3个美械师及四十军（马法五）两个师总退却，我于前日起总反攻，已歼灭两个师，其余尚在作战中，可望日内解决，知注敬闻。”

每逢时局有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常及时地写信和续范亭通气。重庆谈判后，1945年10月18日在写给续范亭的信中说：“示悉。大势所迫，使当局不能不签定双十协定，但其实现却尚是大问题。私利所囿，他们尚不愿承认解放区，并正向解放区进军，此问题之解决，麻烦尚多。看你写字，精神甚好，尚望研究休养办法，多活许多年，看见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1946年9月22日给续的信中写道：“近日集宁、淮阴、荷泽失了，张家口大概也会失去，将来还会要失去一些地方。但是今日看了六十老人陈瑾昆教授所作：《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一文，觉得所得大于所失。陈先生已到张家口，据说决心参加我们的工作，陈文不日当在报上发表。听说你的病好些，不胜欣慰。我比去冬好得多，仍在半休养中，知注敬闻。”当时毛泽东给续范亭的亲笔信很多，经过长期战火及历来的风风雨雨，亲属保存下来的还有14封之多。

续范亭一直关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他自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威望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关系，主动发挥他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之间的桥

梁作用。其时交往最多的，是和他有多年私谊驻扎在陕北榆林的国民党晋绥边总司令邓宝珊。他在这方面的工 作，也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并同续范亭一起做邓宝珊的工作。1943年6月17日，邓宝珊途经延安前去重庆，在延安交际处住下。毛泽东当日即请续范亭作陪设宴招待。11月15日，邓宝珊从重庆返回又经延安，由续范亭陪同参观；邓在延安突然患病，毛泽东亲往慰问叙谈。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还亲笔写信给邓宝珊致意。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大军进攻延安，续范亭随一部分机关人员疏散，离开居住了6年的延安到达绥德。这里距离榆林很近，他在这里逗留为的就近做邓宝珊的工作。12月9日又写长信敦劝邓宝珊早举义旗。转过来收到邓的回信，续范亭又于1月7日复信，促邓早日行动。10天以后，他见邓宝珊迟迟不见动静，再写一信；2月22日又写一封长信，与朱德致邓信一起交人送去。他把邓的复信和自己写去的信汇送毛泽东阅。1947年2月2日，毛泽东复信续范亭，劝他实事求是，无须着急：“致邓函已看过，词严义正，发人深省。最近刘绍庭见来电述及邓之方针，鄙意以为可以同意，暂时各守原防，将来再决进止。目前时局，邓之地位，只能做到这一步。各区作战日有起色，击破蒋氏进攻是可能的。惟蒋尚欲孤注一掷，集中四五十个大团于徐州附近，欲在山东决一胜负，我方现正准备迎击。边区局势现较平稳，如绥德方面住得相宜，似不必去晋西北，增加劳顿，如何尚祈酌定。”

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进逼延安。续范亭由绥德转移到晋西北临县疗养。毛泽东在艰苦卓绝条件下亲率部队转战陕北与敌周旋，仍念念不忘重病中的续范亭，7月13日写信给他：“迁入晋绥后，未知贵恙如何，极以为念。人民战争发展，极艰苦时期虽尚未完，但展望是好的。我们在此都好。我身体比在延安时要好些。”

不幸的是，续范亭的病日益沉重，终于9月12日11时与世长辞，遗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吊唁，并接受续范亭的要求，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毛泽东闻知续范亭病逝的噩耗，十分悲痛。9月18日，晋绥各界召开续范亭追悼会，举行安葬。毛泽东送来的挽词，对续范亭一生给予最高评价：“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其后不久，毛泽东于9月22日由朱官寨到达葭县神泉堡。有一天，毛泽东见到解放军总卫生部苏井观和在延安时期为续范亭治病的黄树则大夫，同他们谈了几句话，就问：“续范亭同志在晋西北病故了，知道吗？”苏井观说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赞叹地说：

“这个人很有骨气。可惜了！”

退居台湾：

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蒋介石几百万部队，三年之中，只剩下残兵败将四十万，危败之际，制定三个退守方案，最后也一一破产，只得逃至台湾，他野心未死，蠢蠢欲动，苦苦反思，找出“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从此卧薪尝胆，静观待机……

□叶永烈



蒋介石只能实行第三方案

1949年12月10日傍晚，蒋介石告别中国大陆，从成都向东飞行，越过海峡，抵达台北。一路上，蒋介石“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

195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完成胜利，巩固胜利》，明确指出：“解放台湾、西藏、海南岛，完成统一全中国大业。”

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为550万人；国民党的总兵力，则剧降为60万人，只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十分之一左右。

胡宗南刚从成都飞逃海南岛，便接蒋介石命令，要他飞往西昌指挥。这样，胡宗南不得不在1949年12月28日飞往西昌，作“最后的奋斗”。1950年3月28日，西昌这颗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最后的钉子，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拔除。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在大陆有组织的战斗乃为之告终。”

蒋介石在危败之际，原本制定了三种方案：

一是以四川为中心，西南为根据地，走当年抗战的老路，与毛泽东长久对抗；

二是以海南岛为最后退路；

三是以台湾为最后退路。

如果这三种方案都失败，则退到菲律宾，组织流亡政府。

重庆、成都、西昌的接连失守，蒋介石的第一方案宣告破产。

就在打下西昌之后，半个多月——4月16日傍晚6时半，几百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出发，朝南驶去。

驻守海南岛的是蒋介石的嫡系，当年在长征时追杀毛泽东的薛岳，他担任琼崖保安司令兼防卫总司令。薛岳知道海南岛难保，曾面见蒋介石，请求从海南岛主动撤退，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说：“海南岛是反攻大陆的跳板，不可放弃。”如今，得知中共部队渡海峡而来，薛岳急命出动飞机、军舰拦击，却无法阻挡那数百条木帆船。

毛泽东在1950年1月10日给林彪的电报中，便指出：“争取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按照毛泽东部署，在3月5日、26日，两小批中共部队曾经用木帆船渡过琼州海峡，登上海南岛和那里的中共游击队——琼崖纵队会师。这样，中共对横渡琼州海峡已是熟门熟路了。

这样，只化了4个多小时，几百条木帆船在夜色的庇护之下，居然一举渡过海峡。在琼崖纵队和先期登陆的两批部队的配合下，中共主力强占滩头，站稳了脚跟。中共的后续部队也就不断地渡海而来。

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海南首府海口于4月30日，落入中共部队手中。5月1日，海南岛最南端的榆林

港，红旗飘扬。从此，海南全境已是中共的天下，薛岳部队三万多人被歼。

于是，蒋介石第二方案又遭破产。

自1950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军西藏。藏军第九代本主官桑格旺堆于11日起义。19日，昌都解放。

紧接着，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到达拉萨。10月26日，由张国华、谭冠三两位将军所率主力部队进入拉萨，举行了入城式。从此，西藏插上五星红旗。

这样，中国全境除台湾以及少数岛屿之外，都已是红旗的天下。

这样，蒋介石别无选择，只能实行他的第三方案——以台湾为最后退路。

这样，毛泽东和蒋介石以台湾海峡为“楚河汉界”，继续对立着。

蒋介石对退往“美丽岛”作了周密部署

台湾，有着“美丽岛”、“东方甜岛”的美誉。本岛面积35759平方公里。论大小，在世界的海岛之中，排名第28位。

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最近的距离为130公里。在晴朗之日，从福建沿海登高远眺，澎湖列岛上的烟火，以至台湾高山的云雾，皆隐约可见。

1946年台湾的总人口为624万。1949年，台湾的总人口猛增了130万。这些新增的人口，大部分为“外省人”——台湾本地人对从大陆去的人的习惯称呼。这些“外省人”之中，有近60万人为蒋介石带去的部队。

蒋介石曾说过这样的话：

“处绝地也可以生。……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以复兴。”

1946年10月25日，是台湾从日本占领下光复一周年的纪念日。蒋介石曾和宋美龄一起赴台湾视察。当时蒋介石便说过这样的话：

“中央政府之视台湾，一如离别家庭五十年的兄弟……中央的爱护台湾，远胜于全国任何一省，中央对于台湾建设的重视，也胜于其他的省份”。

1946年10月2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渗透，可视为一块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之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

这一次视察，台湾的重要的战略地位、长夏无冬的气候、丰富的物产、秀丽的风光，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宣布准备下野的前夕，部署

了台湾的退路。蒋介石说：

“在俄帝集团侵略之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

“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

在蒋介石看来，凭借着台湾海峡这天险，退可以求得生存，进可以反攻大陆。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突然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陈诚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让陈诚掌管台湾，为自己留下一块安身之地。

李宗仁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此次新职突然发表时，前主席魏道明（引者注：指前台湾省主席）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38年（引者注：即1949年）1月5日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内中提及的“自草山迁入台北”，指当时陈诚在草山养病。其实，蒋介石让陈诚以养名为名去台湾，已预作布置。所以，一旦蒋介石宣布了对陈诚的任命，陈诚随即“敏捷”地走马上任。

蒋介石还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诚兼任台湾警备司令。这样，台湾的党政军大权，全部落在了蒋介石嫡系手中。

蒋介石的另一部署，在当时乃绝密行动。直到1960年6月2日，才由《中央日报》透露出来：

“在某一个深夜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密令军舰一艘，停泊在上海黄浦滩央行（引者注：中央银行的简称，下同）附近的码头边，央行附近的街道，临时戒严，一箱一箱的黄金，悄悄运上军舰，在天未破晓以前，该军舰已驶出吴淞口，以最大的速率，驶向基隆。两天以后，陈主席（引者注：指台湾省主席陈诚。不过，当时陈诚尚未被正式任命为台湾省主席。）打电报给俞氏（引者注：指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全部黄金已妥藏在台湾银行的保险库里，坐在外滩央行总裁办公室里的俞氏，这时才感觉肩膀上的万钧重担豁然减轻。”

后来，据中央银行稽核处长李立侠回忆，抢运黄金共分三批：

“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2004000余两，运至基隆；第二批运走522000余两，运至厦门，再转运台湾；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以后，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198000余两。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1520万银元，另有15374000美元则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

这批黄金，成了蒋介石初入台湾时的经济支柱。诚如蒋经国后来所言：

“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这样，蒋介石的立足点尚未移至台湾之前，已在党、政、军、财四个方面，对台湾作了周密的部署。

1949年6月1日，从上海败退的蒋介石，来到台湾高雄要塞过端午节。

6月21日，蒋介石住于台北大溪，非常喜欢，称那里的风景很象他的故乡溪口。24日蒋介石在台北之北13公里的草山，看中一幢别墅，作为自己的住处。这所别墅名叫“士林”，原是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那里附近多温泉，花木繁茂。蒋介石改草山为“阳明山”，以表明他对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崇敬之情。

蒋介石在台北设立了总裁办公室。

在台湾安排好退路之后，蒋介石这才又飞往广州、重庆、成都，作“最后的奋斗”。直至这“最后的奋斗”失败，这才从成都飞来台北。

在蒋介石回到台北不久，宋美龄也于1950年1月13日从美国来到台北。

蒋介石迫使李宗仁让位

在他回台北前三天，国民政府迁至台北。不过，此时的国民政府，只有行政院，而代总统李宗仁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附设的长老会医院。蒋介石虽然是台湾的实权人物，是“非常委员会”主席，是国民党总裁，但毕竟是下野总统。一国无总统，总是“名不正，言不顺”。

蒋介石早有复出之意，无奈，总得由代总统李宗仁主动让位才行。可是，李宗仁却怎么也不肯让位，甚至把蒋介石复出称为“复辟”。

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的复出计划，早在1949年7月，便已开始进行了：

7月间，我还在广州的时候，黄埔系将领及蒋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提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了。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了。这时，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对蒋已不再以“总裁”而径以“总统”称呼。我深知蒋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果然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便先后来找我，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来渝坐镇。其实，蒋一直在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请，现在何以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道：“礼

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他们见我态度坚决，才不敢勉强。

只是由于李宗仁不愿让位，蒋介石这才无法“复辟”。

李宗仁在美国，倒是真的动了手术，据其自云，是“割治十二指肠”，“恢复甚快”，“1950年1月间，我身体已大致复元。”1月20日，李宗仁出院仍在美国居住。台北的监察院连连电催李宗仁回台，李宗仁不愿回去，但又不愿让位。

蒋李矛盾，终于公开爆发。1950年2月21日，非常委员会致电李宗仁，限他三天内回到台北，不然就被视为放弃代总统职权。李宗仁拒绝回台。

2月25日，监察院弹劾李宗仁。

3月1日蒋介石宣布复职，亦即复任中华民国总统。

3月13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讲话时，谈到了他三次复职的经历：

“我每一次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其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8个月的功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14年的长期奋斗，但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

从此，蒋介石到他死去，一直连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了终身总统：

蒋介石是在1948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1950年3月，他尚在任期之内，只是在由下野变为复职重任；

1954年，6年期满。蒋介石连任第二届总统；

1960年，又6年期满，而《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为了使蒋介石连任总统，国民大会通过了《临时条款》：“动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据此，蒋介石连任第三届总统；

到了1972年，年已85岁的蒋介石，向国民大会发表了逊谢之辞：“本人已多年膺任此职，深感歉疚，谨郑重恳请诸位代表另选贤能，继承本人担任总职位。”自然，国大代表们表示恳请。于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祇得迁就民意”。这样，再据《临时条款》，蒋介石连任第五届总统；

倘若他不死的话，定然会据《临时条款》，连任第

六届总统。

蒋介石反思失败的原因

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来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蒋介石在1950的3月1日复任总统时，便在介寿馆三楼办公。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痛定思痛，蒋介石检讨着自己在大陆失败的原因。

蒋介石此时此际，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速战速决”“全国进攻”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蒋介石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

在此之前，蒋介石也曾这样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蒋介石在作了这些战略检讨之后，认为：“我们初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蒋介石总结了四条“自己打倒自己”的原因：

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于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乘之机。

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

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大业。

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

蒋介石反思了自己的军队，总结了高级将领们的八大缺点：

- 一、本位主义；
- 二、包办主义；
- 四、大而无当，粗制滥造；
- 五、含糊笼统，不求正确；
- 六、因循苟且，得过且过；
- 七、迟疑犹豫，徘徊却顾；
- 八、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由此，蒋介石认为，他的军队也就成了“六无”之

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

由此，蒋介石认为，军人们也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

由此，蒋介石得出结论：“非失败不可。”

蒋介石说：“我们的几百万军队，没有同共军作过一番较量，就被解决了，无数优良的装备送给了共产党，用来消灭我们自己。”

蒋介石又反思了国民党。他总结了国民党的散漫、腐朽：

“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致全盘瓦解，彻底崩溃。”

为此，蒋介石在1950年，着手成立了“国民党改造案研究小组”。

为此，蒋介石在1950年3月，向2000名国民党中高级干部，发表了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分三大部分：

- 一、虚心接受中国大陆失败的教训。
- 二、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
- 三、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

蒋介石的演说，使座中不少人涕泪满面……

1949年8月5日，美国《白皮书》的发表，不仅深深激怒了毛泽东，他为此写了一系列文章抨击《白皮书》，而且也深深激怒了蒋介石，因为《白皮书》用相当多的篇幅批评蒋介石的无能！

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居然如此“目中无蒋”。艾奇逊把国民党的惨败，归结为“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一句话，美国政府此时所实行的政策曰“抛蒋”。

在他的日记中，悄悄地发泄他对于《白皮书》的愤懑。

《白皮书》发表之际，蒋介石正在韩国访问。蒋介石在8月6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到韩国后，更觉定静光明，内心澄澈无比，是天父圣灵与我同在之象征也。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痛惜，不能不认为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

蒋介石还恨恨地写道：

“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即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瀚雪也。”

回到台湾后蒋介石得以仔细阅读《白皮书》，他在8月10日的日记中，连着骂了马歇尔、艾奇逊和杜鲁门：

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随着《白皮书》在世界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蒋介石实在忍无可忍，终于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斥责美国政府落井下石。

美国政府实行“抛蒋”，其原因有几点：

一是艾奇逊所说的，蒋介石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美国在蒋介石身上化了那么多的钱，那些钱如同扔进水里；

二是美国政府实行扶李。也正因为这样，李宗仁以治病名义，于1949年11月26日申请赴美就医，翌日，美国国务院就表示同意他入境治病；

三是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守不住台湾，中共会迅速攻下台湾。1949年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的第二十八号密令，作了这样的估计：“台湾的失陷已在广泛预期中，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台湾民政和军事情势趋于恶化的事实，益增强了这种预期。”既然台湾保不住，美国政府也就冷眼对待蒋介石。

正因为这样，当国民政府迁往台北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直住在美国，而在台北只有一名领事级的代表而已。

不过，美国政府对于毛泽东，也充满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后，10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为合法政府的政策”。

1949年12月2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军方人员的谈话中，对中国形势作了这样的估计：

“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事实上控制着全中国，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自己崩溃。”

艾奇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

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份新闻公报，宣布了美国对台政策。这一公报，极为重要。杜鲁门宣告美国无条件地承认福摩萨（即台湾）为中国领土，然后宣告：

美国对福摩萨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都没有野心。在目前，美国不想在福摩萨取得特别权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无意使用它的武装部队来干预当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

同样地，美国政府将不向在福摩萨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在美国政府看来，福摩萨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东西。美国政府建议，根据现行的立法授权继续执行经济

合作署目前的经济援助计划。

杜鲁门的这一公开声明，等于表示，如果毛泽东以武力进攻台湾，美国将袖手旁观。不以武力加以干涉。

杜鲁门的这一公开声明，无疑使蒋介石雪上加霜。这样，美国政府既“抛蒋”又“弃台”。

正在美国请求援助的宋美龄，此刻在美国如同在冰水中。她不得不在1月13日离美返台。而杜鲁门居然在白宫设宴，请李宗仁以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的身份赴宴，简直把蒋介石的鼻子气歪了……

美国政府还下令，撤离美国在台侨民。这表明，在美国政府眼里，毛泽东进攻台湾已是近在眼前了。

美国政府甚至准备在中共打下台湾之后，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朝鲜的枪声使蒋介石喘了一口气

就在蒋介石风雨交加、台湾摇晃不定之际，一场突然爆发的战争救了蒋介石的命。

那是1950年6月25日星期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蒋经国向他报告了紧急情况，朝鲜半岛动向异常，似乎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南北之战！

由于时差的关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得知这一消息，是在6月24日晚10点。

据《艾奇逊回忆录》载：

第二天早上国务院收到的消息是坏的。以一个坦克纵队为核心的大规模进攻正指向汉城和金浦机场。南朝鲜的武器装备显然远远不能抗衡……”

美国军政首脑在布莱尔大厦召开紧急会议：

一，除了已经由军事援助计划分配的之外，授权和指导麦克阿瑟将军对朝鲜提供武器和其他装备。

命令美国空军在美国从属人员撤退时轰炸任何向金浦机场方向前进的北朝鲜地面和空中部队，以保护金浦机场。

三，命令第七舰队从菲律宾向北开行，以防止中国向福摩萨进攻，或相反的情况。

杜鲁门总统接受了艾奇逊的建议。

另外，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重要。他说：

“台湾是美国太平洋防线，自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冲绳，而至菲律宾之一环。”

麦克阿瑟说了一句名言：“台湾可以成为一艘不能击沉之般空母舰。”

这么一来，美国对于台湾问题来了个急转弯，即由“弃台”转为“保台”。

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就朝鲜战争发表公开声明，内中涉及台湾问题。

“鉴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

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这下子，蒋介石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就在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后的第三天，美国第七舰队驶入了台湾海峡，从而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汉河楚界”，为蒋介石筑起了一道防线，从而使台湾处于美国武力的保护伞之下。美国也就从“抛蒋”转为“保蒋”。

此后，9月15日美军七万余人在朝鲜仁川登陆向北推进，并向中国东北进行轰炸扫射。10月19日，毛泽东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支援金日成，与美军直接交战。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关系，进入完全对立的阶段。

此后，美国官员频频访问台湾。特别是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杜勒斯是一位坚决反共的人物，采取了坚决支持蒋介石的态度，向台湾派驻了大使兰金。另外，艾森豪威尔总统还宣布取消前总统杜鲁门的承诺，即杜鲁门所声明的“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也就是说，第七舰队的使命，只是保护台湾不受中共攻击，而允许台湾进攻中国大陆。美国政府不再貌似中立了。

此后，蒋介石结束了风雨飘摇的日子。

毛泽东的解放台湾和蒋介石的反攻大陆

“解放台湾”这一口号，最早见诸于194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国的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此后，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各种政府文件，都不断地重申解放台湾。

蒋介石在1950年3月1日复职总统时，便宣誓要“光复大陆”。6月，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制定了这样的战略计划：“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从此，他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要把台湾建成“反攻复国的基地”。

毛泽东所说的解放台湾，也就是指武力进攻台湾。毛泽东确实着手解放台湾的部署。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身份，命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着手修复各地的机场，并要中央财政委员会“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

1950年2月4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曾致电

中央转粟裕，要求加强伞兵训练，以备解放台湾之用。

过了6天，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表示：“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毛泽东调四个师给粟裕演习海战，就是为了作解放台湾之用。

1950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渡海攻下海南岛之后，毛泽东充满信心，准备解放台湾。

这时在台北的电线杆、小巷、车站，忽地有人贴出了震撼台湾的标语：“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拥护毛主席，活捉蒋介石！”

正在这时，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不得不放慢了解放台湾的步伐：一是他要准备出兵朝鲜；二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游弋于台湾海峡，成了解放台湾的极大障碍。

这样，1950年8月8日，毛泽东致函病中的粟裕：“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在给他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的信中，提醒不要提“在1950年打台湾”这类话。

虽说毛泽东一下子无法解放台湾，蒋介石又一下子无法反攻大陆，双方在50年代之初却仍外于交战状态。这时的国共之战，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

毛泽东打蒋介石，是大陆周边那些被蒋介石军队占领的小岛；

蒋介石打毛泽东，打的是空袭战，小股登陆、骚扰战。

毛泽东一个一个打下了蒋介石部队占领的小岛；

1950年5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珠江口外的万山群岛，发起攻击，至12月7日全部占领小岛；

1950年5月13日至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舟山群岛；

1951年9月9日，蒋介石把一位名叫“秦东昌”的特殊人物派往浙江沿海的大陈岛，在那里设立了浙江省政府，“秦东昌”为主席。这位“秦东昌”，其实就是当年毛泽东的老对手、“西北王”胡宗南。

1955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下了大陈岛西北的一江山岛。2月2日，得知蒋可能会从大陈岛撤退，毛泽东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了一信：

彭德怀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 2月2日

蒋介石那时掌握着中国的制空权，虽说他的陆军大部复没，空军却几乎很完整地退到台湾，也正因为那时中共还没有空军力量，所以蒋介石可以从成都从容地飞回台北，不必担心途中会有中共的飞机截击。

蒋介石的空军那时有各种型号的飞机四百架。由

于缺乏维修的零件，能够投入战斗的为半数。蒋介石凭借这二百来架飞机不断飞越海峡，轰炸大陆沿海城市。

内中最为著名的是1950年2月6日，根据国民党潜伏特务罗炳乾提供的情报，蒋介石派17架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自来水厂等重要目标，投弹70多枚，造成上海停电、停水，居民死伤达千人以上。上海人为之震惊，称为“二·六”轰炸。

蒋介石的海军那时也占优势，退往台湾的舰艇有50多艘，借着这些舰艇，蒋介石不时骚扰着大陆沿海。

1952年1月10日及1953年7月16日，蒋介石曾两度派部队骚扰闽粤交界处的东山岛。特别是第二次，蒋介石出动了登陆艇、炮艇、兵舰，13000多人扑了过来。打了一天，被歼3千多人，这才赶紧退走。

这样的打打闹闹，持续了好多年……海峡两岸，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海峡此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海峡彼岸，那时最流行的歌曲是“反共第一歌”——《保卫大台湾》。

海峡此岸，毛泽东着力于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挖出蒋介石逃离大陆时在大陆埋伏下的50万左右特务人员。那时，大陆最走红的是反特电影，如《人民的巨掌》、《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等；海峡彼岸，蒋介石实行“戒严令”，开展反共运动，深挖“共谍”。那时，台湾最走红的是反共电影，如《恶梦初醒》、《永不分离》、《春满人间》等等。

万炮齐轰金门震惊了世界

1958年8月23日中午2时整，全世界被金门岛上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所震惊。

如同疾风暴雨，在短短的85分钟内，三万发炮弹密集地落在金门岛上。

岛上的蒋介石部队，毫无思想准备，倾盆而下的炮弹，一下子使驻守金门的蒋军三位副司令赵家骧、章杰、吉星文丧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长官、金马防区上将总指挥胡璉和美国军事总顾问，差一点被炸死。蒋军伤亡达600多人……

这阵突如其来猛烈炮击，使海峡两岸形势骤然紧张。自1956年以来的和平景象消失了。

蒋介石接到金门告急电报，大吃一惊，以为毛泽东下令攻占金门岛，甚至以为这是进攻台湾的信号弹。

由于多日未曾炮击金门，所以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官兵冷不及防。据云，第一阵炮弹落下时，差一点炸死蒋经国的儿女亲家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俞大维及叶飞的老对手胡璉。

“八·二三”炮击，导致国共双方开战：陆军互相炮击，海军、空军直接交战。战争，持续了40多天，使台湾海峡陷入一片紧张之中。

炮击金门，戏剧性地持续下去，停停打打，打打停

停,半停半打,半打半停。每逢节日,诸如春节,则以国防部长的名义发表公告,声明节日期间停止炮击,以便让金军民和大陆同胞共度节日。只是从1959年9月17日起,原国防部长彭德怀因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遭撤职,此后的国防部文告是以新部长林彪名义发布的。

按照蒋介石的习惯,每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国庆节)、元旦和青年节,他都要发表文告。这些文告都是经蒋介石反复修改后发表的,据云有的改了十多次之多。在这些文告中,蒋介石反复强调“誓死坚守金门”,“金、马、台、澎为亚洲反共阵营之中流砥柱”,“金门为坚不可摧的反共前哨”。

蒋介石还一次次组织人马,前往金门视察、劳军,声称金门的一寸土地也不能送给中共。内中,光是蒋经国到金门便达123次之多……

自1962年起,台湾行政院新闻局遂年为台湾国语影片和影艺人颁发“金马奖”。“金马奖”以金质战马奖杯为奖品,取义是双关的:既是“如金之真纯,如马之奔腾”,又是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象征。以金门、马祖命名“金马奖”,据云是为了褒扬英勇的抗击精神。

戏剧性的炮击金门,从1958年一直延伸到1979年元旦,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文告,宣布结束炮击金门。徐向前的文告说:

“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如今,当笔者前往厦门采访,厦门前线却已成了旅游“热点”——人们争着在那里用望远镜一睹金门风光。所见对岸,一片和平景象,国民党士兵毫无顾忌来来往往,与当年炮击金门别若天渊……



杨虎城和蒋介石

□杨闻宇

西安事变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究竟谁是推动这一事件进程的主齿轮？在杨虎城将军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文作者以崭新的视角，客观公允地为我们揭示了一页真正的历史。——编者



杨虎城将军

历史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从没有往来过，张学良、杨虎城也没有打过交道。“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张学良率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蒋介石驱之入陕，名义上是“剿共”，暗地里含有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争夺三秦地盘的用意，这里的形势也使然，不能不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军队拥到这并不富足的地方，而张学良、杨虎城在诸多将领中又决非甘居人下的等闲之辈。这一着棋正是蒋介石权术生涯中的得意之作：张、杨依蒋之言戮力“剿共”，对红军是致命的打击；二人若为争食争地而结怨，“内讧”、“火并”谁也免不了损伤元气，最后只好由南京政府来收拾残局。这就是有名的“一石三鸟”。

东北军自东边潮涌而至，关中冀尔之地，十七路军怎么办？杨虎城相当冷静的对付蒋介石这一恶招，他认为：负有失土之恨的东北军，患难的朋友友好交。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友好相待，十分尊重。张学良兵重位高，杨虎城为其下级；张学良乃风流倜傥的少帅，杨虎城是穷人出身的土将。能否以“无数杨花过无影”的方式把少帅争取过来，是粉碎蒋氏阴谋的症结所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下野，走了一趟欧洲，对法西斯主义景仰不已。由此出发，他亟欲拥护蒋介石的“独裁”政治。有一天，张、杨

坐而闲聊，又扯到法西斯上。张问杨：“这个办法，在中国行得通行不通？”杨说：“人家（指德、日、意）搞法西斯，对外扩张领土，他（指蒋）当小皇帝，我们当亡国奴。你看这行得通吗？”张听后，默不作声。

杨虎城将国运与前景剖析得如此清晰，张学良怎么能不动心呢？！

二位将军携手之后，顺着西安城里特务多如牛毛的形势，调转方针，对付南京，设计了一套“暗通明不通，上合下不合”的斗争策略，也就是说下层随他们去闹些纠纷，以掩护张、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致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团、军警联合稽查处一大帮特务组织，报给蒋介石的尽都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争住房而干仗、看戏占座而斗殴的“情报”。两位将军玩弄数千名特务于谈笑之间，老蒋中大计，为“西安事变”这一场暴风雨的到来谱下了一支序曲。

张学良直奔西北是“剿共”来的，在与红军交手的前夕，杨虎城特意劝他：要慎重，不要轻进。张不以为然。杨叹息道：少帅少年气盛，不碰钉子不知道钉子是铁打的。果然，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接连三战，东北军失利，师长牛元峰被杀，杨虎城之所以能看准张学良要碰钉子，是因为他自己苦头先尝，受过重挫；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秦岭地区，蒋介石电令十七路军进行阻击，红军锐不可挡，杨所派出的三个

警备旅的旅长两死一伤。鲜血与烽火告诉张、杨，红军是一道不可动摇、不可逾越的“长城”，如不逆蒋之意图而转戈抗日，前途就只有为蒋介石殉葬。在碰钉子而清醒这一点上，杨虎城的悟性高一些，灵敏一些，时序上比张学良要早一步。

杨、张依次在红军面前受挫之时，也是促使张、杨迅速联袂、紧紧携手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损兵折将之后，要求补充，蒋非但不补，反而撤销了有关部队的番号，这是“老师”张作霖遗下的家当哟，撤销它，无异于割张学良的肉。杨虎城的旅长两死一伤之后，蒋介石拍来电报。叨叨什么：“国家养兵，失败如此，曷胜浩叹！”特定的错综复杂的历史，铸造了杨虎城的精明强干，他省悟到：“抗日，国家有出路，大家都有出路；打内战，大家同归于尽。要抗日，要先停止内战。”

停止内战，要蒋介石改变国策，谈何容易！由此，这才不可避免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兵谏”。

蒋介石的“一石三鸟”破产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中国共产党扭成一股劲对付蒋介石，这就是有名的“三位一体”。杨虎城是扭转这台“剿共”机器的主齿轮。

1936年11月初，杨向张明确提出：“等委员长来到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闻言大为震惊，忙说：“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兵谏”发物事，杨

是主谋者。杨的地位低，兵力少于张，且张之夫人与蒋之夫人又是结拜姊妹。杨虎城在张学良面前敢开这个口，在当时是要有非凡勇气的。

张、杨密谋合符之后，“兵谏”的枪声响起，蒋介石“一石三鸟”的那块“石头”，却突然反弹过来，打进了因杨贵妃洗浴而过温馨于世的“华清池”。那时节，蒋 51 岁，杨 43 岁，张 36 岁。两只轻捷矫健的猛虎，险些儿要了蒋介石这条老龙的命。

容易被人忽略的是，在陕北的毛泽东与杨虎城同龄（杨比毛年长一个月），“兵谏”爆发的前一周（12 月 5 日），毛泽东给杨虎城又写了一封信，信内有这样的话：

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

“迫令”二字，灵犀一点，充分显示出张、杨与中国共产党道义相契、见识一辙的救国情怀。毛泽东的信可能还在陕北至西安的山道上秘密走动着，而“迫令”的枪声已经在黎明时分打响了。历史的脚步就是这样的从容，又如此的紧蹙，“三位一体”难分主从，历史地看却似乎各有所侧重：从实际决策上讲，张学良为主力，就和平解决方针的实施而言，周恩来为谋主；而“兵谏”大事的酝酿与推进，杨虎城实为首领。

捉蒋之谋，张、杨一致；如何放蒋？张、杨间生出歧见。中共代表赶到西安以前，“和平解决”之议是个悬案，能否实施？周恩来一行到西安后，和平解决之议乃大定。张、杨的分歧在于：张操之过急，生怕夜长梦多，南京方面迟则生变；杨则主张有条件、有保证地放蒋。蒋口头上以“人格”作保证不足为信。杨虎城最担心的是蒋能否抗日，会不会对发动“兵谏”之人进行报复。由此，他认为须有一“政治文件”作为依据，方可释蒋。杨的这个主张与周恩来基本上是一致的。慎重因果，这是阅历丰富、虑事成熟的杨虎城的标志。

12 月 25 日下午放蒋，是急公好义的张学良单方面突然决定的，杨是在蒋动身时才接到电话的。在西安西关机场上，大型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周恩来不见踪影，张学良忽然又提出自己要亲自陪蒋去南京，在杨虎城耳中，这无异于是又一声“炸雷”！蒋是总司令，张副之，杨只是陕西的绥靖主任，此时此刻，杨那心里翻腾着大风大雨，从未有过的大风大雨！这一放、一送意味着什么？飞机起飞，机翼下必然会布满阴云，这浓云必将笼罩西安古城的天空，可为了顾全大局，他隐忍住了。放走蒋的当天晚上，西安城防司令官孔从洲去见杨虎城，事后回忆：

杨当时精神极其沮丧，他对我说：“这样匆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前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这还有什么‘三位一体’！”说完长叹了一口气。

枪声大作，突然抓来；陪同登机，仓促放走，这就是无从掩饰的历史真相。飞机脱离地面的那一瞬间，“三位一体”的顶梁柱被抽走了。

蒋介石一回到南京，龙归其渊，牙爪并现，立即将西安事变前投入西北的 30 多个师分为 5 个集团军，从华阴、华县、渭南、商洛、甘肃、宁夏同时威胁西安。张学良成了“囚犯”，东北军群雄无首，产生内讧；十七路军的两个团叛变归蒋；杨的老母亲被叛军扣留于蒲城当人质……杨虎城立即陷入了十面埋伏、乌云四起的窘境。在东北军“少壮派”集体痛哭、请求营救张学良之际，这个顽强的将军流泪了。他只好嘱托南汉宸：“希望你向周恩来先生转达我的处境，并请有以教我！”

蒋回到南京后，曾两次托人转告杨虎城：杨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

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以实现。”这是挑拨，杨虎城不为所动。蒋见这一手不能生效，1937 年 3 月，将杨召往杭州，当面指桑骂槐地糟蹋张学良：“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这是敲山震虎，训斥时杨将军一直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召见结束，他只是说道：“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1937 年 6 月至 11 月，杨虎城将过“放逐生活”。动身出国之前，他给自己的部属留下这样的话：……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南边是冤家（十七路军已移驻于渭北，北与红军毗连，南与中央军相接），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杨虎城在此预言了中国大地上未来的趋向。

天下任何人的认识能力无不具有局限性，二重性。

杨虎城眼力固然不俗，却没有预见到蒋家王朝垮台之日，也就是他的个人生命终结之时，更没有料到蒋介石会亲自坐阵，同时杀害了他的妻子儿女并随从秘书。

把话说回来，张、杨二将军如果对蒋氏其人明察秋毫，远见无遗，西安事变也许不会是当时那样一种结局了。历史，就是这样的深邃莫测。

将军本名杨彪，虎城为字，“彪”字当今已被“忠”字取代，《辞海》、《辞源》里查不出。“彪”字本意为冬天之虎，出处穷困，又冷又饿，有为则存，无为则亡。为了挽救急遽沉沦的故国，杨虎城将军切切实实地奋斗了一生。

（责任编辑：刘家驹）

国民党

也有个双枪老太婆

□刘德鑫

四川华蓥山共产党游击队有个双枪老太婆，无独有偶，在川西，国民党也有个双枪老太婆——赵洪文国，她的一生，她的凶残，她死心塌地为蒋个石殉葬颇富传奇色彩。

四川什邡与汶川的监界点上也有座九华山，这里野花四季不凋，环境幽雅，不知哪个国民党军阀看中这块宝地，在此修了幢别墅，没住多久，却闹起鬼来，从此这楼谁也不敢进住，远近山民都叫它“鬼楼”。

1950年2月，成都刚解放不久，我人民解放军驻川西某部，组成了一支“轻骑队”，悄无声息地冲进这座“鬼楼”。……

这是发生在川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国民党残兵败将，伙同“军统”特工，反共“游击部队”，疯狂向我军作复仇性的反扑。其中为害最烈的力量之一，是在抗日战争中被人称为“游击队之母”的赵老太婆。她下属有五千人枪，每个人的胸襟上都标了个“赵”字。

赵老太婆选定这座“鬼楼”做司令部，是她看中了这里地形险要荫蔽，至于“鬼楼”，对于这个“游击队之母”，她可不管什么鬼呀神的，



因为她见过的“鬼”多着哩！

“游击队之母”，本名赵洪文国，辽宁省岫岩县人，地主出生，书香门第。“九·一八”事变后，她参加了游击队，转战华北，后逐渐发展到一师人马之众，与我八路军联合作战，打了不少漂亮仗。她虽已年近花甲，身板却硬朗，红活的肌肤，显示出她倒象一介赳赳武夫。蒋介石经常称赞她，赵洪文国便逐渐靠拢了蒋介石，由“游击”侵华日军，变成“游击”解放军了。这样，这座“鬼楼”便成了赵洪文国的“反共总司令部”。

我人民解放军178师师政治部朱主任被赵老太婆抓走的消息，惊动了驻成都北校场的兵团司令员周士弟，他立即下令派部队前往营救。

1950年2月初的一天，朱主任带领一个警卫班，从石板滩出发，步行到成都开会途经龙潭寺时，被土匪劫持。

“大兄弟，你是解放军哪个部队的？在共产党里混了个什么衔儿？”赵老太婆在“鬼楼”开始审讯朱主任。

朱主任鄙夷地斜了她一眼，厉声反问：“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胆敢在解放了的今天，还这样作恶！”

赵洪文国“嘿嘿”干笑两声，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老实告诉你，大兄弟，我就是你们要捉拿的‘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赵老太婆。我们是进行反共自卫、保卫家乡。你们这么多外省人，跑到四川来干啥？还不是抢四川人的耕地、粮食、实行共产共妻。今天，就要拿你们这几个解放军祭刀，为四川百姓驱灾除难！”

朱主任毫无惧色，正义凛然地痛斥以对。赵洪文国被骂得七窍生烟，勃然大怒，只见一土匪快步过去，高举枪托，劈头就向朱主任脑袋砸，朱主任立刻昏死过去。然后用砍死我军警卫员的那把大刀，撬开朱主任的嘴，割去了他的舌头。过了阵，朱主任醒来了，当他想再痛斥土匪暴行时，可只能张大满嘴流血的口，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便瞪圆了眼睛，愤怒地扫射着赵洪文国，在赵洪文国看来，那简直是两挺吐着火舌的机枪。她受不了啦：“赶快把他那眼睛挖了！”

土匪再次举起还在滴血的刀，残酷地伸向朱主任的眼眶。朱主任又昏死过去。

此时，人民解放军小分队突然出现在“鬼楼”门前，发现地上新鲜的血迹延伸到一间宽敞的卧室里，却中断了。

“搜！”张连长向战士们下达了命令，便在这间约有16平米的房里搜查起来。

张连长陡地把疑惑的目光，落到了屋角的那个巨大的高低柜上，这柜是用质地优良的红木做成，正面嵌了块足有一人多高的法国加厚玻璃。张连长打开柜子，用脚尖在木柜底部轻轻踏了一下，只听吱呀的响了一声，那好看的玄色木板居然开启露出个黑森森的洞口，啊，原来是通向地下室的。

“出来，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张连长迅速地侧起身子向地下室朗声喊话。黑森森的洞里死一般沉寂。“再不出来，就开枪啦！”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之后，终于从洞口露出来，缓缓的。一双高高举起的雪白而丰腴的手，接着是乌亮的短发，粉嫩的脸蛋……

“啊——？！”

一个，又一个，连续出来了五个学生打扮的姑娘，怪啦，大姑娘钻暗洞！

原来，这些姑娘都是重庆渝女师和成都益州师范学校的学生。她们在学校，听老师讲过赵洪文国的故事，自己也看过有关赵洪文国的报道。

1938年，日本进步组织“反战同盟”的绿川英子，曾在《抗战文艺》第四期二卷上，发过一篇人物特写：《赵老太婆会见记》，专门介绍了赵洪文国的对日作战的功绩。这个冬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访问欧美，回国途中，在香港会见了赵老太婆，称赞她是“抗日女将军”，千古的“巾帼英雄”，还同她在九龙合影留念。

出于对“赵老太婆”的崇拜和慕名，出于青年学生们的天真和她前不久来重庆时的煽动：“共产党嘛，哼！”赵洪文国装着不屑地在鼻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继续诬蔑说：“生活是供给制，婚姻是配给制。你们想想，解放军长期离家在外，脑袋吊在裤腰带上，火里爬，血里滚，进城了，一看你们这些如花似玉的女学生，一道命令，不去也得强迫你们去军营当‘慰劳品’！”她顿了顿，装得一脸诚恳，仿佛她就是学生们的慈母。“还有你们想不到的哩，缺胳膊少腿的伤员怎么办？他们有功，要婚配呀，怕你们见了恶心，就装在麻袋里，叫你们去摸，摸到哪个，哪个就是你的丈夫！”

“赵老太婆”说得纯真的女学生们害怕了，吓得六神无主的女学生，就这样被她煽动进了学生营。

历史象条弯弯曲曲的河，就是这个当年的“抗日英雄”的“赵老太婆”，却干起反共的勾当。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赵总司令”率部随国民党中央军溃逃四川。在四川，蒋介石又亲笔给她写来了一封信，为她打气。

接到蒋介石的“圣旨”，她立即在重庆、成都招兵买马，连在校的学生也不放过。她欺骗的学生们跟着她退到九华山后，越看越不对头，早想脱身。今天，解放军一喊话，她们就一个个毫不犹豫地钻出了地下暗室。然而“总司令”赵老太婆呢？

“下去搜！”张连长向身边的战士一咧嘴。战士们挽起衣袖，把枪一顺，就要钻洞。

“慢！”正在这时，指挥员田偃波赶到了。他用手一挥，做了个制止的动作。“不能下去，‘赵老太婆’在暗处，你们在明处。她还会用双枪！”

“双枪？”

她从小跟随父亲打猎，学了一手好枪法。后来，东北沦陷，她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两肋常插两支“自来得”手枪。这枪说也奇怪，既没准星，也无标尺，出手利索，随风一伸，“叭、叭、叭”天空飞过一群麻雀，她想打头不会伤尾，双臂一伸，枪响鸟落，掉下来的正是带头的两只，每只麻雀的头部，都已炸裂开来，血糊糊、毛茸茸的跌落在地。

听说她长子赵侗，死于日军龟田大佐之手后，一次赵老太婆化妆混进日军的据点，见龟田正和几个日本军官打牌。她冷不丁飞起一脚，门的吱呀声与“砰砰”的双枪声同时响起，像平时打麻雀一样，对准龟田的脑袋就三响“迎风枪”，那三枪的弹着点，在龟田大佐扁平脸上，正分布成个“品”字，左、右眼和仁丹胡上，各钻了个窟窿，龟田顿时开起“彩礼铺”、“酱油铺”来，那白的、红的、干的、稀的，象大都市地摊上摆开的小玩艺儿，花花绿绿地铺了一地。从此，在华北的侵华日军中，一提起“赵老太婆”，个个象筛糠似的心惊肉跳。

“今天这个‘赵老太婆’不出来，该怎么办？”

“灌烟！”田偃波下达命令。

这法子真灵，不多久，暗洞里传出咳嗽声。

然而过了好一阵，仍然只听咳嗽声，不见人出来。

“再熏！”

一股滚动的浓烟，像条灰色的巨蟒，直钻暗洞。霎时，洞内又传出了“啞啞”一阵干咳，伴着丝丝的喘息，像头老驴不堪重负所发出的哀鸣。

蓦地，一个女人脑袋，裹着缕缕烟云，露出洞口。

“放老实点，举起手来！”

张连长眼看这一头的花白发丝，就认定必是他们等待已久的“赵老太婆”了，他想起她左右开弓的那两支“自来得”，便机警地将正面立姿迅速改成了侧身站立，陡地将右手的食指伸进了冲锋枪的护圈。

“赵老太婆”手脚确实麻利，张连长话音刚落，她已嗖地亮出两支黑森森的枪管，“叭、叭”两枪，张连长一闪身，躲过了左边一枪，而右边一枪，却不幸打中了他的右肩胛。

左右开弓的两支“自来得”，到底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你是谁？”

田偃波斜乜了她一眼，眉宇间潜伏着巨大的雷暴。

“我？我就是你们早已闻名和想得手的赵洪文国！”

她答话时，还把灰白的脑袋扬了扬，仿佛当年抗日战争的时期那样。

赵洪文国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早已闻名”不假，“早想得手”非真。而且，我军对她的抗日功绩是肯定的，尊重的，还不止一次对她做过工作。

刘、邓大军先遣队曾派代表与她面谈，开导她说，要珍惜自己荣誉，及时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赵洪文国

听后却说，国民党尚拥有两广、云、贵之众，何况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有美国盟军的支持、有蒋委员长的亲自指挥，尚不知鹿死谁手！末了，还忿忿地说：“你们休要在此挑灯拨火，诱惑忠良！”

“赵老太婆”从重庆撤退时，乘混水摸鱼，打劫了十几家大小银行及几家兵工厂，大捞一把之后，又裹胁了一批男女学生，逃向成都，那时，成都已是座兵山，城内城外，兵荒马乱，见刘文辉、邓锡侯等爱国将领已通电起义，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便率残部沿川陕公路继续北窜。行至广汉，知道贺龙所部已解放绵阳，前后无路，才不得不改向西逃，窜入什邡、汶川一线。

这时，我第二野战军某部代表李夫克同志，来什邡与董宋珩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商谈起义。事成，李代表又专程前往她的“司令部”：

“蒋介石大势已去，我军希望你，弃暗投明，这样既保持了你的抗日英雄的光荣，还为人民立了新功。”

李夫克中肯的言词和真诚的态度，使赵洪文国心里涌起阵阵狂涛。她要求给她一点考虑的时间，再跟蒋介石确实已走头无路，她开始动摇了。何况解放军仍然是那么看重她，派出了高级指挥员进山与她面谈。

这一夜，她想得很多很多，第二天，她肿着眼泡，找自己的参谋长商议。

“丈夫还没有死就去改嫁，会不会貽笑后人？！”

参谋长的话，像条无形的电缆，接通了忆及过去的思维的线路。她想起自己读过的诗书，过去蒋介石对她的恩泽、尊重和信赖。唉，赵洪文国叹了口气，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委座呀，文国幼读诗书、当知礼仪，忠臣不事二主，古有明训。乘人之危，离他而去，后人岂不笑我不仁、不义、不忠？她想到这里，喇地站起来：

“幸亏你提醒，我差点糊涂了，委员长一贯以国士待我，我将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死，我赵某当死而无憾！”

当李夫克同志知道赵洪文国的最后抉择时，十分惋惜和遗憾。一个不曾被日寇武力所征服的“抗日英雄”，今天却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沉沦了。当一个人把她最后一口气只用来报答一个人时，这个人实际上已把自己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用市场上最低价格给拍卖了！是的，她不怕鬼，但终被她自己心里更凶恶的鬼吞食：“有奶便是娘”，“从一而终”。唉，一个悲剧女性啊！李夫克想到这里，又长长地叹了口气。

当赵洪文国被我军的小分队押出“鬼楼”时，九华山早已收起了那张透明的“网”，雾霁天晴，明丽成都平原的上空，一尘不染，赵洪文国吃力地抬头只望了一眼，便立即闭合了，而且闭得很紧很紧，再也不肯挪动一步，她提出要坐滑竿，是呆久了地下的暗室，乍一出来不习惯阳光，还是认为太阳虽好，已不属于她的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孙孟英

毛主席像章的兴衰沉浮

编者前言：

报载，最早的毛主席像章，是1942年为纪念抗日根据地发动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而制做的。一枚为“学习像章”，以党旗为底，左下角有“学习”二字，右边是毛主席留着分头的正面像；一枚为“埋头苦干像章”，“埋头苦干”四字反白，左上角是毛泽东和朱德的合影。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主席团成员除毛泽东外，每人都佩戴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我国第一枚用金属制做的毛主席像章，刻制者是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

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延安整风清算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到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的统一和团结；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那时制做并佩戴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无疑是同志们发自内心对毛泽东同志的尊敬，表达了大家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由于当时根据地生产手段的落后，制做的像章数量极有限，那时的像章如能保存至今，当然是“稀世珍宝”了。带有毛泽东头像的纪念章大批制做，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1951年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政协制做的铜质“抗美援朝纪念章”，在金光四射的红五星中央，就是毛主席的侧面头像。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可爱的人”，戴着她，在朝鲜英勇奋战，维护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戴着她，在返回祖国之后，克勤克俭，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建设出力。

制做毛主席像章的高潮，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可以说达到了狂热顶点。这是发生在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现象。不容否认，大多数的竞相制作者和亿万佩戴者是出于当时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之情，但也不容否认，从中确有某些人、某种势力的推波助澜，以便他们从中渔利。

上海作者孙孟英所记述的，就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的罪恶表演。

张春桥在上海布置制做像章

1966年11月10日，以政治投机分子王洪文为首策划的安亭卧轨破坏铁路的事件，震惊中外。

1967年1月，以“四人帮”为首的一小撮上海造反派，自上而下地全面篡夺了上海市各部门的一切权力，成立了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这就是当年曾被誉称为“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

同年2月5日，“上海造反总司令部”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全市性的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大会宣布了上海市新的领导人名单：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姚文元，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王少庸；造反派总司令张春桥、姚文元，副总司令王洪文、陈阿大……。

紧锣密鼓。大会结束后，由张春桥主持又在市委办公室召开了新领导班子会议。张春桥春风得意，但仍然不露一丝笑颜地板着脸说：“今天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胜利！”一阵掌声过后，他接着说：“为了祝贺和欢呼上

海人民公社的诞生，明天我们必须发表一篇社论，题目是《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副标题是——欢呼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这篇社论由姚文元同志、徐景贤同志和市委写作班子的同志一起负责完成。”说着，又把目光转向王洪文：“我们还必须设计出一种毛主席的红宝像章，来纪念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这像章要很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这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还是请王洪文同志完成吧！”

王洪文接受任务后，匆匆返回造反总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是晚上8点了。他顾不上吃饭，吞下几块饼干后就拿起话筒说：“转16分机。”召来了陈阿大。王洪文对陈阿大几乎是复述张春桥布置制作像章任务时的一番话：“这是对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一种纪念，它将载入中国史册，而且是中国史册上最光辉的一页。”当陈阿大领悟到从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时，兴致勃勃地赶去通知各造反派司令部的头头们。

一个小时后，以“紧急会议”名义召开的关于制作像章的会议开始了。王洪文要求大家，发动不同战线的同志们，尽快设计铸造出这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毛主席的红宝像章来。

王洪文亲自审定毛主席像章设计图

翌日晚8时左右，各造反司令部设计的毛主席像章图案相继送到，共有100多种。

王洪文点燃香烟，先粗略地翻了翻，随后一一认真地审定。这个“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自然有其审查核定的标准：

——主席坐在一把藤椅上，椅四周是火红色的牡丹花。他看来别扭，觉得无产阶级革命家总不该和“牡丹花”联系在一起；

——主席站在一座山前，山虽高大，松虽挺拔，他又认为主席站在

那里，显不出气壮山河的气派。

——主席站在一座山顶，举目远望，有高瞻远瞩之气概，但他又嫌色彩搭配不好。

忽然，王洪文眼睛一亮，第109张图案，从给人的整体感觉到画面具体设计，都很让他满意。这是一张由造反第15司令部设计的，画面是一个圆形的太阳，太阳色彩鲜红，太阳中间是毛主席的人头像，头像脸部向左侧方向，色彩是头发黑色，脸部金黄色，下面是金黄色的“毛主席万岁”5个字。

王洪文爱不释手地左右端详，连声说：“好，好，太好了！”高兴之余，忽又发现美中不足：头发是黑色不好看，在画面上出现黑色不协调，需要修改。他拿起电话，通知造反第15司令部，让他们立刻派人把这张图案取走连夜修改。

第二天的凌晨5点，王洪文把修改好的图案让陈阿大送到造反第二司令部去铸造。这是第二轻工业系统的造反派组织，下面有多家金属制品厂。这样，铸造“红太阳”毛主席像章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叫做风雷金属制品厂、战斗铝制品厂和朝阳工艺品加工厂的身上。

铸造工人献出的赤诚

制造毛主席像章是一项政治任务，铸造工人怀着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敬，把接受这一任务引以为荣。但又十分谨慎小心。怕由于自己的粗心，损伤主席形象，怕阶级敌人破坏，酿成重大政治事件。

下面是当年一位参加这枚拥有“毛主席万岁”5个字的像章的制造者的谈话：

“我叫陈明大，今年64岁，模具



全身缀满像章的虔诚者

师，当年朝阳工艺品加工厂铸造毛主席像章‘战斗小组’组长。

“那是1967年2月中旬，说是党交给我们一项任务，铸造这枚我们后来称作‘万岁’像章的任务，我感到很光荣。

“我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在旧社会靠拾荒乞讨来到上海，后来学徒打工，受尽资本家的剥削。解放后翻身作了主人，我从心底感谢共产党，感恩毛主席。

“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共10个人。2名模具师，是我和我徒弟，4名电镀工，2名检验员，2名配色员。我们小组被安排在厂内一幢大楼的地下室里工作，通道有警卫。这样，既可以使我们不受干扰，专心致志工作，又可以防止阶级敌人破坏——那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

“一切制做像章所需的材料、机器和工具都搬进了地下室。我们10个人齐心地像一个人。上级要求一周内完成任务，我们下了提前完成的保证。商量好，家也不回，工作在地下室，吃住也在地下室。我们师徒俩轮班工作，一个昼夜刻出了模子。但经两名检验员反复仔细检验，说有三处毛病：主席前额宽与设计图中的标准差半毫米；主席脸部下巴略尖了一点；主席的头发有微小的粗糙感。我虚心接受这些意见，并决定重新刻一个模子。

“又是一个昼夜的奋战，第二个模子刻了出来，而且顺利通过检验员的检验。我们开始试制，经过浇铸、配色、电镀等一系列工序，约30枚样章生产了出来，我们双手捧着这色彩鲜艳的太阳型园状的毛主席像章，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因为手里捧的不只是我们昼夜奋战一周的成果，而是我们工人献给毛主席的一颗颗忠心。我们敲锣打鼓，手捧像章，向上海造反总司令部去献礼。

“好事多磨，一天过后，造反总司令部转来了王洪文的指示：一、像章上主席的眼睛不够有神；二、红黄

两色还不够深不够鲜艳；重要的是第三，像章背面需加‘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八个字。

“我们按照要求，对模子作了技术性处理，加了8个字，调整了色彩。当第二次样章送到王洪文手里时，他满意了。由此，我们厂和风雷金属制品厂、战斗铝制品厂联合进行大批量生产。像章背面下方特别刻有‘联合’二字。后人因此称生产这枚像章的厂家为‘联合徽章厂’。这枚像章因正面有‘毛主席万岁’字样，被上海人称之为‘万岁像章’。这在当时上海生产的像章中，是第一枚有文字的像章。像章一投放市场，就被一抢而空，外省市也都纷纷来上海订购，可谓风靡一时。”

张春桥对“万岁像章”不满

这枚“毛主席万岁像章”，虽然一投入市场便很快告罄，深得当时群众的喜爱，但从北京开文革小组会议回沪的张春桥看了很不满意。要害是张春桥委托王洪文设计毛主席像章，意在纪念“一月革命胜利”，藏在心底话自然不便直说。而王洪文在把关时偏偏让把“毛主席万岁”5个字放在了像章正面，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放在了像章背面，这显然是王洪文没有吃透张春桥要求的这枚像章必须要很有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这句话。张春桥手把像章沉默片刻后对王洪文道：“这枚像章从图案到色彩都不错，但没有突出‘一月革命胜利’，就没有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这枚像章就应该突出‘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主旋律。”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王洪文也甚解其意，只是心里嘀咕，如果把‘一月革命胜利万岁’放在像章正面，把‘毛主席万岁’放在背面，岂不遭人非议？

张春桥知道王洪文将要说些什么，便不容置疑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一月革命风暴是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一月革命的胜利，谁敢说这是对主席的不忠？”

这样，王洪文再次主持了布置设计毛泽东新像章图案的会议。几天之后，约有200多张图案送到王洪文的办公室。经过王洪文的认真仔细的审阅和筛选，他把自己认为满意的两张送到张春桥那里。一张是由红星电机厂设计的，图案圆形，正上方是毛主席人头像，头像下面是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红旗下面是“毛主席万岁”5个字，再下面是“一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另一张是东方电镀表厂设计的，图案是长方形，正上方是毛主席侧面人头像，头像下面是上海人民广场中的一幢大楼（上海市人大办公楼），大楼旁是一杆杆飘飘扬扬的红旗，红旗下是“一月革命胜利万岁”8个字，图案的背面有“毛主席万岁”5个字。

张春桥反复“审阅”后，敲定了后者，并说：“这一张图案好，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上海，它突出了上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突出了‘一月革命伟大胜利’的深远意义。”

很快，这枚被人们称为“一月革命章”的主席像章，就在上海流行开了。

狂热中出现的悲剧

竞相制做像章，竞相佩戴像章，出现了狂热。

带有浓重政治色彩的制做像章热像巨风吹遍全国。案图千姿百态，结合行业特色，有破浪航行的万吨轮，有奔驰田野的汽车，有穿越云海的铁鹰，有冲锋向前的坦克……像章的大小悬殊，小的如一分硬币，大的赛过脸盆（挂在火车头上）……像章上的文字也越来越多样，由开始的“毛主席万岁”、“永远忠于毛主席”，到后来的“梅花喜欢满天雪”，“江山如此多娇”以及“最最幸福的时刻1969. 1. 25”等等。

人们的竞相佩戴，不仅由少到多，对像章的选择由小到大，而且戴与不戴，标志着对主席的忠与不忠，以及谁是革命群众谁是阶级敌人的政治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悲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记叙的就是1968年发生在上海的一樁“重大政治事件”。

事件起因于一枚设计“错位”的毛主席像章。

这是一枚长只有3厘米、宽2厘米的长方形横式主席像章。由上海东方微型电机厂设计铸造。像章的左上方刻着“大海航行靠舵手”8个草体字，上海称之为“大海航行章”。由于这枚像章图案设计得漂亮，有大海、狂浪、云烟、闪光、人像、刻字，再加上色彩华丽鲜艳，一投放市场就受到广大市民青睐，纷纷抢购。尽管这枚像章价格高于其他同类像章近一倍，人们仍成十成百购买，赠送外埠亲朋和同志。

“大海航行像章”每天以数以万枚的速度，流入厂矿、部队、学校、家庭，流向上海之外的广大地域，其影响越来越大。谁知正当这枚像章“名扬四方，声播天下”的时候，引起了那些“政治嗅觉敏锐”“眼睛能明察秋毫”的人的注意。终于“看出”了“大海航行像章”上的“破绽”——严重的政治“破绽”。一封封上告信雪片般飞向上海市革委会和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指责这枚像章排向错位：毛主席头像是坐右朝左，而破浪前进的轮船是坐左朝右方向行驶，这就形成了轮船与毛主席的脸部视向相“对峙”状。这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吗！

张春桥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审阅和批复革命群众的“革命来信”，并责成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少庸立即查清这一“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由市革委会、造反司令部和公检法组成的追查重大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专案组进驻上海东方微型机电

厂。

经过专案组“发动群众”、“调查研究”，终于挖出了一个4人组成的“小集团”。成员两男两女，都是26岁上下的青年人：

郑小马：“大海航行像章”的图案设计者，蓄意把像章图案设计错位，使船头对准毛主席人像冲撞，是含沙射影反对毛主席，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着干。

张勇强：“大海航行像章”模子的刻制者，有意刻成“错位”模子，使错误像章得以广泛流传，是与文化大革命唱对台戏。

李芳、杨浪花：有意为“错位”的像章配制颜色，是一种帮助反革命活动的行为，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满的罪恶流露。

四个人全部被关进了“造反总司令部”在江湾的一个五金材料仓库的“牛棚”里，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此时，张春桥再次发出指示，要求“专案组”乘胜前进，深挖“反革命小集团”背后的“靠山”。

没完没了的“交待”、“审查”、“批斗”，配合内查外调，折腾了近一个月。结果是四个年轻人的历史清清白白，社会关系又碰巧是一色的“红五类”。这一反革命政治事件才由从“牛棚”把四人放出而告终。

编者后记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反对“造神”运动，反对个人崇拜的。早在1970年12月他同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一次谈话中，就谈到了这一点。据斯诺记述说：“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对毛本人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

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引自斯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三联书店1971年7月第1版）毛主席对一轰而起的制造像章热，认为是对铝的极大浪费，直接了当地予以批评。

历史的车轮势不可挡。1976年10月我们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1981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并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形象，人民永远记着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批评了个人崇拜，端正了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并没有抹掉人民群众心中对毛主席的热爱，借用有些作家的话来说，就是“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更让人感到亲切、可敬。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收藏毛泽东像章，对制做像章热和收集像章加以研究，就不难理解了。今年是毛主席诞生一百周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地方组织了毛主席像章展览，留下像章，也留下了历史。

（责任编辑 洛松）

大顺“王朝”最后的42天

□王宏志



1644年3月16日清晨，崇祯帝像往常一样，在宫中的东左掖门召见考选官，以“安人心、戢狡谋，用兵足饷”为题，让32位考选官依次奏对。考选中途，忽然有个太监送上一封昌平失守的急报，崇祯看后，脸色大变，慌忙起身入内宫，仓皇召大臣问策，众臣皆不啻声。崇祯仰天长号：“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当晚，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已从昌平前进到清河。先头的几百游骑，已经到达北京的平则门、齐化门外。17日，大顺军开始围攻北京城。为了减少攻城损失，李自成派宣府投降太监杜勋入城，敦促崇祯“逊位”。崇祯用亲信太监与杜勋谈判，以拖延时间。城外的大顺军无法忍耐崇祯的拖延，继续攻城。太监曹化淳同大顺军接应，大顺军占领外城。崇祯得知外城失守，立即拔剑向袁贵妃砍去，命皇后自缢，再砍伤大女儿坤仪公主，还杀死只有几岁的小女儿昭仁公主，又杀死几个妃嫔。崇祯又将两个儿子永王和定王召来，令他们换装躲入民间。他还拿起笔来写了最后一道谕旨，令成国公朱纯臣统令军事，辅佐太子。办完这些事以后，崇祯命太监王承恩取酒来，两人对饮，喝得大醉，乘酒兴，率领几十名武装太监，骑马狂奔出宫，妄想突围出城。结果，冲不出去，只好又返回宫中。最后，崇祯拉着王承恩奔到万岁山（今北京景山），在东边一棵槐树上缢死。

19日，大顺军占领北京城，明朝覆灭了。这天中午，李自成由宰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大臣陪同，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入城前，李自成拔出箭来，去掉箭镞，向军队连连射出三箭，申明军纪：“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同时传令各军：“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然后，他身着青色箭衣，头戴毡笠，在众多骑兵拥护下，昂首阔步地走在北京城的大街上。当他们来到承天门（今天安门）前，李自成百感交加，抽出弓矢，对着“承天之门”的匾额射去，而后大笑离去。李自成入宫登皇极殿后，立即令人追查崇祯下落，两天以后，才在煤山发现他的尸体。

大顺军进入北京时，人民热烈欢迎，家家在门口设立香案。大顺军贴出安民

榜文，要求百姓“照常生理，罢市者斩！”北京的人民迅速安定下来。榜文中还有大军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的内容。

大顺政权入北京的当天，就向明朝在京的文武官员发布榜文，要求他们：“限次早一概报名汇察。”不愿再当官的，听其自便；愿当的，照前朝官位选用。但是，如违抗命令不去报名的，要处死；藏匿明朝官员的人家，要受到制裁。明朝覆亡的时候，北京城的明朝官员有两三千人。大顺政权决定分别对待，三品以上的，一般不予录用，四品以下的大都授予职务。故明官员多数按照大顺政权的命令，脱去昔日官服，身着青衣，头戴小帽，纷纷于次日（20日）前往刘宗敏、李过等大顺官员处报名。21日，他们又按照大顺朝的要求到承天门外听点。往日在下属、百姓面前威风凛凛的官老爷，这时一个个“缩首低眉，直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刘宗敏、牛金星等从他们中录用了近百名官员在中央任职；其余派往山海关及各地。大顺朝政权规定文武官员都乘马，不许乘轿。大顺的官制虽然仿照明朝，但为官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贫苦出身的农民将领，乡村的教书先生，登上了皇宫殿堂，成为大顺政权的要员；而昔日的贵戚、高官、勋爵却被拘押起来，罪恶大的都被杀头。

大顺在京期间，任命了许多地方官。充当地方官的主要是明朝降官中的文官和考中科举的士人。较之明朝官员廉洁奉公，因而地方得以安定。大顺派到定兴的县令刘钟泰，到任后执法很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县里的秩序很安定。在战争连绵的岁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在占领地区实行“三年免征”赋税的政策。那么，大顺政权的财政来源出自何处呢？一个是没收明朝官府的库存，再一个就是采取“追赃助饷”的政策，也就是强迫贪官富豪把贪污和盘剥百姓的钱财交出来，充作军饷和政府的开支。

到北京以后，这项工作由刘宗敏主持，具体规定，内阁大学士，交银10万两；部院、京堂、锦衣，7万或5万、3万；科道、吏部、兵部、翰林，5万、3

万、2万、1万；部属以下以千计。至于勋戚大员，没有定数，全都交出，才免一死。抗拒不交的，或交不足数的，用夹棍夹，迫使交足。有的没有交银子，由于为官清正，也没有受刑。有的虽然被大顺政权任命了官位，也仍需交银子或受到夹刑。象嘉定伯周奎受夹后，吐出赃银60万两，缎匹、珍宝不计其数。崇祯末年已经罢职的宰相陈演，是个没有学问的庸才，但他善于结交，聚敛财富。罢相之后，因财宝太多，一下走不了，暂留京师，恰好农民军攻入城，将他关押起来。陈演主动交银4万两，没有再受夹刑。后来他家仆人连连举报，说他在某处埋银数万两，在某处藏黄金、珠宝若干，派人去查，果然查到了。最后还是将他处死。

刘宗敏等人在追赃过程中，不断扩大范围，包括一些商人、书画家、富裕的读书人，也被拘捕来拷掠，逼他们交出钱财，至使京城内的中等人家也不安起来。一天，李自成到刘宗敏住处商议政事，看到院子里到处是受夹的人，哀号声凄惨，有的已经快死了。李自成令他停止这种做法，将拘捕行刑的人开释。“追赃助饷”的政策，扩大了打击面，造成树敌过多，连农民军内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宋献策等也都不满。

3月25日，巩焯率新政府官员、士绅、耆老，向李自成上表劝进。李自成开始没有同意。军师宋献策、宰相牛金星也以“大位未正，恐事有中变”来劝进。李自成终于允诺。于是筹备登基的各项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先将明太祖的“神主”迁往历代帝王庙，又将明朝其余的“木主”烧掉。还将皇极殿改为天祐殿，大明门改为大顺门，将乾清宫扁额上的“敬天法祖”四个字，改为“敬天爱民”。为了表明李自成的即位是天命所遣，一面向外声称从宫中搜出一个铜炉和一个漆盒，上边都刻有大顺的年号，永昌某年某月某日；同时又让一些僧人扮成从天竺来的喇嘛，说是听到中国改朝换代，有新帝登基，特此前来祝贺。还找来工匠，有的忙着铸新的国宝，上面镌刻着“继天立极”四个字；有的忙着为李自成缝制龙袍、皇冠。皇冠试了一次又一次，总是大小不合适，李自成都有些不耐烦了。由牛

金星主持，还制定了《永昌仪经》一卷，内容包括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规格等等。按照五德终始的循环思想，明朝以火德王，大顺取水灭火之意，以水德王，所以衣服尚蓝色。同时，还颁布了文字忌讳和谥法。主要避讳的字有“自”改“字”，“成”改“丞”，“忠”改“中”，“光”改“广”等15个。大顺颁布的谥法，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远祖，李自成的曾祖以下，“皆上谥号为皇帝，追尊其母吕氏为皇太后”。

登基日期原定4月17日。由于山海关形势的变化，李自成率军出征，只好更改日期。

在距北京700里的山海关，有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世居辽东，行伍出身。父亲吴襄官至锦州总兵，他以武举又荫袭父业。由于父子两代经营，他们在辽东地区拥有大量土地和军事力量。戎马一生的吴三桂，深知保存兵力的重要。清朝几次通过他的舅舅祖大寿招降他，他没有理睬。农民军进逼北京时，崇祯帝令他由宁远入援京师，他迟迟不行。当他率领4万军队好不容易走到河北丰润县时，北京已被农民军占领。他立即引兵回到山海关据守，观望形势。吴三桂夹在清朝和大顺政权之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何对待吴三桂这支力量，是大顺政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再往北，辽东地区有正在蓬勃发展的清朝。它的军力强盛，早就想要灭亡明朝，入主中原。如何对待清军南下，是大顺政权面临的更为严峻的问题。

西南的大西政权，本应是大顺政权的朋友。如果两股力量联合起来，任何反动势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李自成入北京后，不但没有主动与之联合；反而在张献忠进军四川时，派大顺军入川并任命大顺政权在四川的地方官。这就直接侵犯了张献忠的利益，招致双方的公开决裂。

对吴三桂这股力量，李自成比较重视。入京后不久，就派已经投降的明朝居庸关守将唐通，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明山海关总兵商策。唐通去时携带了大量黄金、彩缎、银两以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给儿子的家书。唐通还带兵二万，

以增强山海关的防务。吴三桂见到家书，考虑到父亲和家属以及财产都在北京，又听唐通夸赞李自成礼贤下士和答应将他父子封侯，加之见明朝总兵白广恩、牛成虎、姜瓖等，都已投降大顺军，决定投降李自成。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的防务，吴三桂率领部众入京朝见李自成。吴三桂行至玉田，得知父亲被拘禁，爱妾陈圆圆被掠，立即率众返回山海关，向唐通发动突然袭击。唐通没有准备，被赶到关城西北，忙向北京告急。吴三桂重占山海关后，决定投靠清朝。李自成接到吴三桂叛大顺的消息后，开始并没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仍在分兵南下。边报不断告急，李自成才被动地率亲大军东征。

4月13日，李自成、刘宗敏等率1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向山海关进军。

从21日上午八点钟起，李自成军与吴三桂军在石河激战。多尔袞率清军于21日晚到达山海关，驻在关城以东的欢喜岭上。清军并未立即入关，原因是吴三桂仍有疑虑。22日清晨，吴三桂眼见自己全军即将崩溃，急忙出关至欢喜岭上的威远台，求见多尔袞，请他迅速出兵。多尔袞让吴三桂先行打开关门，清军随后入关。李自成从唐通那儿知道清军已入关参战，就在石河以西列阵。吴三桂依多尔袞部署先出兵迎战。这一天，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对面几乎不见人。激战从上午持续到中午，吴三桂军队已经支持不住了。以逸待劳的清军，三吹号角，三声呐喊，两万铁甲骑兵蜂拥冲向农民军。大顺军已经战斗了两天一夜，渐渐支持不住，败下阵来。李自成下令撤退，清军乘胜追击40多里。李自成退至永平，整顿了兵马，原想再战，但军心已涣散。

造成东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入北京以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以为打下了北京，“江南可传檄下也。”当时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像现代史学家郭沫若所描述的那样：“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入城时严格的军纪不久松弛下来，将领追求享乐的风气，与日俱增。李自成以不好酒色闻名，然而进入皇宫后，同刘宗敏、李过等领导人，“分官

嫔，各三十人”。权将军刘宗敏则更甚，为了得到名妓陈圆圆，竟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拘捕拷问，以致激起吴三桂的投清。牛金星俨然以太平宰相自居，入城后，手持酒金扇，乘坐大轿往来拜客，遍请同乡。明朝降官为求升迁，纷纷登门拜望他，牛金星更是洋洋得意。很多将领“各踞巨室，藉设子女为乐。”下面的军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甚至带着几百辆车，到市场上抢掠，席卷一空。结果引起北京城内的百姓不满。牛金星、顾君恩向刘宗敏讲述民情将变的情形，刘宗敏不以为然地回答道：“现在只怕军变，不怕民变。军队是我们打天下依靠的力量，将士不满就不能为我们效力，而人民已经为我们控制；即使动摇，关上城门，分别围剿，不费什么力量就可以制服。而且，军队每天要耗费万金，若不去向百姓强取，怎么供养军队？”这时的刘宗敏这位来自农民出身的领导人，竟然支持军队抢掠百姓，结果是大大削弱了将士的斗志。当李自成决定率军东征时，农民军的将领却互相推诿“无人欲战者”，原因是“耽乐已久，殊无斗志。”大顺军的士卒个个身上“各怀重资”，“腰缠多者千余金，少者亦不下三四百金。人人有富足还乡之心，无勇往赴战之气。”

26日，东征大顺军疲惫地回到北京，李自成已无法在北京附近组织一支强大的武装以抵挡清军。两天后，大顺政权毅然作出放弃北京、向西撤退的决定。为了向天下表明，大顺朝还将回到北京，撤退之前，李自成在北京正式举行即位典礼。第二天，放火烧宫殿和九门城楼。五更时，农民军从南城开始撤出北京。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自3月19日进入北京，至4月30日撤出北京，前后42天。他们推翻了朱明王朝的统治，以农民政权在北京行使权力，这在北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辉煌的一页。然而，李自成进京到撤出去，又是一曲壮烈的悲歌，值得后人永世铭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献血救人，输血救命！

日本东京都红十字血液中心所长来华访问，在某市血站草坪上看见一堆堆端着搪瓷大茶缸往嗓子里灌水的风尘仆仆的农民，当他听说这些农民是专程来卖血时，惊呆了！……

浓浓的人血不是水

□张建平



摄影 孙建华

血，人体的“生命之河”。

在中国这个最讲血缘关系的古老国度，“血是珍贵的也是私有的”观念，根深蒂固。

牢不可破的友谊是用“鲜血凝成”，深不可分的亲情“血浓于水”，吃大亏了叫“倒了血霉”，赤胆忠心莫过于“献上满腔热血”……《三国演义》中，魏将夏侯惇左目中箭，他一边大叫“父精母血，不可弃也”，一边拔出箭来，将眼珠“纳于口中啖之”。其情其景，跃然纸上。

输血事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民素质的体现。我国目前每年献血人次约为全国人口的2%，大大低于国际5%的水平。其中无偿献血约占1.6%，公民义务献血约占43.8%，卖血则占54.6%。

卖血篇

日本东京都红十字血液中心所长松永信夫来华访问，在某市血站草坪上看见了一堆堆端着搪瓷大茶缸往嗓子里灌水的风尘仆仆的农民。当他听说这些农民是专程赶来卖血时，惊呆了！

卖血姑娘

“第一个卖血的人，象鲁迅所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真感谢他！”当这个来自鲁西北平原，读过三年初中的小崔姑娘这样对记者说时，在场的人无不感到震惊。

命运对她不公。在一次招工考试中，她总分第一，但指标却被村干部的子女顶去了。她不甘心象母亲那样嫁给一个她不爱的男人，然后在那个贫瘠的小山村中生儿育女，守着被烟熏黑的锅灶度过一生。这时，同村的田老二找上门来。她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她跟他去了。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离开这贫瘠的土地，干什么都行。第一次，300

毫升热血，她只得到60元……她却激动得一夜没睡。18岁，18年，她穷得连一个胸罩都买不起，如今却有了属于自己的60元，就象看见了在空中飞舞的幸福的黄手帕……她终于走上了那条路，成为田老二手下的“血民”。

卖血专业户

在浙江嘉湖地区一个村庄的北头，有三间茅屋。夫妻俩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接二连三出生的孩子的哭声，把“安安稳生过日子”的梦想打碎。大人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一年到头碗里见不到荤腥。

一天傍晚，男人从镇上买化肥回来，长期布满阴霾的脸上漾着笑。妻子好生奇怪。男人递给她一个纸包，她打开一看，“呀”地叫了起来，十几张5元一张的票子撒落了一地。

“哪来的？”妻的眼睛瞪得象核桃那么圆。

男人捋起袖子，一个紫色的针眼赫然跳入眼帘。

那天晚上，他们吃了一顿红烧肉。

渐渐地，男人不下地了。三个孩子的小嘴上也常是油光光的。两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妻子、孩子也跟他一样，一个月一次，将捋起袖子的胳膊伸进化验室黑洞洞的窗口……

昔日的茅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两层小楼，还有那6亩长满了荒草的责任田。

卖血专业村

山东省邹县某村1200多人，持有献血卡的600多人，占全村壮劳力的90%。一次上海某医院慕名到该村采血，村干部用喇叭一吆喝，村委会的小院立马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象正月十五闹花灯那么热闹。一上午采血3万毫升，并获“爱国奉

献”锦旗一面。

青海省乐都县马厂乡有1400多户，卖血户618户，计928人。其中年龄最大的63岁，最小的仅18岁，夫妻共同卖血的有200对。一年该乡卖血收入达64万之多。

据不完全统计，这支浩浩荡荡的卖血大军在我国有300万之众。

吸血鬼

血把头是卖血衍生出来的毒瘤。

王某，40多岁，中等身材，满面红光。走路时趾高气扬，对村民皆为俯视，因获雅号“望天”。他现在住一栋两层小楼，家里高级组合音响、29寸彩电、摩托车、空调一应俱全。10年前，他还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一个偶然的会使他走进了卖血的行列。凭着“混混”特有的狡黠，着几篮土特产和三寸不烂之舌，他和某医院化验室一位穿白大褂的成为挚友。礼尚往来，他得到了联系卖血的美差。

刚接受任务时他心里有点发怵，但很快他便进入了“角色”，他发现对付村民需要另一副面孔。他学会了打官腔，迈八字步。卖血的“管理费”从3元涨到7元。一年后他成了一个拥有本村和邻村600多名血民的“霸王”，一个月收入几千元的暴发户。

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凡是卖血较集中的乡村都有这样的“吸血鬼”。第一次卖血的农民要向他们交1—10元的“管理费”，固定的血民每卖一次血要交1—3元的“管理费”。

卖血，是输血事业的“败血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抽查结果表明，正常人的血细胞和血浆的比积为50%，个体卖血的不足35%，血液质量明显下降。

卖血者一般都持有两至三个献血证，他们反复献血，或隐瞒病情，或冒名顶替，血源污染的情况屡有

发生!

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四川输血感染肝炎的情况也屡有发生。

献血救人,输血救命,这圣洁的人道主义大厦不能再靠卖血者瘦削的脊梁支撑了!

公民义务献血篇

献血是公民的义务,不是为谋生。公民义务献血制度犹如强劲的东风,涤荡着渗透在血液中的铜臭。但多年来,公民义务献血制度在全国发展不平衡的实践,使我们不得不做深层的思考……

1978年11月24日,国务院以“国发(1987)242号”文件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加强输血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对血霸要坚决打击和取缔”,血站要“统一管理血源,统一组织采血,保证医疗和战备储备生产血液制品用血的需要,供应医院用血。”(即后来所说的“三统一”)并规定:“男20岁至50岁,女20岁至45岁,身体健康者,都有献血的义务……对献血者除精神鼓励外,应发给适当的营养补助和副食品票证。”

242号文件标志着我国输血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十几年来,凡认真推行公民义务献血制度的城市都基本扭转了缺血现象,提高了血液质量,保证了临床用血。

但公民义务献血制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输血协会对全国13个大中城市的调查显示,除大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百分之百地供应全市医疗用血外,其余城市由血站供血的为40%至80%不等,而在这40%至80%中,公民义务献血的只占其中的42.8%。

什么原因使公民义务献血制度十多年来步履蹒跚?

都是钱闹的

我国现在大中小城市600多个,血站仅不足200所,三分之二的城市没有血站。

有的城市血站因条件限制不能满足本地区用血,有的则为了赚钱盲目发展血液制品,人为地刺激了个体卖血者。有的城市血站条件不错,公民义务献血也有了很好的基础,但仍不能实行“三统一”。

“都是钱闹的”。一位大城市中心血站的负责人说:“我们抽一袋血(200毫升)给献血员54元(据说现在涨到60元),52元是营养费,2元茶点费。医院从我们这拿一袋68元。为什么有14元的差价,物价局能批准?我们采血的成本中,有体检费,宣传费、血袋费,器材折旧费,还要付给区县“献血办”管理费,交通费。当然,血站要有节余。血站要发展,国家一时拿不出很多的投资。这个价格对我国输血事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一些血倒爷不顾卫生部三令五申,利用这个差价发不义之财,他们抽一袋血只付给农民40元或50元,卖给医院则60元或更高……”

“再有就是医院,它承担公民义务献血任务,要向所在地献血办公室交管理费。体检10个义务献血的,合格的只有二三个,而个体卖血的十个有八九个合格。这倒不是两者在血液质量上有多少差别,而是‘尽义务’的不那么情愿尽义务,而卖血的则千方百计把血卖出去。粗算一下,抽一个卖血的要比抽一个‘义务献血’的节约8元。现在都讲经济效益,有的医院就愿意抽那些送上门来的,不愿抽那些‘抬上轿’来的……”

高额补贴休假

昆明市血站负责人对记者说,有的单位在组织公民义务献血中不

讲义气只讲钱,献200毫升血补贴三四百元,高的近千元,超过国家标准近20倍!献血后的休假由一个星期延长到半个月。

北京市1991年共组织30万人次献血,其中公民义务献血14万多人。以平均每人补助300元为例,14万人就要补助4200万元,全国一年又该有多少?

还有的单位组织献血者免费旅游观光,规定献血者分房、晋级优先……奉献变成了索取,义务变成权利,公民义务献血变成了“高价卖血”……

记者采访中,一些单位领导对义务献血中的高补贴、长休假不置可否。有的甚至说,现在是初级阶段,商品经济,哪有白给的东西?歌星唱一两支歌得几千元,农民进城贩一趟菜也弄个三五张,献血,是从胳膊里往上抽真东西,不给钱谁干?

有治没治

一些单位企业为完成献血指标用补贴刺激,使血贩子觉得有机可乘。他们主动出击,以为企业“排忧解难”之名,行“冒名顶替”之实。

北京对冒名顶替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1、发现后不算当年指标。2、全市通报批评。3、每个罚款数百元。4、用血出问题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北京某厂接到献血任务后,厂长即开车到河北某县找来十几个卖血者顶替。血站闻后及时抓了这个“典型”。但几经交涉,罚款未见分文。原来厂方经过调查弄清,血站徒有其表,没有行政权、执法权,收罚款有虚张声势之嫌。血站没治。

输血立法

不搞输血立法,公民义务献血制度就有夭折的危险!这几乎是输血界的一致呼声。

1989年2月,我国第一个地方

性输血法规《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诞生了。

1992年5月,《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诞生了。

吉林、哈尔滨、杭州等省市相继效法。

从已经出台和没有出台的输血条例中我们看到,条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血液及血液制品商品化问题,而只是把公民义务献血制度法律化。

《上海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改革,即建立“家庭储值制”。如无偿向血站献血200毫升,以后本人和直系亲属需要血时可享用当初献血的三至五倍的血量。

然而,这种制度受到了公费医疗的困扰。一位血站负责人说:“对没有公费医疗的居民和农民可以实行家庭储值制。但公费医疗的怎么办?我认为公费医疗的用药应该自费,这样才能鼓励大家献血。但这涉及到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问题,这又是我们输血界力所不能及了。”

《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条例》颁布一年来的情况表明,北京市公民义务献血的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血源紧张的矛盾。个体献血(卖血的)仍占北京市年用血量的50%,高额补贴长休假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位长期在输血界工作的专家指出:输血立法千头万绪,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必须是走世界通行的道路——实现自愿无偿献血。血液及其制品商品化如在我国发展下去,势必引起进一步的混乱。

血液及血液制品商品化是输血立法必须解决而又暂时无力解决的问题。输血立法是否也走入了怪圈?

无偿献血篇

献血救死扶伤,是利于他人又

无损于自己的无私高尚的行为,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基本体现。

科学实验和国内外长期实践证明,血虽然宝贵,但抽出人体中的5%—10%,帮助受血者,对献血者本人无害。人造袋血浆的出现,只能在短时间内起到补充血容量的作用,并没有引起输血史上的革命。血,这生命的“原生质”,还只能从人体中获取。

输血专家指出,只有自愿无偿献血,才是解决医疗用血最有效的途径。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向世界各国发出呼吁,要求采取无偿献血和免费输血的原则。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世界上多数国家已从有偿献血转变为无偿献血。日本天皇、奥地利总理、英国首相都在本国带头无偿献血……

中国呢?前不久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亚太地区输血会议上,我国无偿献血排在最后几名。

难道中国的无偿献血永远是“血色黄昏”吗?

中国的月亮也圆

1923年,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部下的一名士兵患了败血症,被派去为其献血的士兵大都来自农村,对抽血非常恐惧。冯玉祥得知后即赶到现场,当着士兵的面献血200毫升……

1944年,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昆明建立了血库,制备冻干血浆支援前线。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倪宝春博士带头无偿献血,社会各界7000多人伸出了胳膊……

1953年,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沈阳建立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型血站。辽宁省及沈阳市42000多人报名参加体检,7000多人无私奉献出自己的热血……

1986年9月5日是北京市第一个无偿献血日。卫生部长陈敏章(当时为副部长)带头献血200毫

升。事后他对记者说:“献血是公民的义务,我是普通公民,献血理所当然……”

1991年8月30日,北京市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赈灾无偿献血”活动。1943名北京人将献血后所得的7.6万多元营养费献给了华东水灾灾民……

北京第十个无偿 献血者姜昆

树大招风?也许是,因为他说过,他喜欢在悬崖边散步。总之当领导在排练场宣布了献血指标后,大家的目光便齐刷刷地对准了姜昆。“别以为我真的是掉进狮虎山里嘴硬腿软的孬种,钻进钱眼儿爬不出的毛毛虫。”

他报名了。

就象在中央电视台转播中心,用幽默驱散了千万人的烦恼。姜昆乐呵呵地捋起袖子,200毫升鲜血缓缓流进血袋……

铺路石

全国无偿献血次数和数量最多的是他——首都特钢公司650轧钢车间工人刘光震。10余年来,他无偿献血24次,5800毫升。累计已超过了他自己血量的总和。厂里有人对他不理解,他说,我是块铺路石,能让后人踩着走出一条新路。

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医疗用水量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

1990年6月9日,参加中国输血协会一届二次理事会的39名理事,联名上书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呼吁中央领导号召各级领导带头无偿献血……

我国第一个输血法《公民义务献血条例》正在修改中……

无偿献血已展露出新的曙光,在世纪的转折关口,我们能不能迈出紧要的几步?

(责任编辑:王源)

瞿秋白

□立之

是怎样被置于死地的



本文作者是瞿秋白生前的战友，他以鲜为人知的亲见亲闻，披露了瞿秋白最后七年间的_{不幸}遭际。

——编者

1928年夏天，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召开。这期间，瞿秋白和我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同学们）有较多的接触。

秋白态度和蔼，知识渊博，他和我们在一起从不炫耀自己，兴之所至，还谈文学和金石学。我还见过他为东大图书馆的一位女讲师镌刻的一枚石章：雕凿了一组狮纽，四个朱文古字，是“梨盒落华”，是这位讲师的姓氏里渥诺娃的谐音，字根是狮子的含意。

就在中共六大召开前，我们东大中国班的同学掀起了反官僚主义学潮，主要对象是“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武和景（安德列也夫）和东大校长苏苗茨基。同学们反对翻译人员垄断学习生活，要求允准中国同学研究马列原著，在小组或支部会上可直抒己见，不受特权翻译们的控制压抑。由于瞿秋白、李振瀛、向忠发等以中共代表团名义，深入同学们中间查明底蕴，认为要求合理，揭露“旅莫支部”的缺点错误也属实，结果是：学校增聘了俄语教师，允许中国学生享受图书馆讲师辅导，在会议中有自由发言权。最大收获是：取消残存的“旅莫支部”，把武和景、侯玉芝等人遣送回国，让他们到真正的革命阵地中去实践学习。这是同学们一次大快人心的胜利。大家从这次事件中，都觉得瞿秋白处理问题实事求是，公正无私。

这里我应该插说一句，中国共产党员到莫斯科学习或工作，自然应该参加联共党支部生活，为什么又建立中共“旅莫支部”呢？这是因为，中国学生逗留时间短促，为了解除言语不通，习俗不同的困难，因此袭用在法国的“旅欧支部”做法，在莫斯科也成立了“旅莫支部”。按理说，在帝国主义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从事地下活动，组建自己的支部，这是正确合理的。而在自己的大家庭中又另立地域性的特殊单元，这不符合共产国际的原则。何况，日久顽生，临时措施竟演变成了永久性的特权机构。主持人任卓宣（叶青，后叛党）和武和景等人，先后擅权专横，成了学习的障碍。

东大学潮的胜利结束，同学们都感到十分欣慰，它却给秋白带来了灾难。从此，这一由头，引出了瞿秋白最后七年来一连串的不幸遭遇，甚至秋白之死也是这一黑线划的句号。简单地讲，在东大学潮中，米夫与王明是渔翁得利者，但他们对秋白的嫌隙也深化了。

原因是：二十年代末期，党内思想相当混乱，权力之争日益泛滥，这时的米夫是斯大林宠信的“中国通”，他的官职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下属中国局（司）局长兼孙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是拉狄克）。值此争论不休之际，米夫有野心企图乘机控制中国的党。王明是米夫的扈从，米夫策划利用王明一伙人组成班底，

自己可当上中国党的太上皇。

在东大学潮中，张国焘向米夫告密说：瞿秋白向东方部长库西宁告了状，说米夫不称职，建议撤换米夫，以鲍罗廷接替中国局局长职位。张国焘的谄媚，促使米夫王明下决心翦除瞿秋白。

米夫、王明一伙制定了一石两鸟的策略：既取消“旅莫支部”，将武和景、侯玉芝遣送回国，由王明博古一伙人接收权力，并将它移植于中山大学。同时，借此将东大的中国班裁撤并入孙大，顺便驱逐了学潮带头人李侠公、朱代杰等人；继而又宣布停办孙大，改建中国大学（全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又名李大钊大学）。校长米夫（原孙大校长拉狄克撤职，后来被清洗处死），校党委就是王明、博古一伙人。这样是第一步，他们以为是削弱了瞿秋白的群众基础。

米夫、王明为了牢固地把掌住权力、排除瞿秋白在同学中的影响，他们在同学中制造阴影，把从东大兼来的同学和原孙大余留的同学间划出沟线，挑拨他们不团结，互相歧视。开始，遣送大部份同学回国，其途径都是冒死的险地，例为：陆路由中俄国境界交界线赤塔、五站等处偷越；水路由海参崴直航南朝鲜转道大连、青岛等地；全是荆棘丛生的恐怖岔口。这是王明一伙人专为异己分子划出的一条险道，借此消除异己，未送走的全部下放劳动，男生分到各类工厂劳动（笔者随同一组人在铁工厂做钳工），女生分到纱厂或医护部门。后来，又要甄别登记，搞人人过关，凡属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各校的中国学生无一例外。这是开始为组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王明博古路线扫清道路。

第二步，在人人过关中散播流言，说有一秘密小组织——“江浙同乡会”在搞非法活动。背后是一个大头（隐射瞿秋白），骨干分子是列宁学院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和孙大的顾谷宜等人。此时，张国焘又自告奋勇，愿意到各校“摸底”，要挖掘反党的地下活动。张妻杨子烈混在80个女同学中巧言令色，蒙蔽女同学，有人以为真有什么“江浙同乡会”组织，以致不敢接近杨之华。

接着，王明一伙又让向忠发在大会上放肆狂言：“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都要枪毙！”这么一来，大家戒慎恐惧、万马齐喑了。以前在东大学潮中，有人还轻蔑这个武汉江面上的船夫，一转眼，他能大放厥辞，说明运动升级了。

在中共六大召开前的筹备期间，米夫企图用格格乌（现名克格勃）惯常的手段，强制将瞿秋白和黄平二人送入精神病院，施以人身迫害。幸而斯大林忽然省悟，他觉察到，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又是由米夫一手包揽，如果中共负责人缺席——上一届的老领导陈独秀又不愿作替罪羊，拒绝到莫斯科出席，新领导

瞿秋白如果被幽禁在精神病院挨整，那这次大会给予共产国际其他兄弟党的印象，真不可思议。刚愎的斯大林不得不下令召回瞿秋白和黄平。并且，由斯大林自己主持召开一次碰头会，指定米夫、王明、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苏兆征、黄平等人参加。斯大林在这次小会上先谈了一通他的“第三时期”的观点，然后，亲自部署任务，说明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内容与重点，为此指定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在共产国际六大是主要发言人之一。这样一来，米夫王明以精神病患者来迫害瞿秋白的，计策没有得逞。

中共六大召开前夕，米夫先请出布哈林（这时还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主持一个预备会议，定下调子，划出鸿沟，挑动张国焘发难攻击瞿秋白。然后，在六大全会上，蓄意挑剔瞿秋白的政治报告，造成对瞿秋白的四面楚歌——一是为陈独秀老家长辩解，彭述之否定瞿秋白的八七会议领导，认为一无是处；二是折衷意见，周恩来认为八七会议正确与谬误参半，瞿秋白应该检讨改正；三是坚决反对瞿秋白再领导党，张国焘说瞿秋白有严重的错误；第四是指明瞿秋白犯了“盲动主义”错误。王明传达“上级指示”说，中共领导人必须是工人成份。这是隐喻新的领导人将是向忠发。

瞿秋白就是在这四面楚歌中被拉下马的。

中共六大的召开，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但也只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作了两次讲话，平时他不常到会。在20多天的会期中，米夫是每会必到，而且傲然裁决重大问题。当时他虽只是共产国际东方部下属局级单位的一个小头头，竟然“代表国际”来任意支配中共六大。主要意图是拉下瞿秋白，另立新中央。新的领导班子由米夫的名单构成，当然将完全置于米夫控制之下。大会给瞿秋白扣上一明一暗两顶帽子：明的叫“盲动主义”，暗的拎在手里，叫“半托洛茨基主义”。

中共六大全会一反常规，政治局选举的换届名单，不是由上一届党中央讨论后提名，而是由米夫“代表国际”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宣读后“一致通过！”新的领导班子成员七人：指定向忠发充任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周恩来管军委、项英管工运，瞿秋白和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委，但留驻莫斯科，未经许可不得回国。另派邓中夏和余飞作为中国工会代表，留驻莫斯科“赤色职工国际”；又派王若飞充作中国农会代表，留驻莫斯科“农民国际”；留驻莫斯科的五个人合组为“中共驻苏代表团”，以瞿秋白为团长。

瞿秋白就是为此被控制在米夫手掌中的。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的小组，事实是莫须有，真相只是有几个同学在休假日聚在一起，自己举炊，煎炒烹调了一次中国饭菜解馋，说说笑笑，被人戏说成是同乡会。王明一伙为打击瞿秋白，就借此编织为政治帽子。

邓中夏、余飞两人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惹恼了米

夫，他老羞成怒地说：学校的事由我校长负责，代表团无权干预。邓余二人不同意，据理力争，向共产国际反映，他们认为，学校是应该认真负责教育事宜，而同学们的思想动态关系到今后回国的工作，代表团有责任考查监督，也应该协助学校清除一些对学习生活的障碍。米夫无法置辩，就用“老子党”的名义召集了中国大学、列宁学院、步兵学校等中国同学开大会。由莫斯科市直属区委书记讲话。按当时的特殊体制，中国留学生受多头领导：一是隶属原苏维埃政府教育部管辖；二是受莫斯科市所属区领导；三是受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四是受中共代表团监督领导。这个区委书记满脑子装的是指挥棒，却不懂得中国革命的斗争史。他在大会上大讲一通联共扶助中共的功绩，指斥中共犯过不少错误，最后训诫中共党员必须听从联共指导，学生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学习，不准闹事和干扰学习生活，特别指明中共代表团在学校内干扰学习，是不行的，不许的……云云。区委书记疾言厉色，语无伦次，挥臂扬拳，口沫飞溅，王明一伙煞是高兴，热烈鼓掌捧场。而同学们则反映冷淡、忿懑，大家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与这类指挥棒遥控分不开的。

问题反映到最高层，引起共产国际正视，由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委、结合中共代表团，三方组成一个调查组，进行实质性的广泛调查。结果，据列宁学院负责人康采诺娃证实：反党的“同乡会”组织，纯属虚构臆断。

真相大白，瞿秋白回到莫斯科，米夫、王明只好怒目而视，无可奈何。不过，他们还是利用职权又编造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书”，内容是指责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孙大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错误，……云云。

但米夫还不甘心，又罗织瞿秋白是“托派嫌疑”。这在当时——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这个“托派”帽子等于一道催命符，不论真伪，谁被扣上谁就濒临死刑判决。斯大林就以这套罪名杀戮了许多党员。米夫如法泡制，他料想瞿秋白逃不出魔掌，他亮出的证据是：列宁学院的中国托派头目刘仁静，是瞿秋白和王若飞私袒下回上海的，而且还怂恿刘在归国途中绕道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确定了中国托派的组织纲领。并将上次诬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顾谷宜等人，都列入“托派”黑名单。其实，米夫又妄费心机，据刘仁静本人说：绕道欧洲归国是共产国际批准的，至于川资恐不足，由王若飞私人资助数百美元，纯属个人感情，王并不知道绕道土耳其的事。此事，因斯大林没点头，米夫的复仇之箭又射偏了。

瞿秋白一直在莫斯科受折磨，到1930年8月才告一段落。

中共六大由米夫包办，捧出向忠发为总书记。向原

是武汉市的划船工人，知识浅薄，软弱无能，应付不了当时复杂斗争的国内环境，遇事束手无策（向于1931年被捕后叛党，仍被国民党政府枪毙）。组织部长李立

三则左倾盲动，擅自开除陈独秀党籍、撤销蔡和森的宣传部长职务并将蔡送莫斯科受惩处，此外，还过左地杀了一个黄埔军校一期学生黄警魂，怀疑黄是奸细。

瞿秋白与杨之华



李立三的妄自尊大,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他主张一省或数省武装夺取政权,竟将党和团以及工会合并为一个准备武装暴动的“行动委员会”,硬性制订全国总暴动的冒险计划。两个德国籍的国际代表向李劝告阻止,李立三不接受意见,反唇相讥,指斥德国顾问是右派观点。李立三的急躁冒进打乱了米夫的如意算盘,他原想先把向忠发扶上第一把交椅,在过渡期整饬,再将王明一伙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端出。此时此刻,怎么办?环顾左右,王明一伙都属稚嫩,虽然“二十八个”中也有足智多谋和左右逢源的舌辩之士,但都不孚众望,不能收拾残局,对付狂妄自大桀傲难驯的李立三,这些人即使背了尚方宝剑也难负此重任。

米夫苦思冥想,终于琢磨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只有用周恩来能限制李立三。于是,电请周恩来来莫斯科商谈改组中共领导班子,这是1930年4月间的事。米夫的想法是:请周恩来挂帅平定李立三,把“二十八个”先混在跑龙套里推出前台,然后,再逐渐编排以后节目。

周恩来深受国际的优厚礼遇,斯大林器重推崇,米夫自然也执礼甚恭。但周公胸有甲兵,对党的建设富有韬略,他首先提出为瞿秋白解冻。最后,米夫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缓解意见——决定由周瞿合力去清算李立三,然后,仍由米夫亲自出马,安排中共领导班子的改组。当时米夫的条件是:“严惩李立三!”

秋白回到上海,六届三中全会上,把李立三打发到莫斯科去反省认错。

1931年1月,米夫亲自到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路线正式走出前台。以前,王明于1925年和俞秀松、吴亮平等同船去苏联时,既非党员又非团员,只是武昌商学校学生会成员,到莫斯科以后,在俄文速成班巴结米夫,1926年才加入共青团,1928年被米夫提拔为中国大学的校党委,现在这个新党员竟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代总书记!实属史无前例。瞿秋白又被黜出党中央,被排斥的还有任弼时、李维汉、贺昌等人。新的领导班子是:周恩来仍分管军委,康生任组织部长,沈泽民任宣传部长,秦邦宪任少共书记,张闻天也进了政治局。王明博古沐猴而冠,洋洋得意,中共开始了几年厄运。

瞿秋白被撵出政治局之后,罗章龙另立中央,不承认六届四中全会,被斥为“反党”,竟被从莫斯科召回任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开除党籍,张说:这是挥泪斩马谡!何孟雄、林育南、胡也频、柔石、李求实、殷夫、冯铿、恽雨棠等23人反对王明路线,却死于暗算。大批同志被开除出党,一律扣上“托派”帽子。

瞿秋白淡泊明志,摆脱了名缰利锁,抉择了自己有素养的文艺事业,专门致力于文学译著。开始争取鲁迅,促使鲁迅与茅盾合作,共同为无产阶级文艺工作携

手并进。他写杂文,树立普罗文学的大旗,联合鲁迅、茅盾、冯雪峰等人协同作战,修订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委决议,以此抨击“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等谬误。

此时,张闻天开始在背后称瞿秋白为普列汉诺夫(讽喻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后来成了孟什维克),有少数文委的作家对秋白持怀疑态度,李竹声(李妻朱自纯是王明的情妇),竟语无伦次地说:“你这种人,只有一棍子打出党!”瞿秋白依然冷静地坦荡地从事自己的译著。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时,瞿秋白到城隍庙等书场去听说书,采集民间呼声,编写抗日的鼓词。还奉劝某些作家们学习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不要躲在亭子间里创造文学,应该走到群众中去汲取素材。王明胆小如鼠,他按康生的布置,伪装疗病躲在教会医院里不敢露面。

这时党中央突然出了非常事件:由于中央特工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后也叛党,中央机关被破坏,“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不少成员纷纷投敌——李竹声、盛宗亮、卜世畴、王保礼、孙际明等等都改投了国民党中统CC派。王明惊慌失措,赶快溜出教会医院逃亡到莫斯科去了。“临时中央”以博古为首,率领张闻天、王稼祥等匆匆奔往瑞金,上海成了一片空白。瞿秋白虎口余生,侥幸只身撤离上海,直到1934年1月,秋白才奉召赴瑞金。

瞿秋白到瑞金后,继续致力于革命文艺工作,努力培育戏剧人才,并与徐特立共同办苏维埃大学,还担任了教育人民委员。不久,中央红军宣布长征,放弃苏区,并以“三人团”名义通知瞿秋白留驻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瞿秋白本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仍然兴致勃勃地筹备排练准备演出。生活上有困难,例如缺少灯油、食盐等等,他就早眠和淡食。当时秋白35岁,精力旺盛。有人诡辩说:“三人团”是照顾瞿秋白体弱多病,恐不胜长途跋涉,可以让他潜隐在平常百姓家。临别时,秋白将自己的坐骑赠予徐特立,马僮随徐老远行,凄然握别。秋白转辗又途遇负伤出院的陈毅,陈老总亟关切地问:怎么步行掉队了?也拟赠马代步。秋白告以是奉命留守,不得行也。陈老总仰天长嘘,怏怏然,不料竟成永诀!

综合计数,从莫斯科、上海、瑞金、长汀,这七年间,瞿秋白这一系列的遭遇,都隐现出一道阴影,这是一只黑手在追踪迫害。

瞿秋白一生豁达,不计恩仇,但他临终前对人世沧桑也有哀伤,因此写了《多余的话》。他自己是“花落知世贱,一任风和雨”,并不考虑身后的褒贬评说,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最纯洁的记录,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责任编辑:刘家驹)

郑发，一个河南许昌的乡下农民，一个很平常的人。就因为叫了“郑发”，不少好事者“越传越奇”。

首先将郑发大名扬播天下的，乃是唐人先生，他描写蒋介石统治大陆 22 年兴衰史的 8 卷大部头《金陵春梦》，开宗名义第一篇就是《郑三发子》。

说的是：光绪年间，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先嫁给河南许州繁城镇一位郑姓农民。生有三子，长子郑绍发，二儿郑二发与三儿郑三发子。郑家世代农民，老实巴交，唯有三发子好吃懒做，不务正业，其母却溺爱三发子。日子虽然清苦，倒也过得去。

光绪十八年(1892)，河南许州一带，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为了活命，王采玉和丈夫各奔一方。采玉带着三发子，要饭到了开封府，流落在相国寺后檐下。经人介绍，给一位浙江籍的师爷当奶妈，乃至做了填房。后来一起随蒋师爷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郑三发子随即改姓蒋，说不完的辛酸悲苦，立志要出人头地，后来发迹，成了蒋总司令、主席、委员长、总统。

这本是一段演义，说者说之，听者听之。当年为了形势需要，批判“人民公敌蒋介石”，添油加醋，是可以理解的。

物换星移，过去的“总统府”，换成了“江苏省政协”，五十年代时，当省政协的工作人员在清理“总统府”一些旧文件柜时，将一些档案移交给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其中一堆积满尘土的文件中有二封署名“郑发”给蒋介石的要求见面的信，说明真有“郑发”其人，难怪唐人在《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中，一本正经地说——

1949 年冬天，一位蒋介石的侍卫官退休来港，寻亲访友，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长兄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 30 年，已经记不起这五页“八行笺”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了。

再仔细揣摩郑发给蒋介石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来自南京升州路糯米巷 15 号，寄件人为郑发。由国民政府机要员高桂楠登记的，收文号为“总收文京府字第 15517 号”，收文时间为卅五年(1946)十二月十三日。全文——

主席钧鉴：

敬禀者窃郑发，年六十二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光绪二十五年，曾在开封郑老师福安馆内求学时与主席系属同学，别后数十年始终不克一晤函。民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因发离家未遇，殊觉怅然。发分别来京晋谒无缘(些)，同学敬请

崇安

民人郑发拜启

第二封信仍是从南京升州路糯米巷 15 号发出的，寄件人郑发，但时间确系卅七年(1948)六月二日，由

总统府机要员童子敬登记的，“总收文总字第 326 号”。全文——

大总统钧鉴

敬禀者窃发年六十四岁，原籍河南许昌灵沟镇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曾于开封郑老师馆内求学时与总座同学。别后数十年间始终未克一晤。至三十五年发奔至南京，蒙总座派吴秘书长鼎昌召见，心感莫忘。发今再来京因许昌共匪扰乱，寻获郑发等语，迫不得已，发不顾生死星夜奔至南京，以避免危险。专呈一函，恳求总座恩准召见，以解数十年渴望。幸得一见，感戴之至。肃此敬请

崇安

步兵少校郑发 鞠躬

五月二十三日

暮春时节，笔者在南京城南升州路寻找到了糯米巷。也真有个 15 号，是个旧式建筑，高门楼，房有几进，是个院落。旁边不远是居委会，经我打听，这里解放前是河南会馆，郑发在此住过。

47 年前，12 月初，糯米巷河南会馆的一间客房内，60 多岁的郑发，专程从河南来找“胞弟”蒋中正，可是只由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接见。

接见后郑发不但没有遭到“冒充领袖亲戚”获诈骗罪，当他回到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及市级官员纷纷引为座上客。还得到个光拿干薪的“步兵少校”头衔。

据河南省政协李静之回忆，1948 年开封第一次解放前一天，河南在南京的一些头面人物在大三元饭店聚餐时，郑发也在座。一位张姓的河南老乡介绍说，老头子非常慈祥，两只明亮的眼睛，一撮小胡子，骨架、轮廓都非常像蒋介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的脸上的皱纹，油墨的肤色，臃肿的身态和已经成了弓字形的脊背……

郑发曾对他说，我去重庆找他(指蒋介石)，没看见他，那个姓戴(指戴笠)的派了四个人陪着我，不准我这，不准我那，我受不了。民国三十五年便回家了，这些年间的家乡情形你是知道的，天灾人祸生活困难，来南京也没有见到他，唉。

那么，郑发信中一再强调或暗示给蒋介石的是什么呢？

两封信虽不是发自同一时间，可这位郑大爷一口咬定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在开封郑老师馆内同过学。根据国民党的正史及毛恩诚、陈布雷的《蒋介石先生年谱》中记载，是年“公十三岁，始出就外傅，往嵯县葛溪，从姚宗元读尚书。”这一年蒋介石正好不在溪口，是一巧合？还是另有隐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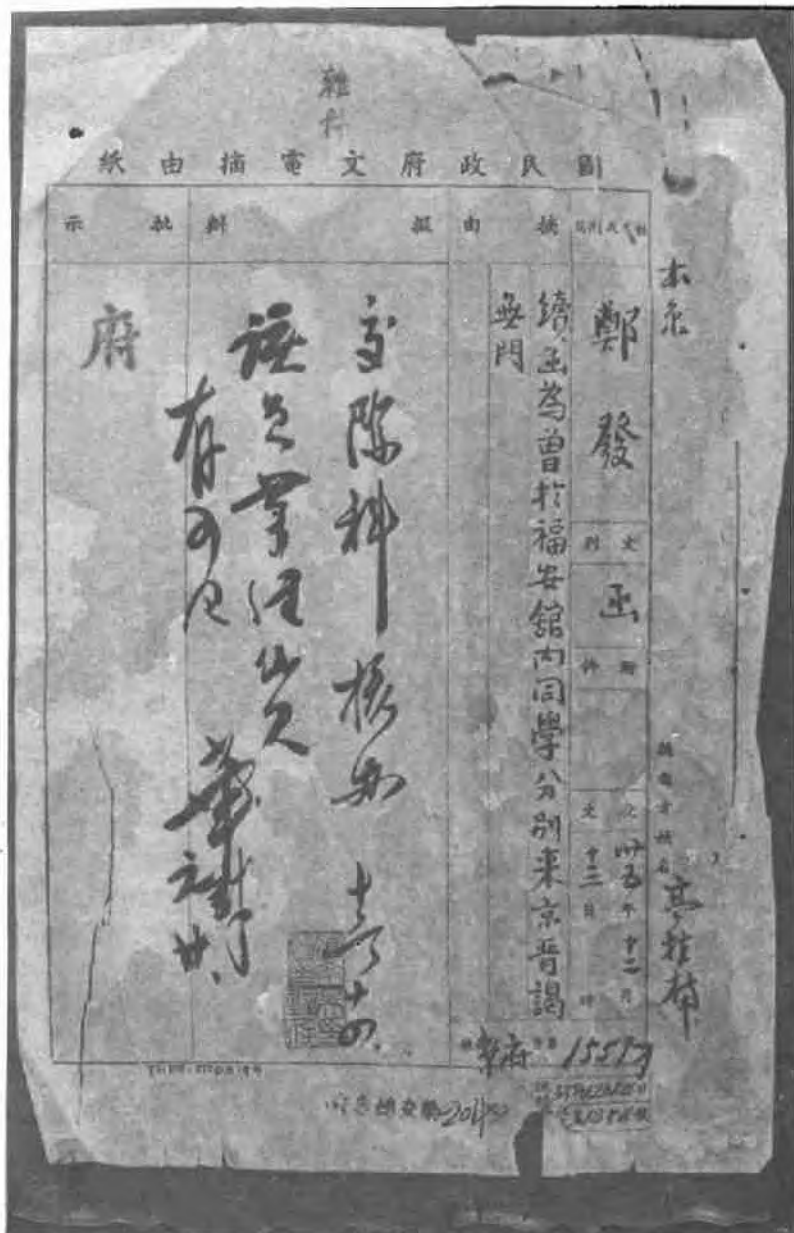
其次，郑发信中说“民(国)十八年秋并蒙主席召见”，应该更正为十九年，即 1930 年，此时中原大战刚

结束，蒋介石正好在河南。为什么信中郑发不敢妄称自己是蒋的“胞兄”呢？

沈醉在撰写《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

当时在重庆曾闹得满城风雨，许多人都听到过的一件新闻：蒋介石的亲哥哥郑绍发从河南到重庆找蒋介石，而蒋介石不认亲兄的丑事，便是戴笠一手来替他处理的。蒋介石随母下堂到蒋家当“拖油瓶”之前，他母亲所生的大儿子仍然留在河南郑家。几十年后，他的大哥弄清了这一底细，想到重庆见见这位当了委员长的同胞弟弟，叙一下骨肉之情，蒋介石哪肯承认有一个异姓的乡下土老儿是自己的亲哥哥，不但不接见，并立即叫戴笠来处理这一件大不韪的“冒充领袖亲兄案”。当戴笠派特务把这位老头抓去亲自进行了一番询问之后，不用说，一看面孔身材，完全像是一母所生，而所答的一切都是确确实实有根有据。这样，当然不敢公开严办，而一向标榜奉母至孝的蒋介石，也不便无端地叫部下杀害亲骨肉。最后只好听从戴笠贡献的两全之策，将这位哥哥交戴笠软禁在军统局望龙门两湖会馆的看守所里，不准人和他接近，免得被外国记者知道了宣扬出去。我多次去看过这个老头，他一谈起这件事，便滔滔不绝地叫冤，希望蒋介石不承认就算了，快点让他回家去，以后戴笠便禁止军统特务去和这人谈话，怕不留心传开出来，便把他送往息烽软禁了几年。抗战胜利后，还是把他送回去了。

至此，我们才知道，1946年和1948年，郑发信中为什么不再敢称“胞弟”了。只说是开封郑老师处的同学。别认为乡下人傻，其实心眼并不少，否则吴鼎昌何许人也，怎肯屈尊去接见一个乡下老头呢？找个办事员敷衍一下不就行了吗？这件事本身就使一身土布衣衫的郑发增添许多神秘色彩。



至于蒋介石的家谱，是他自己主持、由御用文人修纂的，直笔人诛，曲笔天诛，天诛又有谁人得见？何况自古名人都寻一个显赫的祖宗，蒋姓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东汉时有蒋澄者，曾封过函亭侯。蒋澄的后人，在东晋时迁到浙江台州，到蒋介石时正好二十八年，于是借过来祖宗再说。民国九年（1920年）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日记中出现了这样的话——

吾蒋氏在唐代由台州迁奉，楼陵或即俗呼楼岙者便是之蒋浚明公，官至金紫大夫，即此派也。其墓在三岭山，子与葬。摩珂蒋宗霸公，世传为吾祖，谱中所称必大公者是也。当五季之周，其居三岭，与岳林寺之弥勒相友善，亦近情理……

查典寻祖总以数典忘祖更附合传统文化吧？近来，浙江与河南两地同争蒋介石为乡亲，沸沸扬扬，不可开交。为了发展旅游，搞名人纪念馆之类原无可厚非。其实，河南南阳与湖北襄阳早为争诸葛亮之隆中，纠缠不清。

后来清朝有一位会做官的到了南阳，在诸葛庵前写下一副对联，大意为：

身在朝廷，原无分先后主；

功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我认为这才是研究蒋介石家世合理的态度。不管怎

么说，郑发生前死后都与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了，再弄上80年，还有说不清的地方。何必一方非原揭“隐私”；另一方非要捂“隐私”不可？

（责任编辑：刘家驹）

“四大名旦”的竞争和友谊

翟书惠 石林

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个京剧青衣名角，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四大名旦同演旦角，风格却迥然不同：梅派端庄华贵，程派含蓄深沉，尚派婀娜刚健，荀派妩媚活泼。这四位大师虽然并列为“四大名旦”，可在艺术上却是互不相让的对手。二十年代以后，他们在剧目上的竞争就是一例。这一时期，四大名旦争相编演新戏，于是出现了传诵一时的“四红”、“四口剑”、“四反串”剧目。

“四红”是四大名旦各自创作一出以“红”字为首的剧目。梅兰芳创演了“红线盗盒”，程砚秋创演了“红拂传”，尚小云创演了“红绡”，荀慧生创演了“红娘”。“四剑”是四大名旦各自创作一出以“剑”为字尾的剧目。梅兰芳演“一口剑”，程砚秋演“青霜剑”，尚小云演“峨嵋剑”，荀慧生演“鸳鸯剑”。为丰富表演艺术，四大名旦还安排了一出带有旦角“反串”小生情节的戏。梅兰芳有《木兰从军》，程砚秋有《聂隐娘》，尚小云有《珍珠扇》，荀慧生有《荀灌娘》。值得指出的是，具有相当艺术质量的《四红》、《四口剑》、《四反串》等剧目的类比出现，既不是偶合，也不是凑趣，这是四位艺术家的明显的艺术竞赛。从而促进了“四大

名旦”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戏曲艺术事业的繁荣。

建国以后，四大名旦依然保持了这种可贵的艺术竞赛，国庆十周年时，除程砚秋已作古之外，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年逾花甲，仍竞排新戏，为节目献礼。梅兰芳排演了《穆桂英挂帅》，尚小云排演了《双阳公主》，荀慧生排演了《荀灌娘》（改排），老艺术家的进取精神，可见一斑。

难能可贵的是，四大名旦在舞台上奋力竞争，当仁不让；在台下，他们又是推心置腹、互让互敬的挚友。程砚秋少年时曾拜梅兰芳为师，即令是成名之后，对梅兰芳总是恭恭敬敬，礼貌有加。而梅兰芳不肯以师辈自居，他钦羨程砚秋在《金锁记》中的表演和唱腔，公开宣称这个戏自己演得不如他好，并进而放弃了这个戏。表现项羽和虞姬的传统戏《楚汉争》是尚小云的拿手杰作，一俟梅兰芳的《霸王别姬》演出之后，尚小云自叹弗如，在教授弟子技艺时他直言劝诫：“这个戏要学梅兰芳先生！”荀慧生不但在艺术上，而且在戏曲教育上都颇有成就。他没有门户之见；无论是梅、尚、程、哪家弟子，只要肯向他求教的，他一律倾囊相助。

三峡工程的一场

唇枪舌剑

□卢江林

□张世黎

□陈绶台

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一年抓四次。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对周恩来说



三峡水利枢纽鸟瞰图(模型)

林一山与李锐的笔墨官司，始于1956年。

根据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成果，林一山在《中国水利》着重论述了三峡工程在治理开发长江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年9月，李锐等在《水力发电》发表文章，不同意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在治理开发长江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看法，怀疑三峡工程的技术可能性和现实性，主张以沅水五强溪枢纽代替三峡工程。

这一场论战，牵涉到毛泽东所极为关心的三峡工程，不能不引起最高决策当局的重视。

1958年1月南宁会议的最后阶段，毛泽东决定把三峡问题正式提交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历来主张，人长了两只耳朵，就是为了听两方面的意见。因此，他决定林一山、李锐都来参加会。

毛泽东性格好斗，他喜欢看争鸣文章。他曾经对郭沫若说过：“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在这次南宁会议上，他说：“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

一见面，毛泽东就对林一山说：“你的信我看了，你怎么说怕写多了我没时间看呢？我是很关心长江和三峡的嘛！今天你讲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林一山答道。

林一山讲三峡，是从防洪讲起的。从汉代到清末的2000年来，长江的洪水危害，平均10年一次；辛亥革命以来，平均5年一次。林一山认为，只有三峡才能控制川江洪水，解除荆江大堤的严重威胁和洞庭湖区的洪灾。

当说到工程造价需要72亿元时，博闻强记的毛泽东说：“怎么少了，过去不是提100多亿元吗？”

林一山回答：“经过科研，技术上有些突破，可以省一些。”

毛泽东问：“能不能再省一些，50亿包干行不行？”

林一山摇摇头：“按现有的水平做不到。”

毛泽东把话说死了：“50亿包干了！”

林一山执拗地说：“72亿是工程师们经过精密计算得出来的，考虑到将来物价、工资会有变化，工程造价只可能增加，不可能减少。”

周恩来接过话头：“电站装机由2500万千瓦减到500万千瓦，50亿够不够？”

“这样就够了，不过修了这样一个高坝，怎么能只装机500万千瓦呢？”林一山大惑不解。

毛泽东、周恩来都笑了。他们其实就是要看一看林一山会不会搞“钓鱼工程”，先说50亿，上马以后又说不够。

林一山说：“我们不搞‘上马预算’。我们都算清了，没算清的，从多不从少。”

接着是李锐汇报，李锐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到

1870年长江千年一遇的大水，并未冲破荆江大堤，因此说荆江决口要死几百万人是危言耸听；建三峡这样的大电站，装机2000万千瓦，能发电1000多亿度，最乐观的估计，中国要几十年以后才可能有此需要；还有地质、技术问题难以解决。

听完双方针锋相对的发言，毛泽东还觉得这场官司没打过瘾。他说：“我要考考你们，能不能写篇象样的文章来说说三峡工程？”

林一山说：“我不是作家，写文章我不如他。”

毛泽东说：“你们两人各写三千字为宜，三天之内交卷，然后再议一次。”

林一山对长江了如指掌，下笔后滔滔不可收拾，洋洋万言。

李锐是快手，出手八千字。

毛泽东阅后，决定立即将两人的文章印出，送与党中央领导同志传阅。

从两篇文章的文采来看，林一山不如李锐。

林一山嘴巴子厉害，但是写文章，就不得要领了，专业术语多，生涩难懂。李锐就不同，他首先言简意赅地用几句话概括要谈的问题，然后分述理由，观点鲜明，语言流畅，逻辑清晰，技术问题通俗化，让高层政治领导人一看就明白。

李锐曾写过一本书《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他对毛泽东做过一番研究，深知毛泽东的喜好。他这篇文章，尤其符合毛泽东当时所提倡的文风。

毛泽东看后，讲李锐的文章写得好，他当着彭真等人的面，指着李锐说：“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更出人意料的是，散会之前，毛泽东对李锐说：“你当我的秘书。”

对此，李锐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由于这场论战被毛泽东点了头名“状元”，很为风光。另一方面，李锐的抱负在政治而不在文章，当“秘书”并未能遂其心愿。

后来他写了一首诗，写出了当时的感受与心情。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
或云夺鼎甲，谁解非瑞祥。
及今思纤语，鬓雪须也霜。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这句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在南宁会议这场论战中对李锐的评价，也真实地反映了李锐对点“状元”这件极为风光的事所抱的不满和遗憾。

三峡工程的一场唇枪舌战

但是对林一山却不同。

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把林一山的报告往桌上轻轻一推，还给林一山，说：“这是你的。”

林一山告诉毛泽东，长江每年流走了相当于4000万吨煤的能量。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的祖先已烧了二千多年的煤，现在我们会用水来发电，应该尽量少用煤，让煤再埋它个两千年。”

他转身向周恩来说：“三峡的问题，你来管吧！”

“还是请主席管。”周恩来谦让着。

“我那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来管呢？还是你来管。”

周恩来微微一笑：“好，我来管。”

毛泽东欣喜地伸出四个指头：“好吧，你来管，一年抓四次。”

1958年春天，一百多位来自大专院校和高级科研机构的专家聚集武汉，这实在是新中国水利史上的空前壮举。

2月28日，在周恩来率领下，乘“江峡”轮行至荆江大堤，周恩来命令船停下，按计划登堤考察。

林一山跟在周恩来旁边，随时准备接受周恩来的提问。走到铁牛湾时，周恩来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荒凉的江滩。

这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地。江滩上伫立着一头锈迹斑斑的大铁牛，它孤独地扬着头，困惑地望着烟波浩淼的江面。一百多年来它数十次被洪水侵袭，无数次目送逃避水灾的难民流离……

1788年夏天，长江又发大水，荆江大堤溃口20多处，湖北34个县被淹。洪水冲破荆州城墙，一下子淹亡一千七百多人。

乾隆皇帝龙颜大震，数月内发谕旨24道，其中一道圣旨是，铸造镇江铁牛九具，分别安放在荆江大堤的险要地段。

那9具铁牛，能耐洪水猛兽般袭击，顾不上御笔亲派的威风，一个个逃之夭夭了。咸丰年间重铸几尊，咸丰皇帝比他的曾祖父更器重铁牛，亲挥御笔，为铁牛撰写铭文：“盖因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制水，是以制造铁牛肖形，用示制镇。”

林一山告诉周恩来：“加高培厚堤防只是治标的办法，”他恳切地说，“为了江汉平原几百万人民的安全，必须尽早修建三峡工程。大汛时把大量洪水拦住，可以降低荆江水位，即使再遇1954年那样的洪水，分洪区也可不用。”

周恩来站在大堤上，看见沙市地面在凹处，更是双眉紧锁，心思重重。林一山告诉他，这里的长江洪水位，能高出地面十多米，站在沙市楼房上看长江，轮船像是从屋顶上驶过一般。

周恩来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告诫林一山他们：“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洪水的威胁仍然存在，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不能有任何疏忽和侥幸心理。”

江峡轮乘风破浪，溯江而上，在迷蒙的晨雾中驶过宜昌港，到西陵峡的瓶颈——南津关。为了实地考察南津关坝址地质情况，周恩来手里拿着地质锤，健步跨上岸，登上了崎岖的山道。李富春、李先念相继下船。

阴云低垂，江风瑟瑟，昨日在荆州古城的春雪，今晨化为霏霏细雨。周恩来不顾山陡路滑，一路领先，细雨打湿了他的衣裳，他依然精神抖擞，攀登在前。

林一山介绍，前面就是三游洞了。据传，唐宋时代三位大诗人白居易、元稹、苏东坡曾先后来游此洞，遂名闻遐迩。

周恩来对林一山说：“你怎么领我到这里来呢？我是来查勘三峡的，不是来游山逛景的呀！”

水利专家李镇南说：“总理，我们不是请您来看名胜古迹的，这里是石灰岩地区，请您看看岩溶的构造，研究在这里建坝，怎样进行基础处理，解决大坝不漏水问题。”

周恩来点点头：“那好，就看三游洞。”

周恩来一行来到了三游洞。这是典型的石灰岩形成的大溶洞。洞中无光，幽幽暗暗，石笋耸立，钟乳倒挂，周恩来到过不少光怪陆离的喀斯特溶洞，对这些景致无暇观看，他用地质锤敲下溶洞中一块岩石，在手上反复审视，还探身到一个支洞中，观察岩石的构造、裂隙和斑痕。良久，他说：“看来，如何在石灰岩地区建坝，的确是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大坝的基础，是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啊。”

林一山说：“我们这几年也对南津关坝区疑虑重重，主张往上在三斗坪一带建坝。那里的地质条件，我曾向总理作过汇报。”

“有比较才能鉴别嘛。”周恩来说，“再认真研究，有了十分把握，就下结论。”

周恩来下山时，抬头看见了下半溪供销合作社的牌子，径直走了过去。

周恩来与营业员们聊起来。

“有酒吧？”

“有。”

“瓶装的，还是散装的？”

“都是整装的瓶子酒。”

周恩来知道工人工资不高，说：“这里勘测三峡的工人多，给他们送去零打的酒才对啊。他们顶风冒雪，浪里雨里，需要喝点酒。要多替他们着想，准备一些散装零打的酒，这也是对三峡工程的支援呀！”

供销社主任可不轻松，他听罢总理的话，额头上竟然冒了汗，亲自挑一担散酒，送进峡谷去了。

3月2日，周恩来一行来到了三斗坪坝区。三斗坪是西陵峡中一段较为宽广的河谷，它不像南津关那样险峻、深邃，却在狭长中显宽阔，雄险中见秀丽，别是一番风光。

周恩来轻轻展开图纸，这是他用红蓝铅笔划过的一卷蓝图。2月26日登上江峡轮后，每当夜深人静，周恩来就开始勾划，整整四个晚上，他划出了一座超巨型大坝，划出了发电后的电网，还有穿闸而过的万吨船队……

周恩来憧憬于美妙的理想蓝图中，许久才回到现实中来，指着对面白云缭绕的山头，问林一山：“将来大坝的坝顶，有这个山头高吗？”

“有的，有，有这个山头高。”

“太雄伟了，太雄伟了。”李先念说，“将来修建三峡大坝，如果你们同意，就选我当坝长。”

周恩来举目远眺，凝思片刻，目光又落在那张蓝图上，落在他昨夜用红铅笔精心勾勒的那道粗线上，愈发显得神采飞扬，他问林一山：“这里的地质情况，弄清楚没有？”

“我们做了比较广泛的地质研究，钻探出来了大批岩芯，请总理去看看。”

“好，去看看。”

岩芯仓库设在山下一个平坝子上。这个平时门庭冷落的地方，今天顿时欢腾起来，工人们还没有得及用棉纱擦净手上的油污，周恩来那双手已伸了过去。

仓库门前，整整齐齐放满了一箱箱岩芯。那些白色的、黑褐色的花岗岩岩芯，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彩，向人们讲述着三斗坪坝区下面的秘密。周恩来拿起一张长得拖地的钻孔岩芯剖面图，又一箱箱、一根根按顺序看了岩芯，他站起身来，说：“看来，峡谷中找不到花岗岩的论断并不可靠呀。”

按说，峡谷中是找不到花岗岩的，可中国的三峡竟然在三斗坪这样一块最易施工最省投资的地方，天造地设，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花岗岩的地段。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不多不少，刚好就这一段。林一山说：“在这样的岩层上建大坝，最好了，最理想了。”

周恩来兴奋地接过岩芯，又从一位地质队员手中要来地质锤，轻轻敲击，坚硬的岩芯，铿锵作响。“多么好的花岗岩！感谢你们为三峡大坝找到了这样好的

坝址。”周恩来爱不释手地反复察看岩芯，两道浓眉耸动着，笑得很惬意。“光我说好还不行，能带一截给毛主席看看，让他老人家也高兴高兴，该多好呀！”

“给毛主席？好，好，太好了。”

“有什么规章制度？”周恩来问。

“岩芯一般是不能带走的，当然这是给毛主席。不过得签字。”

在工人们欢笑声中，周恩来俯身从岩芯箱里取出记录牌，恭恭正正签上三个字：周恩来。

“谢谢你们了！”周恩来说着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把那截岩芯包了起来。

几位饱经沧桑的勘测工人，看见总理对自己的劳动成果如此珍惜，眼眶里有些潮湿。

继续前行，周恩来一行来到了被人们作为热门话题的中堡岛。这个江心小岛，将是未来三峡大坝的中心线。它的地理、人文情况如何，周恩来很想亲眼看一看。

看过岛上打的钻孔，听了岛上勘探技术人员的汇报，路过一个农家小院时，周恩来想进去看看，却被一位老婆婆在门口挡住了去路。工作人员说有领导要来，老婆婆仍有些不大明白。周恩来发现门口挂有一块红布，推测这个家庭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示意同行的水电部钱正英副部长进屋探询。

原来这位老婆婆喜添小孙女，刚刚三天。她得知周恩来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都来了，脸上堆满了笑意，条条皱纹里都是欢乐：“大喜大喜，我家小孙女才来人世三天，就遇上贵人了。”

周恩来笑了，站在门口同老婆婆拉起了家常，问孩子奶水可够吃，问烧柴打油可困难，村干部对社员可关心。老婆婆喜得嘴合不拢，觉得那样大的总理怎么对老百姓的家长里短这样清楚。

临走时，周恩来让警卫员留下十块钱，送给老婆婆，他叮嘱：“买点鱼给月母子发发奶吧。月子里，奶水足，娃娃才能长得好。将来长大了要让孩子读点书，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很多人才啊。”

岁月飞逝，转眼30多年过去。当年落地三天的娃娃，今天已是宜昌市某制罐厂的会计了。30多年的上马争论，她已从婴儿成为孩子的妈妈了。当听到人大代表投票通过建三峡大坝的决议后，她说：“再不能久拖不决了，再争论下去，我都要成老太婆了。”为了表达库区人民盼工程早日兴建的心情，她从自己当月工资中取出50元，寄给中国水利报转送国务院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

3月3日，江峡轮上继续展开讨论。这是南宁会议上林、李论争的继续。

李锐首先发言。他说：“从综合效益来讲，三峡是非常理想的，也是很好的。在技术上虽然有很多困难，但应该说是可能的。经济指标，特别是单位指标都是很

好的。三峡可以解决长江洪水问题以及开发长江的水力资源，这都是用不着怀疑的。”

那么，自1956年以来他与林一山的争论何在呢？

李锐把过去两年多的争论概括为“主要是三峡兴建的时间和大坝的高程问题”。

他主张先开发支流，先小后大，先近期后远期。他不同意林一山关于把三峡作为控制利用长江水利资源的主体的意见。认为长江防洪问题不大，加高堤防就可以解决。

接着是钱正英发言，钱正英既是部长又是专家，她的发言论据充分，说服力强。她是赞成修建三峡水利工程的。她不同意李锐的意见。她认为，从长江流域的全局出发，把三峡作为规划的主体工程是有道理的。长江防洪关系到千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决不可以掉以轻心，单靠加高堤防不能解决问题。

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国家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水电部副部长李葆华、刘澜波，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都发了言。水利水电航运方面的专家李镇等同志也发表了意见。绝大多数同志意见趋向一致。

以“铁嘴”闻名的林一山这次没有发言，相反，却以自己的弱项写了一篇书面报告发给了大家。

3月5日，江峡轮到了重庆。6日，周恩来请所有的考察人员们来了个小聚餐，然后开总结会。他说：“大家一致肯定了三峡工程必须搞，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技术上也是可能的，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十五到二十年就可以建成。取得这样一致的意见，大家都愿做促进派，这是很大的成功。”

周恩来说：“两年来的争论也是必要的，不争论那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工作中，还允许有反对意见，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争论只要是不妨碍工作，有利工作，就应当提倡鼓励。”“过去的争论，现在基本问题已经解决，残留的问题还可在小范围内争论”。

这就对两年多来的林、李之争，作了一基本的结论。

针对所谓“先支流后干流”的观点，周恩来说：“很难确切地说，干流在前或是支流在前，小型工程在前或是大型工程在前，不要这样固定，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

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高手，任何复杂的难题在他高明的处理艺术面前倾刻化为乌有。

但是奇怪的是，过了三十几年，李锐反对上三峡的理由之一，还是“先支流后干流”。要知道，三十多年中，我们在长江各支流上，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十几座大小水电站，装机总容量已达1400万千瓦。难道还要等到长江上游所有水力资源全部开发利用完，才允许

考虑上三峡？

周恩来还宣布，为了加强对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的领导，应当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总理表示，所有这些问题，要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批准了后才能执行。

按原定计划，3月8日周恩来要到成都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日，同船抵重庆的同志都认为周恩来肯定会匆匆赶往成都。周恩来一路与科学家攀谈，摸清了长江的情况，大家又对三峡工程形成了统一意见，收获巨大，他心情兴奋，执意要与家同玩一天，决定7日夜晚再乘车去成都。

7日白天，重庆市委举办了一个招待舞会。周恩来兴致勃勃要大家都去跳舞。由于随同考察的人中，会跳的不多，不少人都不敢上场。周恩来风趣的说，把门关起来，谁都不许走。

后来，周恩来领着一个姑娘走到水电部党组书记李葆华面前，说：“她的父亲与你的父亲是老朋友，你应该请她跳跳舞。”李葆华很少下舞场，但却之不恭，就勇敢地作了个邀请的手势。

姑娘仪态万方，典雅庄重，在乐曲声中步态轻盈，笑容满面。相比之下，李葆华脚步生硬，尤如军人出操一般，转了两圈，竟然汗水涔涔。

吃饭的时候，周恩来说：“会开完了，大家要好好休息一下，吃饭时喝点酒吧。”多数同志不敢喝，生怕失态，周恩来请来一个能喝一斤酒的四川妹子，劝大家喝几杯。大家听说，纷纷躲出去了，周恩来笑着四处寻找，留着长辫的川妹子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周恩来看大家实在不能喝，就说：“不喝，吃饭，但不能跑。”

送走诸位科学家，周恩来带着三峡的涛声，带着考察中获取的大量第一手资料，赶赴成都，参加了中央成都会议，作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水利枢纽的报告。

毛泽东在3月22日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3月25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周恩来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定：“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估计三峡工程的整个勘测、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约需十五年到二十年。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进行各项有关的工作。”并明确要求，“三峡工程的规划性设计应争取于1959年交出，初步设计应当争取在1962—1963年交出。”

这个文件，经过了毛泽东亲笔修改。

这就是南宁会议到成都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责任编辑：刘家驹）

□段向群

域外华人世界的“香火”

新加坡的华庙堂

新加坡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自由国度，独立30年来，在这个对亚洲经济，对世界贸易形成一股冲击力量的弹丸小域，如繁星般座落生辉的中国庙宇，几乎占新加坡宗教神社的80%，如牛车水的观音庙，碧山与汤申约翰之间的大伯公庙、吧西班牙让的真空教联合会总坛，诸如空灵寺、灵隐寺、真武庙、武当门、精武会以及南北少林、妈祖庙、嫫祖庙、三圣教、全真教等等不胜枚举。

寺庙多独仁丘坡，十分壮观。那些罗汉、金刚、五大智者、八位护法、三清莲座，高大辉煌，都是由信徒施舍的巨资建造。华人信徒以中老年人为主，亦有青年妇女，信仰专一，皈依终身，从不中途易门换教，更不哗众哗听，从而构成各自的帮派组织。

观音庙与观世音救苦会

观世音是十界菩萨中唯一以女性装束面貌闻世的救世主，她曾被《东游记》说成是洛阳桥下的牡丹仙子，得道后普济众生，救世除逆、颂德天下。她那一座莲花、一瓶净水，伏妖降魔，点化冥顽，深受中国民间大众的爱戴。而新加坡的观音庙中的观音菩萨偶像，与大陆民间拥戴的观音娘娘，在造型构思，服饰佩物以及表情神态都有显著的差异；从而，更为丰富了善男信女的笃信心理和想象力。这座新加坡国最大最鼎盛的女神庙，庙殿十分开阔，寺庙

的外观有点象北京戒台寺或甘肃天水的伏羲庙，但地理位置和香火，就令中国大陆诸神和信徒望尘莫及了。

新加坡的香客是东南亚华人中拜神仪式最虔诚最繁缛的，他们依据黄历所注的黄道吉日，菩萨生辰忌日、年关节尾、人日、鬼日、仙日、发财日、乔迁日、授子日、龙抬头日、升天日，每个祀日都是一次十分隆重庄严的道场活动。香客们无论是去观音庙上香，还是在家堂静拜，或组织锣鼓手沿街挥舞龙旗，造势助兴，抛洒眼钱，那真真切切的顶礼膜拜，都有点令人费解。新加坡共和国是个现代化集约型经济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迥恰不同的是，在有强大凝聚力的华人社团组织中，以中国传统诸神为代表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因物质生活高度发达而日渐凋零

萎缩，也并未因其它宗教机构的渗透而退居次要地位，可以说，在海外包括南洋地域的华人社会，实际是以求祖拜神的宗教仪式，维系着对民族根文化及远离故土的异域漂泊心理，保留一种浓厚凝重的祀祭之礼，以藉此区别或抗衡居留地异族文化的同化作用。

拜观世音菩萨是众多中国神的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崇拜的意义在于有益地汲取观世音舍身献世、救苦救难，普济众生的功德和行为，现身说世，法度今生，修为来世，实为子孙留一些荫德。拜观音对香客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引力和影响呢？

香客1：从义顺赶到观音庙进香的衣店女老板，50多岁，悬金嵌银，衣料讲究，她是第四代的移民，祖上几代人一直供奉观世音娘娘，家中也供了女菩萨的神龛，终年香



火不断，供品也极鲜亮，她说：“菩萨保佑啦！灵光得很咧！我家被盗了，我跟菩萨说：第三天就破案了哟！我的金戒指不见的噢，我跟菩萨娘娘悄悄说了，第二天就找了呀！很灵呀！不拜要遭雷劈的！”

香客 2：菲律宾马尼拉市一位牙医，他专程以旅游者身份渡海过洋，赶在人日，拜到一个极吉利的签乱，他说：“我每年都要来拜签的，大吉大利，大慈大悲，菩萨的签文警告我，要多行善德，我按菩萨旨意做了，我的生意很火的。”

香客 3：一位当私人俱乐部门卫的六旬老者朗声道：“我的孙孙大脑发育不全，我来求菩萨引渡，三世因果咧，嗷，是年轻时太放纵自己，来世修得不好。我太太，我爷爷和爸爸都拜的，我们海南文昌人，都要拜的！不拜是不会转世的！我也替中国邓大人拜哟！”

观音庙内几位义务的年轻庙祝，负责给神龛添油守香，给香客们摇签和售香，她们怎么会对这种分文不取的职业产生浓厚兴趣呢？

庙祝 1：女，未婚，在一家私人银行当信贷员，游历过中国、日本及

东南亚各国，身上不佩带任何金器，看不出是鱼行私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的女儿。她给观音庙捐了 20000 新币，相当 10 万元人民币，她很虔诚告诉我：“观音娘娘也未婚咧！我来打工只是想为大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家里大人信大伯公呀！大家平平安安啦！OK 啦！”

庙祝 2：国大医院的夜班护士，她已离异，带两个孩子，白天供奉菩萨，晚上打工，服伺菩萨只是在重大节日才来的，她稍腼腆地说：“我们社会的发展和富裕都是观音娘娘保佑的，真的灵光！我的先生不信神，生意不好，破产、又去赌，没有人救他，我们分平，现在有菩萨陪我，我也陪菩萨，菩萨会给我化缘一个好先生的！我信！”

观世音娘娘的传说同世俗的作用，的确深深影响近 50 万信民的思维和行为，并且无形在左右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甚至维系着福兮祸兮成为一种近于不朽的精神力量。

观世音菩萨教善会与观音庙的香客行为又有异同，前者注重突出观世音娘娘救苦救难的美德，后者则多以保佑发财或生儿育女之类的

俗拜。教善会是由当地中医师自发联合创办的慈善医疗组织，以行医、施方术，免费医疗为特征的专业机构。教善会亦设在牛车水一处老宅楼间，拾阶而上，右侧一排约上千个神龛的菩萨塑像，正面一个大玻璃展柜中，一樽观世音娘娘的陶瓷制的立像，香烟云腾，油香灯明，静静辉映着教善会众生的锦绣前程。

真空教

真空教是起源于中国江西省黄番山一个仅 150 年历史的道会小门派，祖师寥帝聘创立于 1853 年。该教致力戒烟戒毒戒赌戒嫖戒娼，有感于 1840 年鸦片战争，西方殖民者强加在旧中国的抽烟吸毒，行娼买妓，赌乱成风的淫糜世景，该教力劝世人以戒为本，以己为真，洗心革面，并悬镜堂中，无祖无物，皆以自身为肖像，真者，始乱不迷者，空者，来生空空，施善好义是也。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七国，真空教联合会已发展拥有 300 万众的颇具凝聚力的大门派。真空教在新加坡共和国共设有 85 个道堂，像本元山道堂等都是非常著名的景观，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的真空教组织，不仅出资设立戒烟戒毒中心，挽救了失身堕落的青年吸毒族，而且以道会友，吸收许多立志改邪归正的男女青年，投资医疗机构，替社会和当地政府做了有口皆碑的公益事。

道友 1：马来西亚裔，约 55 岁，是真空教总会副主席，经营房地产及物产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我教以施为善，每年向当地政府捐资百万美元，扶助社会，施以功德！”中国是我教的发源地，是我本人祖籍，如果需要，我们教会同样会捐资大陆的！”

道友 2：泰国华裔，真空教道务主任，教会始祖之侄孙寥先生说：“我教的门规极少，行礼拜堂并无规



范，面对空镜，只求一个真字，拜教为真，修己则真，道友每年自动捐资本会，本会的资产全部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廖先生自己有橡胶园和地产，又兼营旅游业，但，更热衷于教会事宜。

道友3：新加坡籍的福建安溪人，总会主席系先生，七旬开外，任主席27年，是几个大石油化工产品的董事长，他每年都向总会捐款，扶助社会不遗余力，他说：“我是主席，不是道友，我就当到现在，我很小从中国漂泊此地，有六十五年咧，很怀念故乡，更希望我教的精神和实力能够实现支持大陆的改革开放咧！”

真空教的教义简单明了，在海外发展非常成功，关键在于他们对社会负有责任心，这正是海外华人所保持的质朴情操。

儒教、释教与大伯公

儒教始祖孔子“天地君亲师”的天命哲学观，认为“君子有三畏，畏天命、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故设祭天、祭祖、祭孔等宗教礼仪，每逢祀日，华人家庭就更表现出一种古老而真诚的献祭活动，通常在前一天到马扎（马来文即集市），购买鸭鹅鸡三牲，在熟食铺订寿桃寿馍素斋，以及瓜果，早中晚三拜九叩，续香添油，直至次日午夜12点敬神拜祖活动才算结束，这种活动大概每月平均两次，在新加坡华人家庭祀拜的仪式多则可每天早送神晚迎神，乐此不疲，他们相信，敬一分神，加一分功德，请神保佑发财，也算一种实用。

释教于汉朝传入中国，与黄老道融汇贯通，形成今日的佛教。

中国传到新加坡的释教基本源于如来佛、观世音、三佛六祖、金刚罗汉等具有中国神教特征的崇拜偶像，佛学思想侧重因果轮回，转世修身之说。

信徒欧阳太太，先生是木材商，三男二女，她主持家务。她用潮州话

说：“我拜佛祖是要保佑先生平安的咧，我先生给祖庙捐过木材的呀！我们家住的是独立房就是前世积的德，祖上修来的呀！”

信徒郭先生，夫妻俩是政府退休的公职人员，祖籍广东省恩平县，他笃信佛祖，他每天同太太来庙堂二个小时，其乐融融！他说：“佛祖很关照我们在阴间的祖先啦！我买地府眼钱啦！做超生啦！瞧，我好福气啦！”

很多华人家庭既拜佛祖，又拜大伯公，亦拜福祿寿三星。而大伯公的神龛位置最重要，在汤申路附近的大伯公庙就建造的非常堂皇雄伟，使人能想到洛阳的关帝庙和汤阴的岳王庙，都具有等同的肃杀气度，大概是期望文武庇佑的意思。

大伯公是何许人也？他身着明朝服饰，蓄着美髯，官袍宦帽，英武有加，在新、马地区大伯公的传说极多，大伯公真正的身份是赫赫大名的三宝太监郑和，他还是个回教徒。

郑和率三万众的大型船队，以和平使者身份七下西洋，经马六甲、穿印度洋，直抵红海的索马里和苏丹诸国，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

大航海家，不仅成功地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商业打通了东南亚和北非的贸易市场，也将域外的文化带回中国封闭的大陆。他的成就与功德对东南亚的华人社会有着重大的深远影响，在新加坡龟屿，一座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却座落着东南亚最大的大伯公庙，据说崇拜大伯公原是由船家和船行发起的，旨意是保佑海上平安，后来才发展成为家庭祀祭的偶像。

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外华人的垦拓史是一部传奇史诗，华人质朴的行为准则，纯朴的情操和奉献，大都汲取宗教的正面影响，儒学和宗教所推崇的美德，正成为海外华人社会极有凝聚力的传统力量，它维系着民族，维系着祖籍、维系着古老炎黄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华人家族的子孙后代。成为中华民族之所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共同创造世界的重要因素，香火代表着一种延续不断地梦幻，反映着华人在全世界的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力量和价值，有什么比中华民族更具魅力的民族呢？

（责任编辑：刘家驹）



杨成武将军

和女儿易生

□叶运均

1939年冬，杨成武率领晋察冀一分区部队血战大龙华之后，在地委妇救会工作的赵志珍快要临产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杨正忙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顾不上她。供给部董永清部长为了照顾她，特地找来了妇产科女医生陈霞辉。陈医生是从北平同仁医院跑出来参加抗日队伍的。

董部长给赵志珍和陈医生一人弄了一匹骡子，让她俩骑着牲口跟着队伍转移。

经过近十天的长途跋涉，赵志珍一行来到了易县刘家台西边完县的白沙村。

这天，夕阳的余辉刚抹红树梢，赵志珍突然肚子痛，差点从牲口背上栽下来。陈医生说羊水破了，赶紧把她扶下来，烧水准备接生。谁知正在这时，说日本鬼子追来了，情况十分紧急，孩子不能在这里生了！陈医生急得直跺脚，手忙脚乱地把赵志珍又扶上牲口，跟着队伍一气跑了几里地。正跑着，听说鬼子不往这边来了，她们随队伍又回到白沙村。这时天已经黑了，陈医生在一盏小马灯下接生，哪料到是难产，到半夜还没生下来，折腾得赵志珍死去活来。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大人和孩子的命都难以保住！陈医生最后横下一条心，一使劲，用力把孩子给扯出来了。赵志珍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孩子生下不到两个小时，日本鬼子突然扑过来了。供给部的同志赶忙掩护群众转移。可是乡亲们听说赵志珍怀里抱的是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女儿，便飞快地卸下一块门板，抬起赵志珍母女就拼命地跑。他们前脚离开，敌人后脚就进了村。

乡亲们抬着赵志珍母女俩爬山涉水，过了唐河，上了百花山。那就是传说中“白毛女”偷食庙里供品的那

座山啊！由于天寒地冻，山路陡峭，乡亲们怕赵志珍母女俩掉进深沟大壑，只好用绳子把母婴捆绑在门板上。就这样，过了易县、完县、唐县、曲阳、涞源……

一天途中，日本鬼子的飞机突然来轰炸，来不及隐蔽，几位乡亲便把门板一放，卧倒在赵志珍和她孩子的周围，用身体来挡弹片。炸弹在四周爆炸了，孩子吓得哇哇直哭，火药味呛得赵志珍直咳嗽。浓烟里，董部长从队伍前面跌跌撞撞地跑来，看大人、孩子都没事，才松了一口气。一天傍晚，杨成武率领队伍转移到岭西，董部长通过飞线电话向杨报告说：“赵志珍同志生了个胖闺女，已经十来天了。我们今天刚刚到达宁家庄，离你们比较近。司令员，你来看看女儿吧。”

杨成武“嗯嗯”地连声应着。

这时，各部队已跳出日本鬼子的包围圈，正在寻机歼敌。日本鬼子扑空，只好撤退。局势暂趋缓和，于是，第二天，杨成武他们便来到宁家庄。董永清一见杨成武便叹息道：“她母女俩可真是大难不死啊！”接着把他们领到一间低矮的农舍前，弯腰钻了进去。

这是一间遭到日本鬼子破坏的房子。塌陷的土炕上，平放着一块拴着绳子的门板，门板上躺着一个人。她侧头搂着熟睡的婴儿，身上盖着一条被烧焦一角的军被、头发蓬乱，两眼紧闭，脸色苍白。

听到脚步声，赵志珍微微睁开眼，一看是杨成武，禁不住哭了起来。她那时才十八九岁。杨成武连忙弯下腰安慰她。赵志珍强撑着身子坐起来，把被子轻轻掀开，让大家看正在酣睡的孩子。

“漂亮！脸蛋儿圆圆的。”

“我们又增加了一名女战士……”

“给孩子取个名儿吧。”赵志珍抑制不住当了母亲的喜悦说。

一同前来的副司令高鹏一听,不假思索地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易县又是荆轲刺秦王的出征地。千金出生在易水河畔,我看就叫‘易生’吧!”

同志们称赞这个名字好。

杨成武和赵志珍相视而笑。

高鹏哈哈大笑,说:“我们击毙了日寇阿部规秀中将,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司令员又得了一个宝贝闺女,真是喜事连连哪!”

1940年,日本鬼子又来“扫荡”了。赵志珍只好把一岁多的易生寄托在西古县村的一位老乡家,可是日本鬼子不知怎么听说杨成武的孩子在这个村,便突然将村子围住,把全村的人都赶到天主教堂外边的空地上,逼着乡亲们交出孩子。

日本鬼子当场把伪村长赵仲三(中共地下党员)抓起来,绑在一棵树上,威胁群众说,如果不交出杨成武的孩子,就和他一样,说着就“砰砰砰……”朝赵仲三连开数枪,把他枪杀了。

当时,抱着易生的乡亲就站在人群里。可全村的人望着血糊糊的赵仲三和面目可憎的日本鬼子,毫不畏惧,一口咬定:“杨成武的孩子早就被抱走了,不在这里,我们用性命担保!”

日本鬼子半信半疑,把几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从人群里拉了出来,用刺刀逼她们说实话。抱着易生的妇女明白,日本鬼子是想用威胁的办法找出她手中的孩子,平静地对正在啼哭的易生说:“别哭!娘这给你喂奶。”说着,把奶头塞进易生的嘴里,日本鬼子没看出什么破绽。整整折腾了一天,一无所获。

1943年,赵志珍带着易生从日本鬼子的鼻子底下——金坡转移到一座比狼牙山还高的山——五峰寨,住在一个叫不老庵的地方。那里只有一户人家,四间房,地形隐蔽。虽离日本鬼子的据点只二十来里,但在它南面的牛岗,驻着八路军二十五团团部,其东南杜岗驻着二十五团一个侦察连。由于日本鬼子不敢轻易来,人们称之为“不老庵格勒”。

一天,谁也没料到,几个八路军护送着身患疟疾的杨成武到这里来养病,恰巧与赵志珍母女碰到一起了。全家团聚,赵志珍自然高兴,可是也为丈夫的病担忧。唯独易生无忧无虑,活泼极了。

房东是一对兄弟。哥哥叫金生,年过四十,又黑又瘦,尚未娶亲。弟弟已经娶了媳妇。这两兄弟憨厚,朴实,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他们一家人按当地习俗,亲热地把赵志珍称作“老姑”,称杨成武“姑父”。赵志珍和杨成武待他们也象亲兄弟一样,称金生为大哥,把他的弟弟和弟媳妇称做二哥、二嫂。

就在这个时候,杨成武的疟疾又发作了。忽然

“哐”的一声,门被撞开了。

司令员……日本鬼子来了!”警卫员曾荣昌话音刚落,东山上便响起了枪声。

杨成武要曾荣昌立即派人上东山去了解敌情,看看二十五团的那个部队能不能顶住。

枪声越来越激烈。日本鬼子掷弹筒也用上了。不一会儿,到东山的田双喜和二十五团的一位指导员跑来了。田双喜边跑边喊:“司令员,快走快走!”

那位指导员跑到杨成武跟前,催促着说:“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人数不少,你赶紧走哇!”

军医卢星文、警卫员曾荣昌和赵志珍他们全都催杨成武快走。杨成武也意识到,很可能他的行踪被日本鬼子发现了。

这时,天空传来飞机俯冲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东山梁上白光一闪,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易生吓得哇哇大哭,杨成武连忙把她抱了起来。赵志珍从丈夫的手里夺过孩子,推着丈夫说:

“你快走,快走!别管我们。”

旁边的金生大哥也火急火燎地说:“你赶紧走吧!老姑她们有我们呢!”

日本鬼子已经冲上东山梁,离这里只有几百米了。日本鬼子的飞机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次俯冲。

“走!”杨成武大吼一声,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一个箭步便扑到了门外。这时,东山梁上满是头戴钢盔的日本鬼子,正朝这里射击,子弹啾啾地打在屋顶上。敌机扔下的炸弹也在附近爆炸。

他们刚登上西山梁,敌人已经从东山梁追下来了。他们又赶紧翻过西山梁。这时,前面是条小河,他们什么也不顾,直往河中趟。

前面又是一片开阔地,敌人凭借着有利地形架起机枪,朝他们扫射。子弹在头顶上飞过,他们跑得更快了。当他们一口气跑到天津沟的山头时,才算摆脱了敌人。此刻,不老庵那四间房子正燃着大火,周围黄蜡蜡一片,全是敌人。

“糟了!志珍和金生他们出不来了!”杨成武望着那熊熊大火,心中焦虑。接着,身子一颤,浑身发冷,疟疾又犯了。

这天晚上,他们几个人就隐蔽在天津沟的山梁上。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成武他们将随身携带的电话机取出,搭上“飞线”,这才了解到敌人退了,部队正在派人寻找他们。于是,杨成武在卢星文和曾荣昌的搀扶下向不老庵方向走去。他们登上西山梁,往洼地里一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烧焦的废墟。杨成武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呼吸也急促起来。下了山梁,刚拐了个弯,忽听有人大声喊道:

“杨师长,你回来啦?”

他定睛一看,惊喜地叫了声:“金生大哥!”便向他

扑去。

“你们怎么样？”杨成武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事也没有！瞧，老姑在那儿呢。”指向远外的墟。

“二哥和二嫂呢？”

“没事。都干活去了。”

杨成武赶紧朝那片废墟走去，发现断墙边用树枝斜搭着一棚子，棚子里铺着一堆草，草堆里有人小声地哼着：

“星儿闪，月儿明，

月儿虽亮我心悲痛，

因为鬼子正在我们国家横行。

大家醒醒，千万莫再做梦，

切莫醉死与梦生，

梦生醉死何时才能赶走日寇残暴兵。

……”

这时赵志珍在教易生唱歌。歌声是那样深沉，那样凄楚，又是那样激奋。

杨成武停住脚步，站在草棚外边，听着听着，心都快醉了。那熟悉、幽雅的歌声，不仅打动了他的心，而且震撼着被敌人践踏过的土地。

（责任编辑：徐孔）

蒋经国的墨竹画

翟书惠 石林

蒋经国是蒋介石长子，1925年去苏联留学，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格勒中央军政学院学习。留学期间，对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发表过抨击性的言，令蒋介石大为不快、断绝对他的经济支援。蒋经国毕业后留在苏联工作，担任乌拉尔重型机器厂技术员、副厂长，娶苏联人为妻，加入苏联共产党。后因苏共内部清洗，蒋经国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伐木。蒋介石怜其父子关系，把他从苏联接回，勒令他在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潜心默化，苦读圣贤之书，以“洗面革心”。在此期间，蒋经国郁闷不畅，闭门不出，专心读书。长时间埋在古书堆里，难免产生厌倦之意，闲来研究中国水墨画。

国民党军队败退台湾之后，蒋经国必竟是蒋介石的亲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在台湾的政坛很活跃。1975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继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任“总统”。

蒋经国自幼就爱写字习画，在苏联期间因与其父闹翻，心情不快，又在异国他乡，经常以写字画画自慰。特别是在回国后的溪口镇“洗面革心”时期，专心研究了中国的墨竹画，给他的国

画艺术打下了一定基础。到台湾后，公务之余总爱画几笔。他拜台湾的国画家高逸鸿为师，得益匪浅，画艺提高很快。

蒋经国画画，最爱画竹，而且有很高的造诣。但是，蒋经国的画是从不外露的。1962年，台湾国民党元老吴忠信的儿子、著名画家吴申叔组织了一家“联合传播事业有限公司”，吴申叔为董事长。公司的10位股东中有蒋经国儿子蒋孝文（寄于吴申叔名下）。蒋孝文与吴申叔等人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家中的一些隐密，其中谈到蒋经国经常和宋美龄在一起谈书论画，蒋经国作了一幅“墨竹”给宋美龄看，大受宋美龄赞赏。这幅墨竹画，高一丈二尺，宽六尺，用的是玉版宣纸。蒋经国绘画指导老师高逸鸿，在边款上题字：经国兴到之作，笔墨苍劲，饶有古趣，至可喜也。

蒋经国一生画了不少中国画，由于他不以此为生，而且秘而不宣，外人很少知道他的作品，除了他儿子蒋孝文透露出一付墨竹画外，其他作品就不得而知了。

萧劲光、萧劲光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舰队。



我们的父亲： 萧劲光大将和我们

□萧 凯

被誉为“人民海军之父”的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萧劲光大将，是我的父亲，他离开我们已经5个年头了，可是他的形象却时时浮现在我们脑际。虽说往事如烟，却是永志难忘。

1949年，战争硝烟渐渐地在中國大陸上消逝，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当年9月，我和弟弟萧能所在干部子弟学校的校长，把我们叫到学校

教务处，指着一位陌生的军人说，他是我们的父亲的秘书罗玉如同志，是父亲让他来找我们的。罗秘书说他是萧劲光司令派来的，代表他接我们姐弟俩回家，让我们就跟他走。

我们当时对“家”的观念很淡漠，只知道学校、教师、同学和阿姨们，大家一直在一起生活学习。还是1946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时，我和弟弟就跟着保育院浩浩荡荡的队

伍撤离了延安，在“马背摇篮”上穿过战争烟云，走过漫长道路。当胜利红旗在全国飘扬时，我和弟弟已经多年离开父母，不知有家。那时我们年龄都小，连父亲的模样都记不清了，也不知他在哪里，又为什么一直没有来看看我们，甚至以为父亲大概不要我们了。所以真舍不得离开学校，去那个陌生的“家”里。

在校长的劝说和解释下，我们

还是跟罗秘书走了。他把我们带进了一座当时看来十分高级的地方，后来知道那就是北京崇文门附近的解放饭店。罗秘书领我们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大房间，指着里面一位魁梧健壮的“首长”，说这就是我们的爸爸，我们一面怯生生地叫了他，一面好奇地打量他。只见他穿着一身已褪了色的旧军装，腰扎一条带铜头的宽皮带，脚蹬一双黑色的皮鞋，一副威严的派头。只是那久经风霜的脸上，一见我们就露出了亲切慈祥的笑容，这使我那已经模糊的记忆，一下子清晰起来。当年住在延安窑洞时，他不是也这样笑着抱过亲过我们吗？当他张开双臂迎向我们时，我毫不犹豫地推着弟弟扑向了他那宽阔的怀抱，享受着那虽已淡忘却很炽热的亲情温暖。当他叫着我的小名“燕燕”亲着我时，我感到幸福甜蜜极了。

我见到爸爸后，在北京只住了一个星期，他就领着我们全家去了

湖南长沙，成为他的故乡的军管会主任。我们住在长沙时，父亲总是很忙，每天都是很晚才回家，我和弟弟有时就坐在大门外的石凳上，向着父亲回来的方向，望眼欲穿地久久等待着，那时他只有星期日才能抽出半天，和我们一起说说玩玩。他常用自己那双粗壮的大手，抚摸着我们说：

“孩子们，想爸爸吗？”

我们齐声回答：“想！”

他马上高兴地笑道：“爸爸也非常惦记你们哪，就是我太忙了，不能多和你们一块玩。”

有一次他问我们长大了都想干什么，我说要开飞机，弟弟却抢着说：“我们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军人。”

爸爸笑着连声说好，又嘱咐我们道：“无论做什么工作，首先要好好念书，做一个好学生，我要看你们谁最有出息。”

我们在长沙住了不久，爸爸于

1950年被中央调回北京，受命创建中国人民海军，并担任了海军司令员。1953年春天，爸爸带我们去青岛，他在海滨浴场对我们说：

“你们作为海军司令的儿女，都应该学会游泳，学游泳，能锻炼拼搏精神和坚强意志，使自己在困难中勇往直前，决不后退！”

我们就按他说的，每天早晨6时就去浴场，中午也不休息，傍晚也去游，很快使我不再是“旱鸭子”了。在学习上我们也是遵照爸爸的教诲，认真听课和完成作业，因此我们的学习成绩在班上都能名列前茅，使爸爸和学校都很满意。

爸爸既是威武军人，又有文化素养，称得上多才多艺，他在少年时期是学校里有名的足球中锋，当时他和任弼时叔叔是同窗好友，常在一起踢足球。后来他和任叔叔一起参加革命，又同去苏联学习，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有一年中秋之夜，我们全家在一起欢度佳节，明月当空，



繁星满天,爸爸一时兴起,取出一支珍藏着的竹箫,为大家吹奏起优美动听的民族古典乐曲,这时他不再是威震四海的海军司令,而是一位儒雅散淡的长者。虽然他吹箫的机会不多,但是从那宁静温馨的庭院中传出的悠扬箫声,我却终生难忘。爸爸还爱弹弹“曼陀林”,那是一种国外弦乐器,他曾用来弹奏外国民歌。延安时期的许多民歌,他不仅会唱,还经常哼出声来。休息时,他很喜欢跳舞,还常抽空在家练练书法。他是兴趣广泛感情丰富的将军。

我有幸参观了一次海上检阅。那是1957年8月,在父亲安排下我去青岛登上军舰,只见万里晴空下的海面上,一列列挂满彩旗的军舰、快艇等等,排成了阅兵队形,早已发动待命。每艘舰艇上,都整齐地站立着精神抖擞的海军官兵。上午时,敬爱的周总理上了检阅台,紧挨着他的就是我的父亲、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他穿着洁白的海军服,佩戴着大将肩章,威风凛凛,神采奕奕。海上阅兵式开始了,父亲亲手创建和直接领导的中国人民海军,以强大的阵容和昂扬的精神,向党和人民进行汇报。那庄严宏伟的场面,使我十分激动,我感到面前的一舰一艇和一行一列,无不渗透了父亲的心血。我真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

那年我正在北京女一中学读书,我家就住在北海公园附近,爸爸常约我和他一起去公园散步。一天,

我又陪他去了北海,我们先在湖边小径上漫步,然后又坐到树下长椅上聊天。记不得怎么引起的,他说起了自己的出身,他说:

“燕燕,你知道吗?咱们家原来是很穷的,你爷爷开了个小小的豆腐作坊,奶奶会用木机织土布,全家七八口人就靠他们的劳动收入度日。那个艰难,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他说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也只有他活到了全国解放,其余的全在贫困中去世了!由于他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的,因此他一生都很俭朴,他穿的内衣、衬裤、袜子和常用的床单,都打着一块又一块补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实在看不过去,趁他不注意“处理”掉了几件。他发现后很生气。问道:

“你们把我的衣服丢到哪里去了?快去找回来。”他说:“你们这样是不对的,衣服、袜子破了,补一补同样能穿。你们知道吗?毛主席的内衣也有补丁,周总理一向注意节约,党和国家领袖都这样,我们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父亲又对我们说:“我们国家还很穷,几亿农民就靠种田养活自己和全国,任何浪费都对不起劳动人民。”

所以,每次和他一起吃饭时,父亲只要见到谁碗里还有半粒剩饭,他马上就吧吃过后叫回来,叫他吧残余米粒“消灭”干净,以致这成了我们家的习惯和传统,连我们的孩

子也从小知道该这样做。

我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在延安时,父亲穿着八路军军服,背倚土窑洞,抱着才一岁半的我在逗着玩。长辈们告诉我,那时父亲先后担任了中央军委参谋长和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是毛主席在军事上的助手之一。我的母亲朱仲芷,原来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后来辗转来到延安,找到我父亲,才生下了我。我小时候常被父亲牵着手,在窑洞前学步,我两岁时,他就教我唱道: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英勇的呀八路军……”

那时毛主席就住在我家的后一排窑洞里,我父亲常到毛主席那儿去,有时灯火通明时进去,直到天已大亮才回来。每次他一到家总要亲亲我,如果我正醒着,就要抱起逗逗我,常常把我高高地举过头顶,笑着问我:

“坐飞机了,高不高啊?”

妈妈说我是爸爸的一把“开心锁”,萧华叔叔说我真是爸爸的宝贝女儿,还说我长得最像爸爸,我为此十分得意……

如今,爸爸已永远离开了我们,我每每想起他时,总默念起毛主席的诗句: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

父亲的“劲光”将永远照耀和温暖着我们的心!



总政“右派” 当了麻风病医生

编者按

樊斌，五十年代军队著名作家，一场反右斗争，把他发配到边疆进了劳改营。如今，他已是著名的麻风病医生。作者十分熟悉这个被误诊为政治“麻风”人的兴衰际遇，他以真切沉重的笔触，为我们焊接了樊斌大沉大浮，鲜花坟场的大悲大喜生平。

吴
戈



从《雪山英雄》到《人面桃花》

1980年昆明市文学月刊《滇池》，以头条位置刊出小说《人面桃花》。爱情故事中，装进了一个“麻风病保密治疗法”的社会道德问题。小说首先引起了医疗卫生界的注意，1981年，卫生部顾问马海德到昆明开会，读了别人推荐给他的《人面桃花》之后，他立即把作者请到春色撩人的翠湖宾馆，见面就说：“你的保密治疗法很好，要干下去。”

同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麻风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谈到了《人面桃花》，认为应该推广麻风病的“保密治疗法。”

小说作者何许人？署名樊斌。

樊斌？难道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那个创作者？在1956年“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上被誉为“新秀”，其长篇小说《雪山英雄》被评论家称为“深入生活贴近斗争前线的重要收获”的那个樊斌？熟悉中国五十年代文坛的人们会本能地这么联想。

樊斌？12岁投八路军，当卫生员、看护长、医生、卫生队长，解放西藏入藏先遣大队副大队长，“年轻的老革命”怎么搞起麻风病防治来了？军界一些人心下疑惑。

其实，医疗卫生界注意到的樊斌，文学界、军界人士在记忆海洋里搜寻、打捞的樊斌，就是同一个人。从众人瞩目的文坛，到几乎被社会遗忘的麻风院，樊斌的生活曲线变化的确太大了。从《雪山英雄》到《人面桃花》，正好是樊斌生活跨度的形象记录。人们欣喜地看到，樊斌依然活着，并且一如既往地工作着、战斗着。

有的人为写作而“下生活”，有的人因生活的催促而搞写作。樊斌属于后一种人。他的《雪山英雄》和《人面桃花》，都是他的生活的副产品。1952年初，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了云南省丽江县，解放军十四军四十三师的师长廖运舟和师政委郭庆基，指名要樊斌去汇报从云南大理到西藏察隅之间一支英雄部队建立起的“钢铁运输线”情况。人们这才知道：组成钢铁运输线的这支部队，比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历的艰难困苦要多得多。从梅里雪山脚下到西藏察隅的竹瓦根地段，要横跨海拔在4千到6千多米的十座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深邃的怒江峡谷，泥泞的独龙江源头大草地。漫漫六百里地，人烟稀少，民谚总结那里的气候条件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破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正好走的季节，这支部队没赶上，从“十冬腊”到次年“淋破头”的季节，英雄战士们克服了严重的高山缺氧反应，在雪里雨里，泥泞中深壑里，奋战了两百多个日

日夜夜，驮补给的牲口成批倒毙了，可英雄们肩扛背驮，一天往返百余里，一人最多的运送四袋大料，超过了一头最壮的骡子的运输能力，用革命战士的惊人意志和难以想象的体能，超额完成了给入藏部队保障补给的服务。

樊斌说：“那雪山草地上的日日夜夜是一首歌：人生美好、人生崇高、人生壮丽。明知宝贵的人生属于自己只有一次，却又争着把牺牲的可能留给了自己……追忆长眠在雪山草地上的战友时，樊斌声音哽咽，泪花闪闪。

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艰苦奋斗精神震惊了；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被祖国亲人的英雄业绩感动了。著名诗人公刘也在座。会后立刻找到樊斌，说：“你应该把你所讲的英雄业绩写出来，昭告天下！有什么困难，我帮你！”

就这样，在云南临沧的剿匪战斗间隙中，樊斌拿起了笔。让自己的感情流淌在稿纸上。

稿子还没写完，仅得前9章，他又奉命去朝鲜前线。过昆明时，他将稿子交给公刘。待半年后回国，才知道稿子以《雪山进军》为题在《解放军文艺》发表了。

就这样，樊斌开始走向文坛。昆明军区文化部给了樊斌专门的时间，派公刘给予创作上的帮助，《雪山进军》扩充到21章，以《雪山英雄》为题，1954年6月，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樊斌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年他28岁。

不想，三年之后，他跌下深渊。先是销声匿迹，然后从死神殿里穿堂而过，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麻风病院。

成为麻风医生前，他已是“麻风”

樊斌是在战火硝烟中长大成人的，他见过太多太多的枪伤刀创、残体断肢和生命垂危的伤员，他们都是为社会赞美的人，虽残犹荣；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竟会走进麻风病院，在与世隔绝的大山皱折里和一群手蜷足跛、鼻塌眼斜的残损的生灵生活在一起，被生活拒绝，被命运抛弃，就象一群被开除了“人籍”的人，虽生犹死！他开始痛切地感到：自己与麻风病人已“同是天涯亡命鸟，共为世外可怜虫”。他也是“麻风”，可是“政治麻风”呵！

1957年，在那场“反右”斗争中许多仗义执言、呕心补天的人纷纷落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被抛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7人小组”是：公刘、白桦、樊斌、沈默君、徐光耀、艾耶、何孔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描绘党及其军队的英雄业绩以教育人民、激励自己的这些人，怎么突然转而反党？

樊斌更是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也被定为“反党”。樊

斌是符合那个时代最硬的政审标准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还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他5岁上死了母亲，找到了八路军，他才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亲人的深情”。

“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怎么会反党？”樊斌梗脖子反驳开了。“我只是指出了××部长的文艺讲话不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

“××是党在军队的代表。反对他，就是反对党！”

“荒唐！个人怎么能代表党？他只能代表他自己！”

“不能狡辩！不许回嘴！你顽固不化！”

樊斌缄默了。在宣布“开除樊斌的党籍军籍，遣送劳动改造”的时候，他满腹委屈。怀疑那不是真的。他坚信那不是党的决定，也坚信自己没有错。

1958年5月，樊斌被押送到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的宾居劳改农场。在他之前，那里已经集中了军队和地方送去的150多名“右派”。他们被告知，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他与另外三人编成一个劳改组，一个是军队作家彭荆风，一个是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名演员崔明理，再一个是流氓惯偷。惯偷犯是组长，领导、监督三个“右派”。

三个被监督的“右派”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特别是崔明理，他是在话剧舞台上演正面角色，“虎胆英雄”，“钢铁战士”，“无敌勇士”……他塑造过许许多多的英雄人物，现在，生活派给他了一个极糟的角色——一个比流氓惯偷还难于被社会接受的可怜虫。一夜之间，党的伟大光荣、军队的荣誉都统统与他无缘了。

“我们在劳动中比一比高低，如果我们输给了你，我们服从你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如你，我们服从你领导；如果你不如我们，那么你就少管我们的事！”彭荆风对小偷组长说。

“同意！项目由你挑选。”崔明理应和。

“嗨……嗨……”惯偷一看同屋的三条汉子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英气逼人，心里就先自软了下去。江湖中人，是不吃眼前亏。“赛就赛！龟儿子才怕这个呢！”

第二天，惯偷选的农活是挖板田。半天下来，惯偷就累得躺在田埂上直哼哼了。

“龟儿子才要当小组长呢！”惯偷有气无力地自我解嘲道。

他们胜利了，可一点儿也没有胜利的欣喜，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酸的胜利呵！

沉浮在饥饿与死亡之间

樊斌到劳改农场不久，“大跃进”的飓风也卷过了那里。豪情漫天，人歌动地，大战钢铁铜，向地要高产，

劳改农场也不甘落后，决心要放一颗“红薯亩产30万斤！”的卫星。

樊斌纳闷：只有在一亩地上无间隙地层层地铺上一米厚的红薯，才能凑足30万斤的重量。

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怎么会大哄大闹地当做奇迹来创造和承认？

卫星地建成了，把周围地里的土都掘来垒在卫星地里，一米多厚，红薯秧种上了，化肥，农家肥尽量往地里沤，甚至将猪场病死的猪用来熬肉羹往地里浇，可是，刚出秧子就打蔫见黄。请专家会诊，缺水，于是，又用手摇水泵日夜不停地为红薯秧洒水……到收获季节，在卫星地边开现场会，放鞭炮，敲锣鼓，好不热闹！结果，掘土三尺，一只红薯也没翻出来。只有一根一根又粗又长的根藤，看去浑似一堆堆老鼠尾巴。放了一颗“老鼠尾巴卫星！”

但谁能说什么？谁又敢说什么？

人不能说真话，不敢说真话了。遍及全国的违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很快将共和国从领袖到平民推下了饥饿的深渊。在劳改农场挖矿、烧炭、伐木、炼铁、种田都干过的樊斌，一次又被派去炸石头。一炮接一炮地响，数一数，哑了一炮。排哑炮很危险，当然是他去……不料，哑炮就在他走近不到一米的距离炸响了。眼前红光一闪，他身不由己地飘了起来。待他从浑身钻心的疼痛中醒来，已是第四天，眼前一片漆黑，他被告知，眼睛炸坏了，浑身上下已没有一块好肉……他想，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在背着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名时闭了眼，就这么死，太窝囊了。

他被送到医院，刚好是他在十四军时的部下赵健夫当外科副主任，在他的精心治疗下，奇迹般地活了过来，两只眼睛保住了，视力恢复到0.3和0.7。他开始躲躲藏藏地写一部“城”的小说。接近“文革”的时候，60万字的书稿写完了，他仿佛熬尽了全部的生命力。可谁知，这书稿被发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围攻，翻来覆去地批判，他烧掉了书稿。

樊斌说：“烧书时，就像烧掉自己被撕碎的身体。”

在人心的沙漠播种爱心

樊斌劳改释放后分配到云南大理的山区贫困县——漾濞。“四清”运动，他被重戴“右派”帽子；刚刚解脱冲击批判，“文革”又开始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正是他在漾濞县医院当班，有一个叫老刘头儿的病人找他，他检查时除发现病人两只脚背上有对称性皮肤损害外，别的与正常人无异。樊斌请皮肤科的一位资深医生来会诊，结果确诊是麻风病。他们给老信发了药，问老信的住处，老信死活

不说，拿着药走了。过了两天，有人传来消息，说老刘头儿回家的当晚就吊死了……樊斌说：“作为医生，最难过的事莫过于确诊了疾病却不能救治，眼睁睁看着病人走向死亡。漾濞县是麻风病的高发区。建国以前，漾濞民间对待麻风病，是消灭病人肉体以杜绝传染。

讲点儿“人情味”的，是所谓“三愿意”的死法。即一是村人邻里愿意病人死，二是病人的至爱亲朋愿意他死，三是病人自己愿意死。三方意见统一后，在现场举行一定的仪式，然后处死病人。有一家人，弟弟亲手将哥哥捆绑在树上，然后由村民用乌铳打死病人后烧化；也有病人迷信，怕枪子儿洞穿不得全尸，或火烧后尸身不存，有碍于投胎转世，就要求活埋。他们在全村男女老幼的注视下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后，昏昏沉沉地自己跳下挖好的深坑，让铲土的人动手快点儿，死个痛快。

也有颇符旧的伦理纲常的。子女染上麻风病后，父亲觉得既有辱家门，又有碍乡里，便“杀子报”。漾濞龙潭有一男子，得知父亲得了麻风病，借口隔离，在山上搭了个小棚子让父亲住，月黑风高之夜，一把火烧棚杀父，也烧红了半座山。

更多的是麻风患者的自杀。投水、上吊，抹脖子……还有病人花几天的时间背干柴堆在崖下，点燃，然后爬上崖头跳入火中。

也有患者，既不愿离开人世，也不愿离开家园，便走入深山，于是，族人乡里共怒，围猎式的集体谋杀便开始了。建国初期漾濞瓦泥窝发生过一起民兵参与围杀麻风病患者的事件：民兵悄悄逼近麻风病人住的窝棚，架起干柴，团团围住，趁风纵火。病人多被烧死，有一个拚命冲出火海，带着浑身火苗扎进河里，又被人们追堵在沿岸，用乱石砸死，尸漂在水中……

一个人，不幸染上麻风病，便只有死路一条了。樊斌觉得，自己被戴帽、摘帽，然后重新戴帽，反反复复，情形却是一样的。麻风病人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不幸，使樊斌产生了深切的同情。

他开始钻研麻风病学，开始思考麻风病患者躲医生的，怕医生的社会心理问题。

樊斌申请去了莲花山麻风病院，他要在那人人怕去，被社会遗忘的山坳里用人道主义事业重新确立自己的生活支点，用宽厚的理解，深切的同情这种人性的光辉，去烛照自己生命隧道中最黑暗的一段。

莲花山上，只有个破庙“莲花寺”，在那里，花开花落，是寂寞的。但樊斌说，他获得了自由。

看看云蒸霞蔚的青山，再看看破败空寂的神庙，樊斌在思索：这是不是佛家的那种“色空”境界的写真？樊斌万没想到，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被那些明的暗的麻风病人当做救苦救难的菩萨，供奉进了绝望空寂的心灵之殿。

但一开始樊斌却被患者视为仇人。

有一个姓何的病人，一家几口都患了麻风病，被送上了莲花山麻风病院。但五天后全家又逃回村中。全村人打了一纸按满红手印的报告给县里，请将何家押送莲花山隔离，结果县委、卫生局的头儿与樊斌一道，亲自去何家说服劝导。一到何家，便被围起来大吵大闹，声称他们没病，是仇人毁何家的名声，要与仇人及其帮凶（指樊斌一行）拚命。何家儿子手执砍刀疯狂地乱砍近旁的木桩，木屑示威地溅在樊斌脸上……

还有个姓杨的病人，是樊斌确诊为早期麻风病而接上莲花山的。病人与医生配合，治疗效果特别好，三个月皮肤损害消失，半年就达到了治愈标准，再巩固半年即可出院。但这时病人扬言：他没有麻风病，是樊斌误诊，樊斌必须为他“平反”、“摘掉麻风帽子”，否则就要杀死樊斌。

樊斌一如既往地到病区、隔离区检查、送药和写医疗记录。

樊斌说：“在社会偏见的重压下，麻风病人与医生的关系是扭曲的。病人躲着医生，躲不过就辱骂，就以拚命相威胁的事，经常碰到。”

莲花山有4个病愈妇女，是1952年某地一次屠杀20多个麻风病人时的幸存者。命大不死，送上了莲花山。康复10多年了，亲人邻里都不希望她们回去，她们也不敢“重返人间”。

另有两个男患者，病愈后满心希望打点回家，但迎接他们的是门闭狗咬和家人的恫吓，于是，一个吊死在门前树上，一个撞死在门边。

还有一个患者，上莲花山前是部队技工，病愈后部队不再接纳他，让他爱上哪儿上哪儿，按住院病人待遇每月给他汇寄费用……

有这样的社会压力，麻风病人心理负担怎会不重？樊斌决心帮助他们。

现代医学技术打破了麻风病不可治的偏见；樊斌的实践证明：初期麻风病的治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他还注意到一个事实，莲花山麻风院建立20年的时间里，患者有国家供给的口粮和生活费，还开地种庄稼，自获自得，因此较之四周数里之遥的山村，麻风院显出物质的富足。山民男男女女挡不住诱惑，不断有人与莲花山的在医病人交换物品，同行同乐，甚至攀干亲“打老友”，接触频繁。20年中，周围只出过一个麻风病人。那是一个接纳从莲花山逃出去的女患者同住了三天的老嫖夫。这说明麻风的传染强度是有限的。经过治疗的病人传染性要比未经治疗者的传染性小。再次，怕戴麻风帽子影响终生的患者隐藏在民间，是最危险的传染源。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消除偏见，另一方面也要消除患者的心理负担。否则，防治工作事倍功半。

樊斌的工作志上写上了这样的话：对于医务工作

者来说，疾病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更是社会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者，尤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樊斌大量地在学校、工厂、农村各种会议上散发传单，宣传麻风病知识，宣传病人与医生秘密接触，单线联系、领药回家，定期检查的“保密治疗法”。

还真灵，很快就有人按宣传品上的地址找到了樊斌家，也有人在赶集的场边偷偷跟着樊斌，到僻静处悄悄说话。他们都是听人闲话或看了宣传品后，根据樊斌列出的麻风病早期自感症状判断，然后去请樊斌确诊秘密治疗的。这一来，原先确诊了的患者也抵死要赖，知道得了麻风还东躲西藏逃避医生治疗的情形改观了，患者悄悄地主动找上樊斌的门，悄悄治愈后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樊斌是个坦荡的人，但他心中藏着一卷秘籍，上面写着一个个秘密治好了病的患者的姓名和病历。

樊斌是个沅在痛苦里的人，但他却在莲花山那快被社会遗忘、被生活拒绝的山地上品尝到了幸福的甜蜜；找回了自己也一度认为已经失落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樊斌在身体健全的正常人社会里是个被嫌憎的角色，在那充满了绝望和痛苦的非正常人社会里，却又是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在一次经验交流会上，樊斌语惊四座：“有人敢吃麻风病人送的东西么？我敢！麻风病防治工作一点儿也不神秘，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要敢于接触病人！”樊斌去过漾濞县所有麻风病患者的家；无论他在吃饭，还是在睡觉，或是在家休假，麻风病人都可以去找他。麻风病人杀猪宰羊，养鸡生蛋，总要送去最好的肉，最大的蛋……他的病人以虔诚的目光追踪着他，以面佛的的心情信赖着他，以顶礼的方式迎接着他。

人生如梦，情系山民

1979年，在樊斌蒙冤受屈捱过了22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收到了总政《关于纠正樊斌同志冤假错案的通知》。

樊斌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扑进了旧貌依稀的北京城。樊斌迈着走惯山路的步子，跨进了总政大院。依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机关的恢宏气派，但那些年轻英俊的面孔，他却一个也不认识。老了，过时了。这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感，蓦然涌上心头。他征服过雄关险隘，草地雪山的腿脚，忽然有些飘忽。

“樊斌同志，组织决定，推倒加在你身上的不实之词，正式恢复你的党籍军籍，然后按干部转业待遇安排你。这些年你受不了不少罪，吃了不少苦，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是谁也无法左右的历史。我代表党，代表总政向你道歉，对不起……”

对不起？不，不不！这不是党的错，可是，“开除

党籍军籍，遣送劳改”、“向你道歉，对不起……”两种声音，交替出现，又都说是代表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打他“右派”时，樊斌说自己“有保留意见”；为他平反，党向他道歉时，樊斌也“有保留意见”。樊斌坚持说，他的“右派”不是党定的。

他还能去找谁？谁来对他这22年的坎坷负责？樊斌想起他刚上莲花山就听说过的一件事。大理州洱源县开展过一次普遍的身体检查，某单位职工比别人多检查了一次。后来有人说，那次体检是麻风病普查，有人进而分析；别人都只检查一遍，为什么某职工查了两遍。八成有麻风病可能。起初，这可怜的职工不知道别人为什么疏远他，躲着他，后来无意中听到别人的议论，才知道自己被疑为麻风，一时吃不下，睡不好，终日惶惶，偏巧这时身上起神经性皮炎，自己吃磺胺消炎，偏又是过敏体质，身上又起了似癣非癣的固定性药疹。这就使他自己也觉得很象得麻风病了。一急，就到图书馆借了一本《麻风病防治知识》，找到“症状和反应”条目对照，这就让人更加肯定他患了麻风。他一趟一趟地上医院检查化验，化验结果，否定了公众的怀疑。但他每隔一段仍然跑医院化验，终于有一天，经化验结果不知是拿错了还是医生看错了，报告单上赫然写着：麻风！他上了莲花山，一呆就是六年。这期间，妻子离婚走了，儿子被说成“麻风的儿子哪能没麻风”？丢给年老体弱、孤身一人的老母。母亲连气带病咽了气，儿子尚幼，无人照管和收留，也死了。直到有一天昆明麻风病院院长胡烈教授到莲花山调查，才确认那洱源县纯系误诊，根本没有患过麻风病。他出了麻风院，物是人非，人去屋空，满目凄凉，孑然一身。生活对他来说，一切都已成过去……此刻，樊斌觉得自己的命运就有点儿象那个被误诊为麻风病的洱源人。

樊斌又穿上了身崭新的国防绿军装，走在古老的故宫城墙下，汇入十里长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拜访了一些经历相似、劫后余生的老战友。哭了，笑了，叹息了，沉默了。樊斌发现，自己裹着一身中山服的躯体，与穿上一身军装的躯体，对于这个躁动的世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穿上军装，已不再合体，不再威武挺拔。樊斌觉得自己象一截疤痕累累的老树桩，随便套上什么衣服，都不会有人特别注意地看上一眼了。生活舞台的布景换了，台上的角儿也就换一拨儿。樊斌觉得自己是背时的角儿，在大都市里，在总政大院里，他都只有看戏的份了。

演戏，看戏，22年光阴，苦熬时漫长，回首时匆匆。

军队著名剧作家胡可代表组织找樊斌谈话，热情的眼睛里，深藏着同情和惋惜。和22年前批斗会上樊斌看到的一样。当时胡可一声不吭地坐在角落里。樊斌感激他。

“你愿意到哪里安居？组织上尽量安排。”

“回去。回山里。”樊斌简短地回答。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樊斌说：“没有。”

22年成一梦，识透生死两茫茫。还有什么值得他要求的？当他做梦都想回去的大院变得陌生的时候，他深深感到，他的生命根须，已经牢牢地扎在了云南边疆那座小山城了。他已经离不开那块给他过痛苦的记忆、也教他更浓厚、更广阔地懂得了生命价值和意义意义的土地。

樊斌回云南了。回到了那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愈烧愈亮的民风淳厚的小山城。山民迎着他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老樊，你施善似霖，积德如山，这回可是功德圆满，云开雾散了！”山民中有点儿旧学根底的斯文人郑重其事地代表众人讲话，捧酒过瓶。

看着山民们眼中闪动着的真诚喜悦和衷心祝福，樊斌的眼眶湿润了，热血沸腾了。“救苦善士”，这是憨厚的山民们为他“定格”的形象。他还是个“角儿”，人生的戏，他还没有演完……

樊斌铆足了劲儿立刻投入工作。他觉得，有那么多人关注他，珍视他，已经足慰平生。这种生活回报，甚至比一纸公文的这结论那评价更有实际意义。

在不公平的阴影里顽强地奋斗，收获公平；在绝望的土地上坚韧地劳作，播种希望。这就是樊斌用生命写就的一部书浓缩成的格言，就是生活对他“善恶分明”的最终回报的全部底蕴。

1986年，樊斌离休了，过着恬淡宁静、深居简出

的日子。他读读写写，陆陆续续将活在记忆中《城》的片断写成短篇小说或散文，奉献给下一代；他走走看看，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有人说：“老樊进入了与世无争的境界。”接触多了，我觉得樊斌并非如此，在一些他觉得有价值论争的事情上，他还是要争的。

在一次人代会议上，樊斌极其认真地提出了一个“废除少数民族可以生多胎”的议题。他认为，从提高国家人口素质，优生优育的角度看，计划生育的少数民族政策弊多利少。他盛赞新加坡依据家庭的学历结构、经济状况制订的人口优化增长政策。他毫不顾忌自己是在民族自治州当人民代表，结果赢得了只是白眼。

1991年，一个因写战斗通讯出名的军队作家来到大理，给大学生们讲国内形势，又扯到了“反‘右’斗争”，竟然说：今天有些人的表现看，当年我们党进行“反右”斗争，很及时，很有必要。打他们“右派”打对了！

后来樊斌听到这事，勃然大怒了。34年前，围攻樊斌时叫得最响的声音中，就有此公的喊叫。说樊斌身上有匪气。如果，这两位战友出现在这样一个会议上——34年前的伤害者与被害者，一个被簇拥着坐在台上，沐浴在大学生崇敬、景仰的目光里，神采飞扬，侃侃而谈；一个——坐在台下，神情忧郁，心潮澎湃，那会是怎样的一个戏剧性的场面？

功过是非，由历史“移情”到个人的时候，便不容易说清楚。让读者判断、后人评说吧。

（责任编辑：刘家驹）



上海

— 股市大悲剧



1992年，上海股市汹涌澎湃，数百万炒股大军群情激昂，人头攒动，在全市各个股票交易所门前，连续数日长队不绝，且都是通宵达旦、大有把交易所的大楼挤倒之势。

疯狂的股市，疯狂的股民，疯狂的暴涨……“股潮”涌到顶峰之后，突然风云骤变，漩涡四起，于是疯狂的暴跌，疯狂的抢跑道避“套绳”，疯狂的大抛股……不少人在“疯狂”中，倾家荡产变成一个个“穷光蛋”。由此生发了一幕幕自杀、被杀、离婚……

午夜一股民家女儿被杀，巨款被窃

1992年6月8日凌晨，淀海路住宅小区一户人家的窗口，突然闪出一个人影来。

“抓贼！抓贼！”

住在小区4号的女主人陈林娣，临窗一边呼叫，一边心慌忙地走进小房间察看，发觉放在大橱抽屉里的10张认购证和8万元现金不见了，再推了推睡在床上的9岁女儿芳芳，见没有反应，急忙撩开被子一看，不由惊呆了，女儿已死。

经公安局法医勘验，芳芳系被人勒颈窒息而死。公安人员分析，罪犯是个非常熟悉她家情况的人。陈林娣提供的人多是麻将桌上的牌搭子。公安局抽调了多名得力干警，对40人进行逐个调查。2天后，线索汇总，重点嫌疑落在了与陈林娣合伙炒股的施阿三身上。

在审讯室里，施阿三交代了全部的犯罪经过。

作案前一天，陈林娣和施阿三等4名炒股合伙者见购进的新股“异型钢管”股种，已上涨六倍，商量决定由施阿三负责抛出。抛出后，一下净赚了8万。施阿三想独吞这笔巨款。作案那天午夜，他拿了作案工具悄悄来到了陈林娣家，撬窗门进房。正当施阿三打开大橱门，拉开抽屉窃钱时，芳芳在半梦半醒中翻了个身，施阿三唯恐败露，竟丧心病狂地扑向床前，用一根准备好的绳子将芳芳勒死。

这在申城的炒股热中何止是一个案例？

据调查，在1992年中，发生的近20起合伙炒股杀人案例，其中有12人死于这种杀人斗殴中。

上海某仪器厂青工罗某，与8名同事合伙炒股。大家把钱凑到一块，罗某则“请事假”整日守在证券交易所。他的工资则大家分担。炒股两月，净赚6万，大家要平分所得。罗某不答应，他想独得四分之三。这下把7个合伙人激怒了，罗某被一同事用铁棒砸死。

殡仪馆内哭声悲凉凄凄

8月12日上午，上海某殡仪馆3号厅内一个少妇伏在盖尸罩上哭的死去活来：“……现在是人财两空叫我带着女儿怎么过啊……”

少妇名叫袁小丽，死者是她丈夫叫朱文华，4月以来上海的炒股热迅猛上升，报纸、电台及电视都在介绍“杨百万”。袁小丽就动员丈夫朱文华炒股。一天，朱文华咬牙借了3万元投入股市“激战”中。那是5月27日，朱文华兴冲冲来到万国证券交易所，买了每股2500元的12股真空电子股票（用他人卡）。谁知，不到一个星期，真空电子股票就下跌了530元，一下损失了6000多。袁小丽不罢休，让丈夫请病假去“督股情”，一旦股价反弹到买进价就马上抛掉，那知股价一跌再跌，使站在电视屏前的小两口惊心动魄。9月份，真空电子这一占申城股种70%席位的龙头股跌到了1200元一股，股民们大喊“出血”！纷纷抛出，10月份，真空电子跌到了800元一股，这期间已有数十名炒真空电子者因承受不了而自杀或发精神病。而朱文华却仍“坚决”顶住不抛，11月份，真空电子股种再跌到了650元一股，20日已接近面值。朱文华精神崩溃了，他昏昏沉沉地回到家……

晚上，袁小丽带着女儿回家，一进家门就嗅到了一股浓烈扑鼻的农药味，开灯一看，朱文华已直挺挺地躺在了床上……

袁小丽放下女儿扑在了丈夫的身上大哭起来：“你醒醒……，你快醒醒啊！……”

朱文华再也没有醒来，他只是在一盘磁带里留下了一段遗言：“……小丽，我不配做你的丈夫，你带着女儿去寻找一个好男人吧。我祝福你！……”

盲目炒股出悲剧

1869年9月26日，美国两个巨富投机商操纵龙断股市，造成全国股市大崩溃，使许许多多企业倒闭和破产，从而发生了诸多负债者自杀的悲惨事件。这一天正好是耶稣的蒙难日；后来股民们把股票下跌之日叫做“黑色星期五”。

1992年6月的上海股市也成了一些炒股亏损者绝命的“黑色星期五”。

6月27日晚上，居住在黄浦区凤阳路某弄的青年男子刘某触电自杀身亡。

两个月前，刘某得知哥哥姐姐玩股发了财，他借了2万元，买了联合毛纺厂、延中和大飞乐三家股票。自从买进股票后，股票行情每日下跌，短短一星期已亏了4000元。

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刘某再也没有勇气了，自叹命运对自己不公平……



上海某钢铁铸造厂青工吴天强年初涉入股海，短短四个月就赚了10万。于是吴天强又购了延中实业，真空电子这两大申城“领头”股，殊不知他购进后股市出现上下徘徊的趋势。其实这种平静已开始蕴育着一场“狂风暴雨”，一些炒股大户老手纷纷争抢跑道大抛股票。而凭运气炒股的吴天强全然无动于衷，直到一天跌至473元一股，面对如此惨跌，吴天强眼看连老本都要赔光了，由失望变为绝望；在一个星期四的深夜，他悬梁自尽了。

上海某宾馆男服务员周某，一无炒股知识，二无钱财的情况下，从亲戚处借了3万元钱盲目投股，不到2个月，亏掉了2万元，又无力还债，一天深夜从家里7楼上跳下……。

出洋迷在炒股市场中的悲喜剧

她，罗小姐，长得眉清目秀，五年前她从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进入一家四星级宾馆从事秘书工作。罗小姐聪明能干，好胜心特别强，曾立志要出洋闯荡世界干一番大事业，当一个女百万富翁，但她四处托人办出国之事眼看就要成功之时，申城忽然刮起了一阵疯狂的炒股热。既然国内也能发财致富，何苦飘零异乡他国去“孤军作战”呢。于是罗小姐决定在国内干一番大“事业”——炒股。她买了大量有关炒股方面的材料，“刻苦”了两个月，自以为已“满腹股论”了，将4万元办理出洋的巨款抛入股市实践，此时已进入五月份，罗小

姐购进的都是翻了几倍的二二手“旧股”，而一个月因股价放开，新股不断上市，使罗小姐购进的那些“旧股”成了无人问津的“冷股”，再加上这里“旧股”在原来毫无股价变化规律中被哄抬后出现了严重的“内伤”，从而导致了“身价”一落千丈，4万元购进的“旧股”一下只有4000元的价值了。罗小姐被“击昏”了，惨重的损失，使她一蹶不振，渐渐大脑出了“毛病”，患上了精神病。

在'92申城的炒股热中，约有近5万“出国迷”调“枪头”而转入炒股票，其中75%亏了本。

碎尸案在股市热中不断出现

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界处，一片静谧。突然，一个黑影驾着一辆摩托车由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地驰向外滩外白渡桥，当摩托车开至桥中间之后，猛然一个刹车，一个约40岁上下的男子下车后忙把车上装着的几大包东西朝苏州河里扔，发出几声扑哧哧的落水声。

“站住！”几名巡逻的武警从苏州河边的黑暗中冲出。

那男子连忙驾车逃跑。

约10分钟后，男子驾驶的红色“幸福”牌摩托车出现在西藏北路和新疆路的交界处。此刻，男子发现车后有四辆武警摩托车正快速向他追赶而来，不由加大油门。车驰至新闸路口时，突然来了个急转弯，妄想甩掉“尾巴”，结果车速太快，急转弯时撞在了一个竹子搭成

的路边车棚架上，车翻人摔，动弹不得。武警从男子摩托车上解下一包来不及扔掉的东西打开一看，竟是一个人头……

驾摩托车男子名叫何宏，现年42岁，上海一家电器厂驾驶员，在炒股热中，这个没有百元积蓄的“塌底棺材”，梦想发财。炒股要资本，起码2万元，这个数对何宏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到何处去搞来呢。一天，何宏有一位同事想出国急需4千美金，知道他路广朋友多，就托他帮忙，何宏当即答应，心想我先借用它炒股吧。没几天，同事送来了2.5万元人民币，何宏就把这些钱全投入股市。他以500元一股购进的“飞乐”股种几天就跌到250元一股，他傻了眼，一下蚀掉了1万多元，这可怎么办？拿什么钱去还给同事？何宏脑子里胡乱地想着：逃跑、出家、自杀、杀人……最后他选择了“杀人”。

晚上，同事上门来讨钱，何宏就把对方骗到内房，随后乘人不备用电线触死了同事。把尸体斩成碎块，尔后装进5个塑料袋，驾着一辆朋友请他保养的“幸福”牌摩托车午夜到苏州河抛尸……

12月20日，上海公安机关破获了一起因见财起意而在一家大宾馆杀人碎尸的恶性大案。凶手是某商店营业员沈明浩，因由于炒股赔了本欠了巨债，他决定铤而走险。一天他去一位从日本打工赚到几十万元回国的王姓朋友家，谎称可低价兑换到美元，要王某第二天早上，带10万元人民币在一家高级宾馆见面。翌日早上王某携带10万元赶到，沈明浩将对方带进一间客房，趁王某不备用旋凿猛击其后脑勺，击昏后再用绳子将王某勒死，掠走巨款。

巨款亏损，使小老板伤心流泪

92年的申城炒股狂热在折腾了半年之后，终于到了它的顶峰期而开始了渐渐冷却。

一位个体户酒店小老板名叫毛小明，因地段好每天顾客盈门，每月的净收入常常在4万元上下，被人称为“上海滩小霸王”酒店，他开店5年已赚了200万。申城炒股热刚刚升温时，毛小明一下购进“中纺机”、“中华”、“丰华圆珠”等6种新股，价值14万元，几个月后新股上市，他当即抛出，一下净赚50多万元。这一获利使毛小明“胃口”大开，他把酒店以30万元盘给了他的堂弟，把所有的钱全部投进股市，他成了申城百万元炒股大户之一，每天出入证券交易所电脑房，注视着彩色电视屏幕上不时变化的股价行情。从2月至5月的短短4个月中，他先后买进抛出净赚了200多万。赚了大钱后的毛小明飘飘然了。6月份，申城股市大波动，面对突如其来大滑坡，毛小明已蚀掉150万。此刻的毛小明同样也有这种心态，誓做中流砥柱，股价越跌我就越不抛。到11月底，毛小明的200万元变得只剩20万元，

他真是输了大钱又赔了店。

挪用公款炒股亏损，未成富翁却成死囚

35岁的黄炳生原系某电子有限公司的职工。今年9月，黄为炒股票在本市思南信用社开设了自己的资金帐户卡，共计存款9850.13元。11月24日，黄向思南信用社谎报帐户卡遗失，挂失后提取了所有存款，并另开设了一个帐号。之后，黄又将挂失的帐户卡上的存款数目涂改成269850.13元，随即用此卡买进和抛出电真空股票1230股、橡胶轮胎股票1.4万元，未料“亏空”3万多元，使思南信用社成为无辜受害者。

王某年龄不大，只有27岁，但是他一心想发财，当销售科经理二年，受收贿赂达2万元。1992年初，他把受贿来的2万元投入股市，2个月后净赚3.5万元。王某心里乐滋滋的，望着钱兴奋、激动。

5月的一天，王某去财务室，他见桌上放着一张安徽某原料加工厂寄来的一张40万元的付款支票，就忙往衣袋里塞。通过关系换成了现金。王某拿到这笔巨款后全部投入炒股，想以此赚一笔“百万”。他4月份投入这笔公款，9月，已蚀掉30万元。月底王某“挪用”40万元公款之事，在一次财务清理时东窗事发。

炒股热中的破裂家庭

据调查，92年上海黄浦、静安、卢湾及虹口等闹市区的离婚率比91年有所上升，其中主要因素是由于炒股引起的。下面是部分区、县法院开庭审理时，当事人的自述择录。

季晓妍（上海某纺厂会计）：“我丈夫今年4月开始炒股。他是一个不懂股市知识的中学语文教师，我劝他不要去冒这种风险，他硬是不听，结果把家里8000元赔在了炒股上。这是我们结婚6年省吃俭用的钱啊！这个该死的笨蛋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背着我向别人借了4万元继续炒股，结果蚀掉了2万多元。国庆节人家高高兴兴过节，我家却闹得不得安宁，债主上门讨债要钱……”她泣不成声。

92年12月4日法庭宣判他们离婚。

顾小花（上海丝织品漂染厂工人）：“今年6月，丈夫听人说炒股可以赚大钱，就同我商量要去炒股，既然能赚大钱，我从银行取出5000元给他，他就与人合炒，由于运气不好，在一个月里蚀掉2000多元。一天，他打开收录机听股票行情，当他听到购进的‘爱使电子’股种又跌了6个百分点时，一下暴跳起来，恶狠狠地把一架收录机砸了，还肮脏话骂个不停。我见此情景，就责



陳海汶攝

陈海汶/摄

备了他几句，他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了我几记耳光，用花瓶敲我头，把我打着浑身是血……”

出洋归来者的炒股悲喜录

在炒股狂热中，有不少出洋打工赚了大钱的归来者。有的成了百万富翁。

她，名叫郑小兰，三年前她去澳大利亚自费留学。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她就四处寻找活干，有时一天打几份工，再加上自己省吃俭用，回国手头上也有了10万元人民币。上海炒股热升腾之时，郑小兰购进5000元股票，结果一举成功，二个月净赚了1万元。初战“告捷”，郑小兰决定打一场“大战役”，她天天出入各证券交易点，看行情、探信息、作猜测，使她很快变成了一个精明懂行的炒股能手。6月份，申城股市出现了价格波动，郑小兰预感到股市大暴跌的风暴将要到来，她迅即把购进的“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等最易跌价的股种抛出，不

仅免遭损失，而且还赚了30万元。11月份，当股价跌到最低价时，她预感到股市即将要反弹，猛地购进了473元一股的“真空电子”1000多股。12月中旬，这一股种已反弹到1400多元一股，郑小兰赚了近100万元，成了申城女子炒股百万富翁。

当笔者问她是怎么成为一名炒股胜利者时，郑小兰得意地说：“抓住机遇，‘孤注一掷’，这就叫作‘用兵之计不在勇，而在谋’，方能‘百战不殆’！”

失败者名叫刘志华，三年前他东渡日本，加入了扒洋分的十万大军的行列，经过2年的“苦役”，换来了20万元的血汗钱。刘志华回沪不久，正逢股票热方兴未艾，他怦然动心，一掷千金，结果损失了15万元，把辛辛苦苦从日本赚来的血汗钱轻而易举地给“赌输”了。

在对200名出洋归来炒股者的调查中发现，只有20%的人赚了钱，60%的人赔了本。

（责任编辑：刘家驹）



□刘烈娃



「半个月亮爬上来」
的王洛宾

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国庆文艺晚会上，推出了一组优美的新疆歌舞。当主持人从观众席中请出一位神采奕奕的老人，并向大家介绍，这位80岁的老人，就是这组新疆民歌的作曲者——王洛宾。全场顿时引起一片惊愕，随之是一阵热烈真挚的掌声……

仿佛是一夜之间，王洛宾——这个命中注定着要和大起大落大荣大辱紧密相联的名字，突然红透了大陆、香港、新加坡、美国……

也是一种怪现象，很多的女作家都特别关注着这位音乐界的传奇人物。自从香港夏婕写了洛宾老人的采访报道后，心里充满着离奇古怪和罗曼蒂克幻想的台湾女作家三毛，便乘飞机一下越过海峡，直奔新疆乌鲁木齐。

素来以率真而闻名的三毛见到王老时，目不转睛，竟然天真地脱口而出：“真没想到，我小时候经常听经常唱的这些好听的歌，是人写出来的。”

“那你以为是怎么来的呢？”

“我以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三毛说罢哈哈大笑，随即又认真地说，“真的，我想这么动人的歌，一定是带着仙气的，是……，而唯独没想到它们是由一个人写出来的。所以当我从夏婕的文章中得知，这些歌是大陆新疆的一位老人写的，我就萌发了一定要见见您的念头。我一直在想：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一句秦腔救活一代乐圣

当王老在1992年中央电视台国庆文艺晚会上出现时，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那天晚上，我和班里一些同学正坐在电视机前收看这个节目。当时，同学们都很激动：

“嘿！这老头真棒嘞。”说这话的人显然对王洛宾一无所知。

“王洛宾！他还活着？！”

这话问得一点儿也不奇怪。有回我看到某“著名歌唱家”在演出

时，把王洛宾作曲的一首歌说成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我曾问过王老这是怎么回事？

王洛宾幽默地说：“他们以为我死了。”

眼下，荧光屏上那位经历过大苦大难而荣辱不惊的老人，正从容地接过主持人手中的麦克风，面对坐在荧光屏前的亿万观众吐露自己赤子般的心声：

“我个人并没有做什么，更主要还应当感谢我们的祖国有这么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应当为振兴民族文化民族音乐而努力……”

我双眼湿润，我为自己崇敬的老师感到高兴，此时此刻，我的思绪一下子跃到十年前——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所在的军区文工团院里，突然来了个相貌不凡的老军人。中等个头、黑瘦、干练，有着一张显然积淀着很深的文化却又饱经风霜的脸。文化部门的首长及乐队负责的好几个人陪着他，这儿转转那边看看。

有人在背后窃窃私语，瞧，这就是那个王洛宾，写《在那遥远的地方》的歌曲作者，还蹲过监狱呢，国民党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都蹲过呢！

他？为什么？

一个大大的问号留在我脑海，但不久也淡忘了。

两年后，我改行调到乌鲁木齐。在一切尚无着落无把握时，我曾一度心灰意冷。

也是有缘，在大街上碰到一位军报记者，他见到我当时的状况，不由分说要让我去见一个人，说这个人一定会改变我人生的价值观。

“谁？除非上帝。”

进了新疆军区歌舞团的大门。拐进一座旧楼，在漆黑的过道里摸索着向前行，不小心碰到了谁家的锅，“咣当”一声掉地上，吓出一身冷汗。一路道着歉，摸到楼梯口，方见一线光亮，上二楼敲开门，应声而

出的竟然是他，王洛宾！当时他“解放”后，出任新疆军区歌舞团艺术顾问。

初次交谈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他讲开了自己的故事，其中一个使我灵魂受到震撼。

动乱年代王洛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劳动的内容是筛沙子和石灰。由于工场内空气污浊，日久天长，王洛宾的两只鼻孔竟然全部被沙土堵塞，不能透一点气。他用一根缝衣针来戳鼻孔，终于戳出一个小洞，当他可以用鼻子呼吸时，他却同时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悲哀，这是他有生以来的一次精神崩溃。

“当时我想，我这也算个人？没有了人的尊严时，真是连狗都不如啊，不如死了好。”

于是他找来一根绳子，把它悬在工场的一根大梁上。他准备用这双天才的手来绞死天才的自己。

他把头颈慢慢地伸进那个可怖的大套环中——

“我要把牢底来——坐——穿——！”

突然，一声高亢粗犷的秦腔在工场的某个角落嘹亮且突兀地唱起。把已经将头颈伸进吊绳套环中的王洛宾吓了一跳。

音乐的力量如此神奇，竟然拯救了一个快被生活溺死的人和他的灵魂。当时的王洛宾感慨万端。王老告诉我说，唱秦腔的是劳改队一个小伙子，至今王老也说不上他的名字，他不经意的一句唱，竟救了一代乐圣的命。

当时王老想：这年轻人懂得珍惜生命，比我强，他没有被生活的重负压垮。我不能这样死，还要用我的余生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精神财富。

也许，正是从这天起，王老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也给了我许多启发和帮助。因此，后来有人问我：“你跟王老学什么？”

我脱口而出：“学做人。”

自从认识了小黑楼里的老人，我就常去看望他，偶尔赶上吃饭，王

老就去食堂打饭或者自己动手，弄一些象裤腰带般的面条，他不怎么吃肉，还念念有词：“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

最有趣的一回，是我去王老家，突然发现书桌上的断臂维纳斯石膏像用淡绿色的纱巾裹起来了。王老“表情严肃”地告诉我，团里开会宣读了文件，现在要清除精神污染……

我不是仆人，是真正主人！

尽管美国的活佛封他为“莲花落宾”，他仍然是我记忆中那个最高兴喝酒最喜欢有人请他吃西餐的王老师。

冬天，他骑车在半尺厚的冰雪地上奔跑，夏天的清晨，他从乌鲁木齐的北门一直跑步到红山顶上……

若干年后，我女儿默子过两周岁生日，我在餐厅订了一桌丰盛的西餐，请来了王老。席间，王老悄悄地、郑重其事地问我：“默子什么时候结婚？”

“早着呢，女儿才两岁。”

王老认真地说：“不早，就算她25岁结婚吧，我还要等着喝她的喜酒。”

我想，他会等在这一天的。王老是有着大海一样宽阔胸襟的真正的艺术家。

说到大海，我想起王老早年在海边的一个故事。

王洛宾8岁时，他的一个小同学的爸爸是火车上的厨师。正逢暑假时，同学要随他爸爸的火车去北戴河玩儿，并叫上了与他要好的王洛宾同去。

这是一个送欧洲旅客去避暑的专列。在当晚的消暑宴会上，少年王洛宾远远地冷眼瞧着那些醉生梦死的凹眼凸鼻金毛的“老外”们，他心里不平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中国百姓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而这些来自异邦的洋人，却毫无代价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

“busboy!”(仆人)突然，一个袒露酥胸肥胖的洋女人冲王洛宾打手式，她要添一杯饮料。

略懂一点英语的王洛宾听到洋人对他的轻侮，不禁浑身的热血涌上头顶，他捏紧拳头，冲那洋女人怒目而视：“告诉你，我不是仆人！我，是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说罢，他昂然而去。

历史总是极富戏剧性，从那以后，王洛宾再也没有去过北戴河，直到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又一个夏天，王老接到音协主办的会议通知，是研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会议。

地点：北戴河。

他去了。尽管“白了少年头”，但他却扛着满满一箱作品，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早已被选入美国一所名牌音乐学院声乐系三年级的教材中；还有他新出版的以《在那遥远的地方》而命名的英、汉文对照五线谱(配钢琴伴奏)歌曲集等等。记得王老在这本歌曲集出版前，兴奋地对我说：“国际声乐比赛，选手们都咏叹调，唱西洋歌剧插曲，现在也该让外国人唱唱中国的民歌了。”

我将这事写了一则报道：《让外国人也唱中国民歌》，发表后被《解放军报》转载在头版。王老看了非常高兴，小心地将这则报道剪下来，贴在自己的剪贴簿上。

天花板低了，跟斗翻不过去

王老终于有了一个象样的新居——新疆军区第五干休所师职楼内的一个套间。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他说很感谢党对他的关怀。

看到王老三室二厅的宽敞新居，我忆起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小黑楼里找王老，正逢他打开水回来，他脸上布满着愤怒的乌云，双手在颤抖，我从未见到过王老这样生气。

原来，王老去打开水时，他们单位的某负责人指着王老的鼻尖斥责道：“老王，现在给你落实政策，是党对你的关心，眼下住房紧张……

已经够照顾你了，你怎么把儿子媳妇都弄来住？这样影响不好嘛……”

王老气愤地对我说：“共产党除了毛泽东，国民党除了蒋介石，什么人物没见过，可还真没见过他这号的东西。”

后来，新疆军区有关领导注意到了这件事，便提出给王老调整房子。那个当初指着王老喝斥的势利眼，便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讪笑着来找王老：“王老，(而不是‘老王’)军区首长已表态要给您(而不是‘你’)调房子，这就好比多罗。”

王老仍然一本正经地对他说：“希望给我调个天花板高一点的房子。”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每天都要在床上练习翻跟斗，怕天花板低了会翻不过去。”

那人傻愣着眼，好半天都转不过神来。

王老的学生和“学生”

王老的新居实在太热闹，往日的宁静几乎见不到了。

这期间，继广东音协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王洛宾作品音乐会”之后，新加坡一个华人合唱团邀请王老一行去新加坡主办了“新疆之夜”音乐会。大陆、香港、台湾的电台电视台报社记者们又蜂拥而至……

我很少去看王老了，他太忙。

有天傍晚，我路过王老家大门口。好久不见王老，他怎么样了？

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想起了上次告辞时的不愉快。但，还是去了。

敲开王老家的门，嗨，又是满满一屋人，面孔都很陌生。王老把我领到另一间屋，拉过一位二十多岁，看上去很文静的女孩对我说：“吴淡如，台湾女作家。”然后很自豪地向淡如介绍我：“这是我最好的学生……”

素来不怎么懂得谦虚的我，这会儿却窘得红了脸。我想起那件“不

愉快的事”：有一个女孩慕名而来要找王老学唱歌，她条件差到五音不全，善良的王老还是热情地鼓励她。谁知那女孩子逢人就说王洛宾的学生，还说王老评价她的嗓子如何如何有前途。弄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议论纷纷：“王洛宾的鉴赏水平就是这样？”

我知道此事后，也在王老那儿“管了闲事”。王老说，热爱艺术的本身，就是值得鼓励的，因为它必然导致人们对美的追求，总比犯罪，总比给社会制造丑恶要强得多……。

“可是王老师，”我执拗地认真地与他辩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这么些年，您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已经耽误了您许许多多的大好时光，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您应当抓紧时间搞创作，而不应当浪费在那些狗屁不通的……”

王老的脸沉了下来，表情异常痛苦。我不敢再说了，便默默地走开，很久没见他。直到与台湾女作家吴淡如见面的那天晚上。面对这样一个坦荡的灵魂我顿时觉得自己以前对他的理解太世俗了。

更令人不悦的是，常有些莫名其妙的人随便出入王老家门，“借”走录音带和书什么的，往往就“忘了”还回来。为此，王老曾非常苦恼地对我说：“我总是记不起是谁拿了的书谁借走了录音带，照片，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说：“我帮您在墙上挂一个记事本，无论谁借了东西都要登记，还来之后就划掉。”

“可是，那个人如果把记事本也拿走了怎么办呢？”王老认真地说。

……

他真是太单纯了，而周围又太复杂了。

他和三毛的“恋情”

1992年冬天，我放寒假之前，收到王老从乌鲁木齐邮来的一封信。王老在回信中说，他在北京过完国庆回到乌鲁木齐后，访问他的人

很多：“整天应酬，接应不暇，折腾了一个多月，除去劳累，一无所得……”

王老在信中还谈到，台湾寄来旅行签证，邀他去台湾四个地区的大学讲学，他正准备启程，并说凌峰已为他安排了16天日程，那边官方电视台将采访他……

看来，这位被我女儿唤作“骆驼爷爷”的老人，又将进行他的长途跋涉了。

我匆匆看完信的大致内容，又发现在信纸的天头部位添了几笔：“友人为我筹办‘洛宾艺术馆’，目前只有一块地皮，尚无一砖一瓦，说不定落成之日，已成为‘洛宾纪念馆’。不管什么馆，总是好事。”

王老在信的结尾发挥了他固有的“洛宾式”的幽默：“我从台湾返回时，将绕道香港，途经深圳等地都将小住几天。遗憾的是你回新疆我可能不在家，从文学的角度看，怀念应当比见面好。”

我的同学突然跟我谈起一件事：“我女儿是个‘三毛迷’，凡是有关三毛的文章她都收集，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连载关于王洛宾和三毛恋情的文章，我就都剪下来邮给女儿……”。

我愣愣地看着她。

关于所谓“恋情”一文，我隐约在哪个刊物上翻到过，没仔细看，因为那文章中的大致情节前后过程我是很清楚的。不能否认，王老和三毛之间有一种超越一般朋友的特殊友情，但如果说成“恋情”，我以为主要是一种艺术上的默契。

对于这件事，无非就是拿名人之间的轶事来哗众取宠罢了。至于三毛本人心思，现在死无对证，完全可以设想可以理解，三毛的浪漫纯情对认准的事十分投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她浪迹天涯无拘无束的特殊经历和她与众不同的个性，都极有可能造成她在见到王老这样一位对于她来说很“神秘”的人物时，会突然产生一种感情上强烈的

震动，这里面包含着敬仰崇拜和热爱之心。爱，本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东西，经过长时期艰难跋涉，带着全身心的疲惫，加上痛失荷西后给三毛精神上的沉重打击，使她在恍惚迷离的状态中，很可能会突然觉得，居住在距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不远的王洛宾，是撒哈拉大沙漠幻象的再现，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二源泉。这是不足为奇的。

王老曾经跟我谈及三毛时，平静地说：“她才40多岁，应当找个疼她理解她能和她携手共进的好丈夫，幸福地度过一生……”

王老说这话时的口气，完全象一位慈祥的父亲在安排设计女儿的婚事。

因此，当后来三毛来信谈到自己已经选择了佳婿，并准备出国完婚的消息时，王老是那样由衷地为她高兴。

可是后来突然传来三毛自杀的噩耗，王老震惊悲恸得说不出话来，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不出门，我见到他时，他连连摇头，沉痛不已地说：“可惜了可惜，太可惜了！这么有才华的女子……”

我仍然强调，无论对于三毛或是王洛宾，都是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介他们。

用三毛母亲的话来说：“三毛已经死了，希望不要再惊扰她的魂魄。”

而作为王老的学生，我也同样由衷地希望——不要吵他！给他一些、尽量多给他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日子。

王老的大半生，几乎都是从孤寂中熬过来的，他果真是一个不完整的月亮么？

半个月亮是真的爬上来了，并且是那样的清澈、宁静、默默地给大地洒下银辉，但他决不孤独。“音乐无国界”。听得懂王老创作的音乐的人，就会读得懂他的心声。

（责任编辑：老弘）

访

台

小

记

王洛宾

烈娃：

我9月12日才返回新疆，家中有33封信在等我，回来后电台、电视台、各报记者，对我进行包围战，虽然幸福，但身体的疲劳，和痛苦的折磨效果是一样的，从昨天起开始回信，简单写给你一些访台见闻：

①台湾的友人用了三天为我出版了一部「王洛宾回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的回忆录，自己边唱边述说，共四个小时。

一般回忆录，大多是一个人的生平总结。我告诉记者们，这部回忆录是第一部，回大陆后接着创造第二部。九月间上海音乐学院将为我举办个人作品音乐会，并赠予我荣誉教授名衔，我想拿这个音乐会，作回忆录第二部的开头。

②我在台湾大力宣扬我中华民族传统的音乐文化，鼓励台湾同胞加强民族自尊，克服民族自卑，除九所大学之外，还有社会团体讲学共5次，效果很好。后来又为全台的中小学音乐教师集中在三个地方，讲学3次。台湾的友人开玩笑说：王洛宾的歌在海峡两岸，已经作了渗透性的统一。

③因为在电视上多次出现，台北的观众对我很熟悉。有一次坐出租车到家用司机说：「王先生，我认识你，我不要你给钱！」还有一次人们请我吃饭，友人对小姐说：「这个菜不是我们吃的，可能是送错了！」小姐回答：「没错，是我们经理送给王老先生的！」

有一次朋友送给我几千块钱！我浑身上下只有裤子

后边的一个口袋，便把钱装在后边口袋走在行人道上，一位同胞在后边喊了起来：「王先生，你的钱露在外边了！」

④在台北公园漫步，遇到一位30多岁的退伍军人，满头白发，身体特别健壮。闲谈中知道他曾在山西中部打过日本，后来腹部受伤，转到河南后方医院。我当时回忆，在30年初春，我与西战团的战友，正在潼关与风陵渡之间搬运伤兵，说不定我曾经背过他呢！刹那的想法，使自己写出来一首诗《两岸》：

五十年前

我曾在黄河两岸搬运伤员，

头上敌机轰炸，

脚下黄涛凶险，

日以继夜，

从来未感到什么「两岸」！

× × × ×

五十年后

我漫步台北公园，

与一位老人谈天，

得知他在山西负伤退下火线，

我猛然想起，

说不定我曾背过他爬上渡船！

望着海峡，

心中更没有什么「两岸」。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厦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除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黄秋志首理会单
炎春杂志社届事名

特区人的衣 食住行

□张正隆





建筑学家称建筑为人的第二服饰。

深圳人的第二服饰雄伟、壮观，气度恢弘。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字型 and “腰鼓”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瞅着令人眼晕。与深圳的都市气派相比，珠海则多为低层和多层建筑，依海湾，就山势，错落有致，掩映在绿树中的乳白色、米黄色墙体和金黄色的琉璃瓦，衬着如茵草坪，分外迷人。全国各地都在建花园式城市，珠海当为中国第一座花园城。相形之下，海口的多层、高层建筑，就象插在那破房烂屋堆里。海甸岛有处颇华丽的别墅区，那幢幢楼前挤挤匝匝，有的还没有北方农家小院大，虽让人感到惜地如金，却又实在是把那土地和金钱糟塌了。

笔者采写中国房地产业长篇报告文学，南下北上，所到之处，不能不留意这人的第二服饰。但这里要写的，还是特区人的第一服饰。

特区年轻，特区人也年轻。深圳人尤其年轻，街头难得见到60岁左右的人。有资料说这座人类最年轻的移民城，人均只有25.5岁。按说，年轻人爱打扮，特区人又有钱，就更应该打扮。实际却不然，起码大多数人不那么刻意地追求服饰的高档。特区中最富的深圳人好象更随便些，只是那风度、气质也更属上乘。在这方面海口又相形见绌了。像一些不协调的建筑一样，街头常见穿着脏兮兮的中老年人，光着晒得乌黑的膀子的汉子，与一些人的服饰形成强烈反差。

深圳一家有几亿资产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一辆“宝马”挂着深圳和香港两种牌子，一套西服也颇高档。他的助理却告诉我，这位经理经常穿的一条衬裤，是打了补丁的。

如果说这位眼看60岁的经理

不无一声“本色意识”，那么对大多数特区人来说则是因为忙。特区人时间观念特强。时间就是金钱。他们舍不得在修饰打扮上花费时间。

特区人的服饰，要在灯光下才能看得真切。特区的夜红火热烈，酒楼饭店一片辉煌。一些白天平淡无奇的先生、小姐，这时就衣冠楚楚、光彩照人地出动了。谈恋爱，会情人，自然不敢怠慢，这一点天下一般无二。谈生意是要全力以赴的，服饰当然含糊不得，修饰打扮完全必要，这就有了一种商业价值和目的。而那些海内外知名的特区企业家，穿一套皮尔·卡丹什么的，更多的是出于对对方的一种尊重。



“食在广州”。广州人吃得悍，吃得生猛，吃遍海陆空，连毒蛇、老鼠都成了桌上佳肴，那气概令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被鲁迅称为英雄的人也自叹弗如。广州人又吃得文雅，吃得精明，吃得赏心悦目，绝少狼吞虎咽之徒，更不扯着人家耳朵劝酒，无论公款，还是自费，吃剩的“海陆空”都要“打包”（即用饭盒装起来）带回家去。但是，如果仅此而已，那么食文化美誉天下的广东人就是天下第一馋鬼和败家子，就得继续偷渡香港，或是卷铺盖下南洋，或是涌进内地打工了。

中国人讲“吃透政策”，“吃透精神”。广东人也这么讲，讲了几十年。只是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人就不再咬文嚼字，搞精神会餐了，而是把吃变成做，做就是吃，把精神吃成物质。他们吃透了改革开放这个大政策，由此而生的各种精神，也就吃得从容，吃得滋润，吃得津津有味了。

“广东人什么东西都敢吃，上海人什么衣服都敢穿，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讲，东北人什么架都敢打。”“广

东靠南洋，福建靠老蒋，北京靠中央，辽宁靠思想。”“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无论这些民间顺口溜真实性有多少，都不是无中生有。当年其貌不扬的广东愈来愈引人注目，那魅力也不是用嘴巴硬抹上去的金身。而能够说明这一切的缘由的，当是广东人“吃政策”的一句话：“见了绿灯快步走，见了红灯绕着走”——不管怎么着，反正我得走，千方百计往前走，坚韧不拔往前走，不停地走，还不“闯红灯”。

广东人和特区人的生意，很多是在餐桌上谈成的。与广州同一种粤味的特区酒楼饭店，每天的黄金时间是从路灯齐明之后开始的。酒楼饭店档次越高持续时间越长，有的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有的直至天明。白天，特别是星期天，爆满的则是中低档酒楼饭店。大都是一家3口占据一个小餐桌，一壶八宝，或是乌龙，几碟凤爪、虾饺之类小吃悠悠游哉吃上一、两个小时。掏出一张票子“买单”（即算帐）走人。食客中很少见到一张张数10元票子的。

特区食文化印象最深的是“打包”。初来乍到，主人宴请，菜肴显然比其它餐桌丰盛得多，那甲鱼汤连干带稀剩有一半。

第一顿饭就见食客在“买单”的同时，凡有吃剩饭菜都让服务小姐“打包”。第二顿犹豫再三，终于把话说了出来。我还担心是否冒昧，主人根本没当回事儿，立即嘱咐服务小姐“打包”。

后来越过长城到某地采访，那餐桌上几乎每次都宝塔样叠着3、4层，剩一多半也没人“打包”。粗犷的北方人实在让我这个穷人家的孩子感动，又实在让我心痛，可我却再也说不出“打包”来了。

北方人那餐桌则好象被一个“酒”字复盖了，不喝足喝够，甚至不喝倒两个，就没尽到地主情谊。南方人吃完了，谈完了，如果再没生意可谈了，彼此就象那餐巾纸一样扔

一边去了。

北方人的情份则象那酒一样，比南方人浓烈得多了。

采访前，建设部已与各地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所到之处吃、住和旅费均由被采访单位解决。房地产业司一位处长摇着头，说有的地区恐怕做不到。

这话在海口应验了。海口热得象个大火炉，某部门一位领导人那脸就象冰箱冷冻室内壁，说他们忙，没空接待，这儿也没这规矩。我拿出建设部介绍信和一位副部长的有关批示，这位领导人无可奈何地让人把我送到省房地产业协会。房协很热情，他们属民间团体，能力有限，连我离开海口的机票也买不到，只是每天中午陪我吃顿饭。

在海口那7天里，共花掉29元钱买28个面包和两节甘蔗。面包一元一个，早晚各两个。甘蔗每节5角，采访归来不敢“打的”，嗓子冒烟，买一节嚼着。

在深圳27天，吃住都由公司包了，让我感动。

到珠海是采访哪家公司，吃住就由哪家公司管。有家公司让我换口味，一天换3家饭店。有家公司经理原是《珠海》文学主编，驾着“公爵王”请我到珠海最豪华的银都大酒店撮了一顿，撮得我目瞪口呆，心头直发毛。

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

后来，有海口人告诉我，海口“两记（妓）最臭”：妓女晚上掏钱，记者光天化日之下就掏，有的定篇“萝卜条”、“豆腐块”，也狮子大开口，跟人家要“赞助”。

我好象有些理解那位“冰箱脸”的领导人了。

于是，从海口始，每到一地，我就象录音机一样先放一遍：我们写这本书，不收费，不要赞助，只是采访一下，耽误你们一些时间。当然，时间也是金钱……



从广州乘73次列车到深圳是4点半左右。广州政府机关6点下班，没想到深圳是5点半。5点35分赶到市规划国土局，那门上贴张纸条：“北京来的客人，请先住下明天再联系。”

定定神，看看太阳分清东南西北，就提着那只鼓囊囊的旅行包去找住处。

跑了近一个小时，找到一家宾馆，3人房间有张空床：40元。

按城市人口比例，深圳旅馆之多为中国之最。可后来住在长城公司招待所那20多天里，几乎每天都有满怀热望找上门来又怏怏离去的旅客。不知道这些人那疲惫的身躯最终安放何处，只知道每3个深圳人中，就有将近两个为暂住人口。

住宿难，住房也难。

深圳从七十年代末一个贫穷的边陲小镇，变成举世瞩目的现代化城市，深圳人第二服饰的巨变当然也包括住房。从1983年起，深圳住房竣工面积平均每年递增37.74%，缺房户却由1983年的5千户上升到1987年的2.2万户。是人口增长过快吗？调查表明同期人口平均每年增长为31.24%，低于同期住房增长率。

问题出在旧的住房体制上。

中国人攒钱干什么？娶媳妇。乡下人娶媳妇首先得有房子，没房子那媳妇往哪里娶？乡下人愁的是盖房，盖一幢房子何时才能攒够这笔钱。城里人愁的是分房，是什么时候才能分到房子，这辈子还能不能分到房子。城里人那房子大都是单位分的，依据是你的工龄、职务、家庭人口、老少几辈，当然也包括和领导关系如何，以及是否送礼，送礼多少等等因素。

年轻的深圳开头走着的也是福

利型住房的老路，建房越多背的包袱越重。但是，如果深圳就这么走下去，那深圳就不成其为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深圳了。

1988年6月10日，以“售房为主”的深圳房改方案出台。

衣分五色，食分九等，什么人住什么房子也是自古就有规矩的。可现在深圳人无论职务高低，在住房上都是70平方米的标准面积。每超过一平方米就要加总价的1%，最大加幅为30%。反之，如果不足70平方米，就相应地减价。特区人见面交流最多的信息，第一是股票，第二就是这特区人的第一商品的第二服饰。谁买房了，在什么位置，多少钱等等。

从深圳到蛇口，沿途塔吊耸立，推土机轰鸣，就象个大工地。珠海西区更是气势非凡。海口很多地段不通车，到处都在拓宽马路，改造老城。丽日蓝天下，南国潮润的红土波浪般翻涌，与未开垦的和人工的绿地互相映衬，呈现出无限的活力和生机。

站在珠海湾仔海滨，却又不能不感到一种压抑。一水之隔，也就300米左右的对面，就是澳门。那边楼厦高耸，鳞次栉比，这边连多层建筑也少见，土地大都裸露着。没错，这脚下海滨很快将矗起一座珠海市最大的涉外住宅区，其规模和气势都将超过对面的世界。可既是“涉外”，那居者当然就是对面那个世界的阔佬了。望着工地上大都穿着与我差不多的老式国防绿军装的民工，烈日下一个个汗淋淋地劳作，耳边就不由响起《洪湖赤卫队》插曲《小曲好唱口难开》中的“月儿弯弯照高楼，高楼本是穷人修……”我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有利。问问这些一会儿就得到那水桶边咕咚咕咚灌上半舀子水的民工，就能得出这结论。不然，他们不会背井离乡到这里打工。这脑筋是该换了。可几十年受到的教育，却不能不伴着这歌声，从那历史深处

冒出来。

没想到刚找到住处，却有人主动要上门“服务”了。

10点多钟，我正在写日记，桌上电话响了。我抓起话筒，漫不经心地“喂”了一声，那边立即道：“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服务吗？”

一口带点不咸不淡的粤味的普通话，绝对文雅而又温柔的女声。

我有点懵。这是跟谁说话，服务什么？我突然意识到了这是什么意思，拿话筒的手一下子僵住了。瞬间功夫，啪地把电话按在机座上，四下瞅瞅，心头怦怦疾跳。

早就听说南方和特区有这种“服务”，就有些忐忑。到广州头几天是注意了，却什么事也没有，招待所那大铁门11点就从里面锁上了。夜里被敲醒过两次，都是带着电棍的保安人员查夜。就觉得有些人夸大其词，没想到刚到深圳就碰上了。后来又听说这种“服务”，有些还与旅馆有联系，有的就是那服务小姐，就更胆怯。一路上连个伴儿也没有，单人独屋的，若是半夜三更开门进来，我这“帝国小军官”讲得清楚吗？再到一地，进屋就先看那门上有无插销。如果没有，就不踏实，有时临睡前就把那沙发、茶几顶在门上。

可我总是忘不了那文雅而又温柔的声音。很多中外名著都是描写这类风尘女子的，写得那么美，甚至那么贞节。这位小姐是什么样儿？她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我甚至有点后悔，当时竟那么紧张，没能谈上几句。



在广州，某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用广东人讲是个“很醒目”的中年人，他驾着“蓝鸟”带我去工地采访。车座旁敞开的公文包里，一台黑

色“大哥大”发出呼叫信号。他一手扶着方向盘，让“蓝鸟”在车流中轻盈地飘游着，一手抓着“大哥大”与对方通话。

在深圳和珠海，这种情形见得就更多了。

对于穿着打扮越来越漂亮，食文化越来越讲究的中国人，下一个消费热点无疑是住房。无论个人收入，还是道路交通，除了屈指可数的明星大款，一车一人只能是国产和外国影视上的事，生活中的我们只能继续是自行车大国。可在特区，现实却好象一下子就把我拉进了那遥远的影视中。

商场就是战场，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就是金钱。深圳某部队房地产公司，得知中山市某开发区要推出几十幢别墅。公司副总经理当即驾着三菱吉普赶去，水陆120公里，不到两小时赶到，两小时成交。公司开发部长告诉我，这笔生意至少可赚1800万元。

试想，如果得到消息后，再把司机从家里或是什么地方呼来，那要耽误多少时间？晚几分钟，生意可能就被别人抢去了。而且，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多一个司机又要增加多少开支？

有人说：自己开车，随心所欲，少一双眼睛看着。

上海满街桑塔纳。深圳和珠海到处都是进口车，一辆比一辆高档，连奥迪都少见。出租车也是。

我不大喜欢用近几年挺走俏的“潇洒”这两个字。可看着那些一手方向盘，一手“大哥大”的经理，和骑着簇新摩托在漂亮的柏油路或水泥路上飞驰的男女，却只能想到这两个字。

因为我实在潇洒不起来。

从北京到广州的机票，是我的责任编辑给买的。每到一地，都是自己找上门去。在深圳就晚5分钟，人家就不等你，从深圳到海口，在长途

汽车上颠了20多小时，一夜没阖眼，颠过琼州海峡，见到的一副“冰箱脸”，又是什么滋味儿？

临去珠海前就请人在深圳预订海口机票，没买到，就坐长途汽车走人。从海口到上海的机票，省房协无能为力。走投无路中，我这位中校军官，就想起了“亲人解放军”。找到海南军区。

接电话的是位干事，姓邓，说：你叫张正隆？有本书叫《××××》，是你写的吧？我说是的。他叫起来：哎呀，我去看你！又道：机票我给你想办法。这位邓干事当天找了几个个人都不行，后来找到我的一对东北老乡，这对老乡竭尽全力，终于使我能飞上海。

海口机场要收机场扩建费，北京是20元。从深圳到深圳机场打的要30元。当时，身上只剩下一餐饭钱了。好在深圳和珠海采访，有公司送我几条三五烟，到海口时还剩两条。当时一算帐，只有把这两条烟变成货币，才能对付到上海。

门前摊点主人是个当地中年汉子。他掂掂那两条烟，打量我一眼，就去撕那透明的包装纸。我说撕掉了你就不能成条卖了。他又打量我一眼，我忽地明白了他的意思。到了这份儿上，本来已经尴尬透了，这时浑身热血就冲到太阳穴上。我抓过那两条烟：告诉你，我这烟没假，你想侮辱我不行，不行！……他也不答话，慢悠悠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50元票子。见我不接，倾着身子把票子塞进我的衣兜里，顺手把那烟拽了过去。

我永远记得那两条烟被扔到柜台下边什么东西里面的那两声响。

过去就听《请到天涯海角来》，到海口第一天就听到这支歌。歌唱得好，这天涯海角的宝岛也真美。如果囊中羞涩能来吗？

（责任编辑：刘家驹）

吴祖光答 国 贸 商 场 书



1992年6月初，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偶然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看到一篇《红颜一怒为自尊》的报道，于是他写了一篇杂文：《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这本来说是正常的事情，却引来了长达一年多的一风波，从吴祖光接到「传票」至今，已有一年时间，这场官司怎么了，请看吴祖光先生最近的答复……

1992年12月,北京朝阳区法院受理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控诉我“侵害名誉权”一案,无论就国家、社会及我个人说来都是一桩区区小事,但这件小事却首先轰动港、澳、台,继而北京,乃至全中国、全世界,至今已历时十一个月,仍是世人议论的话题。究其原因,无非是由于“国贸”属下的惠康超级市场在肆意侮辱两位年轻的女顾客,经女顾客控告历时约近一年之后,向原告赔礼道歉又自动罚款,求得原告的“撤诉”;而立即向根据报载事实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了几句公道话的作者提出所谓“侵害名誉权”的诉讼。于是被两位女顾客控诉的被告立即转为控告文章作者吴祖光的原告,而且这个法院立即受理。令人费解的是,受理之后却又迟迟疑疑、拖拖拉拉,拖了十一个月之久,至今不敢开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5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查的案件应当在立案日起六个月内审结。”而此案案情简单明了,是非昭昭在人耳目,毫无复杂情况,更无须调查研究。何以拖延至今,引起举世舆论的困惑,成为我国法制不正常现象的又一次大暴露。

案发以来,关于“国贸告吴”一案,引起舆论界对国贸的批评,至今约近一年。在众多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报道、批评的文章已经无法统计。今年三月上旬北京华艺出版社编印的《谁能打赢这场官司》搜集的报道约五十篇。如今又过了七个月,从国内外各个角落寄给我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材料已经超过上述的几倍。记得在《谁能打赢这场官司》出版后,曾经有一位读者问过我:“为什么收集的文章都是支持你吴祖光的?”问题正在这里,我也觉得,任何引起争论的问题都应当是针锋相对,一面倒确实没有意思。然而由于“国贸控吴”一案实在欺人太甚,从而引起公愤;因此很难找到一篇同情国贸的文章,这的确令人失望。但是其中的一篇题为《慎遣“冲”词上笔端》的文章对吴提出用语过激的批评,虽然此文立即受到几篇文章的反驳;不过这总算有点为国贸表示同情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了。

现在局面终于打开了,在九月份出版的《时代潮》月刊上出现了一篇题为《我们把自己交给法律》的文章。这是此案发生以来,在全世界口诛笔伐声中,唯一的一篇为国贸全力辩护的大文章,真是难能可贵。

可怜可笑的是:这篇唯一为国贸辩护的文章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的董事长孙锁昌先生自己写的。

文章开始声势浩大,首先夸豪夸富,表明国贸是大规模的“近四千个工作人员的大型合资企业,而且是1992年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但是怎么偏偏由于非法搜查顾客而被控告,终于认错、赔礼、认罚,亦在1992年。这个“先进单位”是怎样评上的,不是值得思考吗?

前面提到一篇责备我遣词用语过激的文章《慎遣

“冲”词上笔端》,作者王乾荣引用了鲁迅的“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名言。我倒想问问:我的文章是属于“辱骂和恐吓”吗?我所用的比较尖锐和激动的文字是你们惠康超级市场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引起我的愤怒的。虽然国贸对这一些表现自己总是避而不谈或者遮遮掩掩,但在这里不得不再提一次:

国贸业务发展部总监鍾华女士对记者说:“……惠康超级市场是北京唯一允许顾客带包进入的自选市场,这样作的目的是方便顾客,尤其是外国顾客,减少他们存包取包的麻烦……”我是依据这位女士把顾客分成两个等级,即外国顾客是高级顾客,当然中国顾客属于低级。这才指出这是“洋奴意识”的表现的。

此外,是国贸中心所属的惠康超级市场的两名男服务员诬赖青年女顾客的一系列粗暴行为,以及在搜查一无所获之后,一群男女工作人员在一旁看热闹时的表现;其恶劣程度,都是使人难以容忍的。国贸能以行动侮辱欺凌顾客,难道批评他们几句就算违法了吗?受理国贸控我一案的××区法院一位负责人居然发表言论《别用侮辱诽谤性语言》;依我看,首先应当是严惩侮辱和诽谤的行为。诬赖和侮辱了顾客,还要别人说好话,这是什么逻辑?

孙锁昌写文章说我的言词“愈加激烈”,列举了许多条款,计有:不知好歹,骄横狂妄,阴险过份,恶霸面孔。说律师不明事理、颠倒是非、无理取闹、欺软怕硬、豪门恶奴、编造伪证……

先说说“豪门恶奴”吧,一点不错,这个豪门恶奴我指的就是国贸的“委托代理人”律师韩小京。很多报纸都登载过他对记者说的一段话,他说:“到目前为止,前一案(指倪培璐、王颖控告国贸中心惠康超级市场侵害名誉权一案)在法律上并没有个说法。原告之一在法庭询问时许多问题无法自圆,水平极差。不然,怎么2000元就撤诉了?国贸有的是钱,给一万两万不算什么,可是2000元就打发了,你说这两个原告什么水平?”

“国贸有的是钱”,是谁的钱?难道不是国家的钱、人民的钱吗?是你韩小京的钱吗?还“一万两万不在乎”,这不是恶奴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此外,韩小京还说:“前一案在法律上并没有个说法。”又是在编造谎言。今年三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一期上全文刊载了《倪培璐、王颖诉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侵害名誉权纠纷案》明确指出:“被告的工作人员是在工作岗位上履行被告为其规定的职责时对二原告实施侵权行为的。因此,其侵权民事责任应由被告承担。”韩小京的“没有个说法”不是对法院的公然歪曲又是什么?

我批评国贸“编造伪证”是有事实根据的。1992年12月26日我在北京昆仑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国贸

中心立即作出反应，亦订在同日同时在本中心开记者招待会，并且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其中属于国贸编造的文件有：《倪培璐、王颖“名誉权案”始末》、《证词》、《询问笔录》、《吴祖光侵害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名誉权案起因》。

其中煞费苦心编造的是事件发生时的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强调市场人员的文明礼貌。根据倪培璐和王颖的申述：她俩被惠康超级市场的两名服务员从街上追回市场，一直到进入被搜身的仓库时，是被这两个男人推进仓库的。但在“始末”中两次强调是两个男人在前面走，两个女孩在后面跟进仓库。另一点是两个顾客指出被搜身处乃是仓库，但国贸强调说不是仓库而是办公室。由于这个所谓办公室没有桌子，因此《证词》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离奇文字：

“……高个子女孩气愤地把书包扔在 OFFICE 外面的桌子上说：“你们看吧！”……”

“书包扔在 OFFICE 外面的桌子上”是怎么个扔法？女孩怎么知道外边有桌子？桌子在什么地方？书包扔出了 OFFICE，难道会转弯落在桌子上？难道女孩会变魔术或有“杂技团”的特殊技巧？瞎编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太离谱了！

此外，在述及服务员的对话时，把服务员描写的彬彬有礼，说：“小姐，你不要这样，我们没有权力搜身。”“又听到付斌对她们连声道歉。”

假如真是这样文明礼貌，原告倪小姐为什么“哭了”？甚至去法院控告国贸？最后这个庞然大物的国贸又为什么承认错误，陪礼道歉，主动罚款？最后还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费用”一贯是败诉一方负担的，这是“法律常识”吧？

在办公室、仓库的问题上，国贸在编造文件上费尽心机，反复不休地说明乃是办公室，不是仓库。不惜编出上述书包扔在门外桌子上的神话或昏话。后来在某报记者实地采访现场时，被记者看见“仓库重地闲人免进”字样时，工作人员慌忙解释说：“这是刚贴上去的。”记者刚走开一下，马上又匆匆把字样揭下来，可偏偏又被记者回来看见。伪造现场，丑态百出。真丢尽了你这“集饭店、会议室、写字楼、公寓、商场、展览厅为一体，工作人员近四千人”的大型合资企业，开业两年多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效益并被评为 1992 年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脸。

当然，你孙董事长亦不得不承认“再先进的企业也会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在管理和服务中出现某种失误，像惠康超级市场的员工在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那样……”但是你这个作领导的董事长是怎样对待这种“失误”的呢？你指挥你的部下一再地采取伪造事实、掩饰失误的方法。对于所犯错误不是认真听取批评，面对错误，改正错误；而是说假话，作伪证，甚至倚权仗

势，打击报复。这就难怪激怒了群众，引起舆论界如此强烈的反感。你说什么“吴祖光通过各种渠道，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我有什么渠道？你装什么胡涂？这些“渠道”全是你国贸给我招引来的，十一个月以来，中外记者、识与不识的访客，始终没有间断过；甚至接到境外的电话通知，有一个已经组织好的律师团要来北京帮我打官司而被我婉言谢绝了。你还说我发表文章，其实我此前只不过发表过两篇文章，一是年前发表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的第一篇依据该报报道的《红颜一怒为自尊》而批评惠康超级市场的《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二是被国贸控告成为被告之后在《时代潮》发表的文章《一个“被告”的回答》，仅此而已。至于各方记者的采访，我自然是有问必答；这十一个月以来我的大多数时间几乎全被这一案引起的访问所占据；长期打乱我的生活规律，大大影响了我的正常工作和写作，而这全是你“国贸”造成的。

孙锁昌这位董事长花费心机，为我讲授了许多“法律知识”，十分感激。但这些“知识”，亦叫“常识”，显然是你那位蹩脚律师所提供或者代笔的。譬如那句人们都引为笑谈的“我们有选择被告的权利”；事情是韩小京律师指出我那篇《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文是依据报载的“不实报导”而写的。记者问他：“那就该控告那个‘不实报导’的报纸”。韩小京被问住了，停顿了一下，才编出了“我们有选择被告的权利”。这个尽人皆知的荒谬胡扯也要你贵董事长煞费心机地去找寻什么法律根据，哓哓辩解，实在太不像话了。

至于你所说对我的起诉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利用正当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张某骂了李某，张向李道歉并承认错误。为此王某便可以大骂张，侮辱张的人格吗？这一浅显的道理恐怕无人不解吧”。显然，这里的张某是国贸，李某是倪、王二位小姐，王某自然是吴祖光了。但是你张某只是仅仅骂了李某吗？你所描绘的张某何其文明礼貌！王某又是怎样“大骂”张的？这个比拟不伦不类，不知所云。看来又是你那蹩脚律师的手笔。

我实在没有耐性、亦不愿花费精力再和你说什么了。由于你董事长反复向我宣讲“法律常识”，我只向你提一个最明显亦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即是关于惠康自选市场在店堂墙上张挂的那条《本公司保留在收银处查阅带进本店各类袋之权利》的告示。这是你们违法乱纪搜查、侮辱顾客导致控告；你们终于赔礼、道歉、赔款因而声名狼藉的主要起因。这个违法的店堂告示于事发之后，引起有关主管各部门的严重关切。见于报载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商业部发言人、经贸部条法司、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中国政法大学教研室、中国消费者协会、北京市商业委员会、北京市公安局等等主管单位都曾发表声明或谈话，认为

国贸所属的惠康超级市场的告示是公然违反法律的无效告示。甚至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大会并通过电视亦宣布了国贸的违法。然而这个惠康超级市场至今公然张挂这项违法告示。国贸业务总监鍾华女士甚至回答记者说：“经过反复讨论，结论是仍坚持此制度”。就是说，坚持侵犯人权，坚持违法，决不更改。

任何人都可以设想：任何一家商店，经过这些主管部门的批示和干预，早就会把这样的非法告示乖乖地取下来了。是什么原因使国贸这样蛮横强硬、目无法纪？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倚权仗势。而这位董事长居然把他这篇辩解文章的标题称为《我们把自己交给法律》，你眼中哪有半点法律？亏你说得出口！

蛮不讲理，公然坚持错误，达到国贸领导这样程度的，看来难找到第二个了。这不由使我联想到你这样的作风会给你那四千人的庞大队伍做出什么榜样？就难怪你那惠康超级市场会发生这样欺凌侮辱顾客的事件。报载记者采访过惠康市场的几位工作人员，他们告诉记者曾经搜查过像倪、王小姐那样的一百多位顾客，而且这些顾客大都哭过。多少“上帝”曾经遭受这样的侮辱？他们将终生难忘这样的耻辱，假如这些受害者联合起来和你们算总帐的话，你们受得了吗？因此可以理解在缺少法制观念、不知如何保卫自己的中国人当中，倪、王二女士实在是难得的反抗者，这是何等可贵的现象。他们勇敢地奋起保卫自己的权利，创出共和国第一例“民告官商”取得胜利的光辉案件。这充分说明二女士之所为即使对国贸说来亦是一个改进错误作风的开端。

我必须再说一次，无论是一个人或是一个单位，名誉好坏都是自身造成的。惠康市场成立以来，在领导错误规定下“实施侵权行为”（见前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侮辱过这么众多的顾客，这种恶劣影响只有在公开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之后才能恢复名声，争得荣誉。照现在这样的表现：以承认错误为耻，坚持错误为荣，

那就只能越搞越丑，越描越黑。我是以忌恶如仇的心情写我的头一篇文章《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孙锁昌先生至今在文过饰非，自己显然违法乱纪而侈谈“我们把自己交给法律”，你是在践踏法律、戏弄法律啊！

另外要说的是，孙董事长多次批评我不懂法律。我确实有一项不懂法律的表现，而你偏偏没有发现。那就是在我写的那一篇《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文中，我认为惠康市场的错误只在于诬赖、侮辱和误搜了顾客，因此我只是批评了他们表现出来的野蛮无礼；而我却不知道，这种搜查的规定本身就是违法的，就是：“实施侵权行为”。此外，还听说惠康超级市场曾对外宣称他们的搜查包袋的规定，是来自他们在香港的惠康超级市场总店的规定。我在这里说一句，香港的惠康根本没有这个规定，从来没有过。他们又在说谎。

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不得不写这篇回答孙锁昌的文章，我是深深感觉痛苦的。痛苦在于在改革开放声中，我们国家大好企业就交给这样低水平的人物去领导。像这样本来非常简单的小事只由于领导的低能，才弄得小事变成大事，闹得举世皆知，引起公愤。说到底还是“高档次，低素质”的问题。重要的仍是要提高文化，才能通情达理，明辨是非；不然这样一桩小事，何至于闹到全世界？太难为情！太替中国丢人了！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是我们中国千百年封建制度形成的丑恶陋习，是与现代文明决不能相容的一大弊端，是全国十一亿多人民决不容许的肮脏现象。如今从全国最大的合资企业国贸中心爆发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性典型性的事件，我深深觉得坏事会因而变成好事，关键在于国贸应当首先承认错误，和广大的顾客携起手来，振臂一呼，举国风从，以此为契机，以此带动全国，彻底消灭这种肮脏丑陋的现象，使国贸真正成为人民信赖，国际上光辉夺目的国贸。

1993年10月18日

邮购启事

本刊创办两年来，所刊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华龄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将其中的部分精采篇什汇编成《高层纪实》一书，分上下两卷，计20余万字，已于最近出版。所收文章史料翔实，文字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收藏价值，凡欲邮购此书的读者可写信给我社发行部办理邮购。每卷3.20元，一套6.40元，另加收邮费百分之十。邮购10套以上者免收邮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邮编：100802

联系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郭小姐 电话：6016633-227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静文

唐太宗是历史上少见的一位明君，不仅能求谏纳谏而且能用人。他认为：“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且“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公元647年，有一次，唐太宗与群臣谈到他功成业就的原因时说：“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部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魏征原为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常劝李建成早除弟弟秦王李世民。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霸后，李世民问魏征：“汝何为离间我兄弟？”

旁边的人为魏征捏了一把汗，魏征却泰然回答：“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

李世民听完之后，不仅没有杀他，而且因为素知魏征的才干，反而“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后又将李建成的手下王 等人，同召引为谏议大夫，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辅佐唐太宗功成业就的良臣。

早在李世民当皇帝之前，“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阳，上使贵妃等数人诣洛阳选阅隋宫人及收府库珍物。贵妃等私从世民求宝货及为亲属求官。世民曰：‘货皆已籍奏，官当授贤才有功者’，皆不许，由是益怨。”后来他父亲唐高宗李渊亲自出来“开后门”，李世民都不许，李渊生气地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

所教，非复昔日也。”唐高祖的贬词，贵妃们的怨恨，正好说明唐太宗办事公道，为人正派。

唐太宗反对任人唯亲，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唐太宗曾被封为秦王，即位后，原秦王府中一些未被升迁的旧官属便发出怨言。他对群臣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的儿子刺史赵节，参与太子李承乾的未遂政变，罪当死，有不少人为之说情，唐太宗也不赦免。事后，他到长广公主府邸，对她说：“赏不避仇讎，罪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

公元626年，李世民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并对群臣讲，如果勋赏不当的，可以“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其中淮安王尤其不服，淮安王是李渊的弟弟，唐太宗的叔叔，曾有恩于李世民。李世民对淮安王讲：“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倡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闥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听完唐太宗这段话后，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大家都没有意见了。

魏征虽曾是李世民政治上的仇讎，可是由于魏征的功劳，从詹事主簿、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门下侍中、加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最后做到太子太师。

公元632年，唐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魏征说：“然，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

唐太宗认为地方官“实理乱所系，尤须得人”，因此他十分重视地方官的使用。他曾讲：“为朕养民者，唯有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

唐太宗曾要封德彝举贤才，封德彝久无所荐，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

唐太宗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

公元643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皆一时之俊杰，他们中，有隋末农民起义军将领，如徐世勋、秦琼；屈突通本为隋将；魏征原为义军李密部下，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省合肥人。清廷洋务派首领。1847年中进士。1853年办团练抵抗太平军。1858年任曾国藩幕僚。1861年任江苏巡抚，又任两江总督。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是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媚外辱国，有人说他最早主张开放引进，众说纷纭。

过去盛传过一个笑话，说李鸿章乘外轮出洋，在餐厅进餐时，侍者拿菜单请他点菜，因为他不懂外语，在菜单上逐次指了四下，所指均为汤类，侍者上了四道汤。当时清廷腐败、官吏无能，所以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并作为笑料广为传播。

其实，李鸿章作为清廷外相、总理大臣是懂得英语的。1896年李鸿章以太子太傅身份，作为全权代表，搭乘英国“淑女沙龙”号客轮访问美国纽约，轰动了美国。当时美国各大报记者想尽办法去抢新闻，《纽约时报》记者抢得最快。当轮船一靠岸，他们就打听到李鸿章最喜欢同船上的儿童谈话，尤其是一个叫克梅倩的小姑娘跟李鸿章最接近，还荣幸地获得一枚镶着李鸿章照片的纪念章。于是记者向克梅倩探听李鸿章的习惯和爱好。据说，李在船上和儿

李鸿章 是 美食家

石林 翟书惠

童们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与克梅倩最为亲近，要她讲故事给他听。还有同船的亚勃姐妹，她们都是歌星，经常和李鸿章交谈，并被请到李的贵宾舱去表演，李向姐妹俩亲笔题赠照片。后来，这姐妹俩竟因此在百老汇大红特红。另外，李鸿章在船上还邂逅一位外国的造船工程师，彼此不时交谈有关造船的事。由此可见，李鸿章不但懂得英语，而且说得还很流利呢。

至于饮食方面，李鸿章也不像当年官场上流传的只喝四道汤。当时的纽约《先锋论坛报》有过记载：清晨五时一碗稀饭，四碟小菜；六时吃白煮鸡蛋加醋、鸡汤，米糕；中午吃米饭、绿豆粥、蒸鱼、炖肉、炒猪肝、马铃薯淋卤汁等。那次出国，李鸿章随身带有烹制中国菜的名厨和专做中式点心的师傅，还带有酒、茶及大量用中国天山瓦缸泥封口的矿泉水，专供烧茶之用。最有趣的是润肺养颜、清宫秘制的桂花皮蛋，成为美国人罕见的珍品。

1896年8月31日，星期六，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假座华尔道夫国宾馆举行国宴。美国方面事先拟定一份具备山珍海味的豪华菜单，不想后来李鸿章举行的答谢宴会，竟使前者大为逊色。菜单完全按照中国皇宫举办的国宴，并且按照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排列，顺序上菜。每道菜都有专名，如“福如东海”鱼，“寿比南山”掌，“貂蝉如意”汤，“贵妃”鸡，“嫦娥”饼等，这些菜谱都有秘方配料，用一百多种名贵中药调制而成，而与宴者却感觉不到一点药味，因而使他们大为倾倒。这种秘方虽早已失传，但当年李鸿章所发明的菜谱，至今仍流传在美国的中国餐馆。

后又归李建成，最后才归唐太宗；张亮出自寒门；李靖、长孙无忌则是关陇土族；虞世南长于书法；尉迟敬德则是一员猛将……唐太宗均取其长而用之。

公元633年，以开府仪同二司长孙无忌为司空，无忌坚决辞谢，曰：“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上不许，曰：“吾为官对人，唯才是举。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仲符是也；如其有才，虽讎不弃，魏征等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长孙无忌是文德皇后长孙氏之兄，曾佐唐太宗定天下，后虽被武则天迫害致死，而不改初衷。

公元644年，“上谓司徒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对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颂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上曰：‘朕问公以己过，公等乃曲相谏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谢，上曰：‘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

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

尉迟敬德是唐初有名的武将，曾有功于世民，但性情粗暴，居功自傲，有一次在宴会上，他与人争吵，动手打人，唐太宗就对尉迟敬德等人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尤，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祖醜，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李世勋是唐初一员大将，初从翟让起义，参加瓦岗军，失败后降唐，后因功封为英国公。“李世勋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翦须，为之和药。世勋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

当然，唐太宗用人进退，赏罚臧否，是以维护还是损害李氏王朝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他毕竟还是个杰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唐朝走向了全盛时期。

□新树鹏评注

注评陈独秀诗 《挽大姊》

兄弟凡四人，惟余为少焉。
长兄歿辽东，二年共和前。
二姊老故乡，死亡逾廿年。
大姊今又亡，微身且苟延。
大姊幼勤谨，祖父所爱怜。
及长适吴门，事姑姑称贤。
相夫营市贾，勤俭意拳拳。
夫亡教子女，商读差比肩。
余壮志四方，所亲常别离。
抗战军事起，避寇群西移。
率家奔汉皋，姊彦犹未衰。
卅年未见姊，见姊在危颠。
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卜居江津城，且喜常相随。
诸甥善营贾，市利可撑持。
姊性习勤俭，老益戒怠侈。

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
家人奉甘旨，尽食孙与儿。
强之拒不纳，作色相争持。
针帚恒在手，巨细无张弛。
如何操奇赢，日夕心与驰。
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
肥甘既失养，身心复交疲。
行年六十九，一病遂不支。
今春还山居，余病静是宜。
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
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胞弟独秀挽于蜀之江津鹤山坪

〔挽大姊〕陈独秀的大姊吴陈氏，于1941年7月15日因患中风病逝于江津油溪镇。此诗作于7月下旬。本诗原件曾由大姊之孙吴孟明保存，后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据他回忆落款为“胞弟独秀挽于蜀之江津鹤山坪”，下钤蓝紫色陈独秀印章：江津之“津”字，写作古体“ ”字，诗的字“绝似北宋司马光宁州帖，楷书字之大小亦同。”

〔微身且苟延〕衰弱的身体暂且苟延残喘。

〔及长适吴门〕等(大姊)长大了嫁给吴向荣。适：嫁。

〔事姑〕侍奉婆母。

〔汉皋〕指汉口。皋为水边高地。汉口位于汉水入江处东北岸，故称汉皋。

〔相将〕相互扶持。将：扶持，扶助。

〔百罹〕多种不幸和忧患。

〔纨素不被体，兼味素所訾〕意思近衣不重彩，食不兼味。形容生活俭朴：不穿绢帛绸缎之类的衣服，一向计算着不同餐吃几样菜。纨素：精

致洁白的素绢。訾：通货，计算。

这首长达60行的五言叙事诗，哀婉动人，悱恻缠绵，情真意挚，是陈独秀晚年诗作。这首诗亲切地回顾了大姊勤俭辛劳，贤孝慈爱的优秀品格与姐弟间的手足情谊。全诗层次清晰，述哀有序：先写兄弟姊妹四人的乐聚哀丧，微身独存的悲悯；再写大姊的勤俭、孝顺、贤惠，教子有方，是旧时代女子的典范；次写由于自己志在四方久散少聚以及战乱扶持，卜居江津，与大姊欣喜相逢，极赞她食不兼味，衣无帛绢，拒甘旨之奉，尽食儿孙，而常操针帚之劳的持家之道，“生存为后人，信念不可移”以及心力交瘁一病不支的情况；最后写姊弟最后一别的印象。全诗忆事亲切，泣涕自然，用一系列典型的生活事例表现了一位勤劳、俭朴、贤孝、善良、友爱慈祥的旧式东方女性的形象。这首诗的语言质朴流畅，韵律和谐，从歌哭泣诉间的自然咏唱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个革命者的伟大情操。

纪念邓拓诞辰八十周年

(外十首)

□李宝光

丁一岚同志转来福州三山诗社函称，1992年2月12日乃邓拓诞辰八十周年，该诗社征求战友、同志写纪念诗词，于1月15日寄去诗三首。

一
倚马万言笔作枪
烽烟战火铸文章
史诗待续凄玉碎
盛世阙君亦神伤

二
五台烽火太行烟
三家妙笔话燕山
千古英才饮恨去
丹心志在艳阳天

三
笔扫千军一奇才
衔冤饮恨最堪哀
今朝共庆升平日
可慰英灵在泉台

异国望月

相知故乡月 伴我异国游
遥怜远旅苦 圆月瘦如钩
极目北斗隅 苍茫江河流
愿君常皎洁 永照我神州

(1983年12月于新西兰)

柳州掠影

1987年冬在广西柳州，当时北方正值数九寒天，而柳州却是花红树绿，和风盈盈，细雨绵绵，别有一番景色，该市工作也热气腾腾，蓬勃发展，因填词记之。

渔家傲

如带柳江笼晓雾，鱼峰峭立羊肠路，湖畔对歌情未足，皆乡语，余音袅袅漫天宇。

蕉绿花红南国树，龙城尽是销魂处。死在柳州何所据？须勘误，柳州能使青春驻。

长相思

江水清，潭水清，鱼峰山下对歌山歌脉脉情。风盈盈，雨盈盈，

花红叶绿沐雨中，隆冬春意浓。
诗意浓，画意浓，龙城尽在诗画中，人在画中行。机声隆，车声隆，勇于起步创新程，开拓永不停。

南乡子

(赠郑州黄河游览区)

极目望神州，
览尽风光岳岭头，
多少中原兴拓事？
不休；
恰似黄河滚滚流。

宏愿早开头，
广袤山川任运筹，
奉献无私心并力，
勿忧，
休问自身沉与浮。

(1988年3月)

题郑州西流湖快哉亭联

数千秋黄河文化，源远流长，悠也悠也，从今能继往开来，为河山添色，堪称幸事；

十来载神州浩劫，风狂雨烈，乱矣乱矣，至此得文明安定，看景物宜人，岂不快哉？

题郑州西湖流苍野亭联

潋滟光辉
借得西湖一流水
空濛气势
搬来中岳半千山

题郑州黄河游览区极目阁联

登北邙，居高瞰远，气象万千，
广阔无垠，伟伟乎中国大地；
观黄河，抚今追昔，波涛澎湃，
奔流不息，悠悠然华夏摇篮。

题山东蒲松龄故居联

叙故事，鬼耶？妖耶？狐耶？人耶？恍惚迷离，寓意矣形骸以外；
行文章，高也！超也！妙也！绝也！洗炼精策，寄情兮神韵之中。

题汤阴岳飞庙联

忠忠忠，一片丹心，尽忠报国，
竟遭诬害，惨祸加身，千古奇冤，千秋遗恨，从南到北，无不悼念，英雄永在；

恶恶恶，万般险毒，作恶害民，
却得高升，奸佞弄权；一时逞凶，一代流毒，自古至今，俱应探求，缘由何来？

(1987年春)

欢迎
订
阅

《炎
黄
春
秋》

关注上层动态 披露历史谜案 反映社会热点 追踪重大事件

《炎黄春秋》杂志是以萧克将军为执行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综合性月刊。创刊两年来，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刊发的文章有1/3以上被全国各种报刊竞相转载。本刊内容翔实，格调高雅，可读性强，具有较高的文化品味与收藏价值。

1994年，本刊将交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向全国公开发行人，每月20日出版。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本刊将推出一系列重大选题，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现在各地邮局正在办理本刊订阅手续，邮发代号：82-507 欢迎您在当地邮电局（所）订阅。如在当地邮局漏订，亦可向本社办理邮购。地址：北京西城文津街7号（100802）联系人：郭小姐

中华大学大专函授招生简章

中华大学经湖北省教育委员会鄂高教〔(83)054号文〕批准成立。学校师资力量雄厚，管理严格。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并推荐安排一批待业学员去深圳市、珠海市、中山市等地工作。

学校开办的各专业分别由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主考。学制两年。各科课程及格者，经专业主考大学盖校章，由湖北省高考委（盖钢印）颁发大学专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

一、招生对象：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干部、工人、农民、指战员及城乡待业青年，均可免试参加学习（战斗英雄、劳动模范、残疾青年免收学费）。

二、报名办法：邮汇报名费5元到我校，即寄登记表、简章、学习安排和入学通知书。集体报名，由单位直接来人或来函联系。汇款时，请写清地址、邮编，在汇款单“附言”上写出学习专业。

三、入学手续：填写表格（写上身份证编号）；交脱帽一寸、二寸黑白照片各两张；我部经审定即办理注册手续；学员交纳学费后即寄发校徽、学生证和学习材料。

四、本学期开办专业、学习课程及收费标准：每门课程学杂费50元，报考费12元。

专业	课 程	主考院校
法 律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法学 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	武汉大学
会 计	哲学 大学语文 经济统计学 会计学原理 企业会计	中南财经大学
经济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企业管理学 技术经济学 经营管理学	中南财经大学
行政管理	哲学 大学语文 组织行为学 行政法学 行政管理学	武汉大学
秘 书	哲学 逻辑学 行政文书学 行政秘书学 行政管理学	湖北大学
中 文	哲学 逻辑学 文学概论 写作 外国文学	湖北大学

五、教学方式：以函授为主进行教学，给学员辅导学习，解答疑难。考试前给学员寄发复习资料，帮助学员取得好成绩。考试不及格者，可免费进行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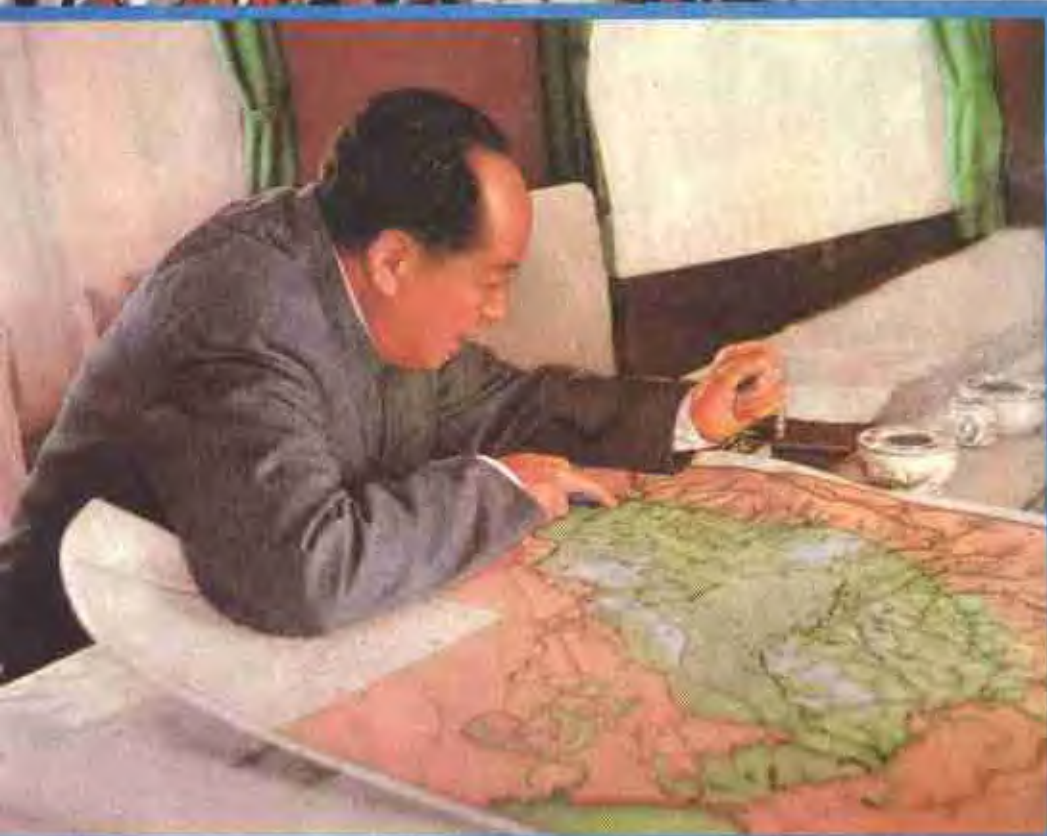
六、考试办法：每学期进行一次考试（考场设在我校内），学员凭通知后可凭我校学生证买半价优惠来回火车票。

七、毕业待遇：取得毕业证书的学员享受全日制高等院校大专毕业生的同等待遇。毕业时，由省高考委调发考籍档案给在职学员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备案。对待业学员采取自主选择业和学校推荐相结合的办法，按照国务院88年3月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接受单位录用或聘用。

八、报名时间：本期报名截至12月31日，逾期报名者转下期学习。

通讯地址：武汉市汉阳区马沧湖路2号 中华大学函授部 邮编：430050 电话：027-443765

国民党也有一位双枪老太婆



毛泽东指挥琼州
渡海作战

退守台湾 蒋介石的悔恨与反思

毛泽东像章的沉浮与兴衰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